

[法] 乔治·蓬皮杜 著

恢复事实真相

——蓬皮杜回忆录



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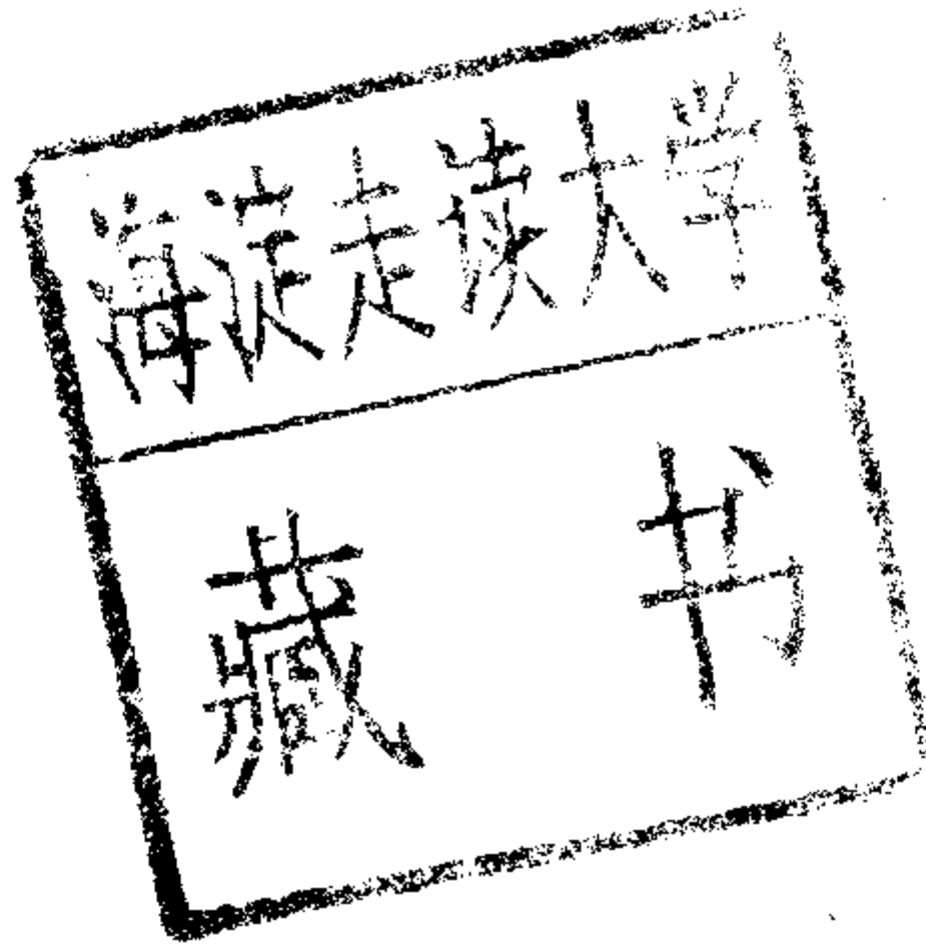
世界知识出版社

K.35.67
PPD/1

恢复事实真相

——蓬皮杜回忆录

〔法〕乔治·蓬皮杜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004588

出版者说明

本书是法国前总统乔治·蓬皮杜的回忆录。

蓬皮杜生于1911年，卒于1974年。他毕业于高等师范学校。1935—1944年在马赛和巴黎担任中学教师。1944年9月—1946年任戴高乐临时政府特派员。1946—1954年在游览事务总署和最高行政法院工作。1953年任洛特希尔德财团董事。1956—1962年任洛特希尔德银行总经理。蓬皮杜颇受戴高乐将军的赏识与信任，1958—1959年任戴高乐总理办公室主任。1959—1969年，在戴高乐将军就任总统期间，蓬皮杜担任总理达六年之久（1962年4月—1968年7月），并于1969年继戴高乐将军之后担任总统，直至1974年逝世。

这本回忆录是在蓬皮杜总统逝世后，由蓬皮杜总统夫人克洛德·蓬皮杜并在有关人员协助下，根据蓬皮杜生前留下的笔记、并参考大量文件、资料汇编而成，1982年在巴黎出版。本书对研究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和第五共和国历史，对了解蓬皮杜、戴高乐和当时法国政治均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参加本书第一、二、三部分翻译工作的同志有龚元兴、朱邦造、赵立兴、孙继文、王晓渡、王雁芬、李学芬、李福顺、罗汉苏、刘红燕，并由余德全、金森、杨桂荣、孙昆山负责校订。第四部分由胡晓同志翻译。

目 录

几点说明 克洛德·蓬皮杜
前 言 (1)
第一部分 走向未来 (1)
有关文件汇编 (73)
第二部分 1949—1955年 (95)
有关文件汇编 (119)
附 件 (138)
第三部分 1968年5月 (150)
有关文件汇编 (175)
第四部分 就任总统以前 (218)
有关文件汇编 (239)

第一部分 走向未来

我出生于上奥弗涅省的一个小村庄里，该村海拔一千米，我出生的房子是属于我的外祖父的。我的双亲曾在米拉当过小学教员。在我出世之时，他们俩刚被任命为阿尔比男女合校高小班的教师，一个教西班牙语，一个教自然科学。我父亲一家都是农民，生活虽然贫苦，但尚能维持生计。我母亲家里是做生意的，后来，外祖父家里的生活已达到小康水平。拿我出生的那座房子同我母亲出生的那间茅屋相比，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外祖父去世过早，给外祖母留下了一笔小小的家产，可是，由于国防部发行公债，这笔财产被刮掉了五分之四。

我在这里怎能只字不提我的父母呢？就我而言，应该说，我最先接触到的是我的母亲。我还未滿三岁时，父亲就上了前线。不久，他就负了重伤。出院后，他又前往索姆省，参加了东线部队。当他回来时，我已经八岁了。因此，我在开始接受教育的时候，只知道母亲。再说，由于父亲十分重视我的学业，因而他在我眼里成了一个讨厌的人。母亲是我的依靠，是我的保护人。我非常爱她。此外，她的性格十分刚强，尽管病魔损害着她的健康，并在六十岁上夺走了她的生命。后来，由于失去了母亲，我才认识到父亲的真正为人——他心地善良，甚至到了软弱的地步。我在儿时真是错看了他。他在晚年的时候，住在我姐姐那儿，周末到奥维

叶来，度假时则同我们一起去布列塔尼。这样的晚年生活，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他带来了极大的满足，从感情上说也如此。因为他为人善良，性格开朗，生活里充满了乐趣，所以我们都喜欢他。1968年8月，他和我们一起在卡尔纳克度过了最后的一个假期，当时的情景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里：他喜爱布列塔尼这个地方，在亲人中间，他生活得安逸而且愉快；我意识到，我使他度过了一段真正幸福的时光。

母亲是在我的怀中死去的，那是1945年圣诞节前一天的拂晓时分，在贡提埃城堡的圣一约瑟夫养老院里发生的事。为了不让她在巴黎过艰苦的生活，我们在那个养老院给她弄了一间房间。1969年的一个晚上，在布西果医院里，为了不让父亲担心，我不得不离开了他，但我却知道，他已不久人世了。我强打起精神对他说：“好好睡吧，爸爸。”“你也好好睡吧，”他带着温柔的、信任的微笑回答我。在这样的时刻，其余的一切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我的父母属于地地道道的法兰西种族，他们吃苦耐劳，省吃俭用，他们注重荣誉，注重思想美德，注重高尚品质。我在童年没有受过溺爱。但是，就记忆所及，我受到的，都是有关为人要正直、善良和热爱工作的教育。这些教育至今对我仍有影响。

我在阿尔比学完了全部课程，所谓我在蒙布迪夫上小学的说法纯属虚构。五岁时，我在离父母家不远的一所小学走读。后来，在八岁那年，我被送进中学八年级^①学习。那

^① 在法国中学里，八年级为最低班，一年级为毕业班。——译者

时，我似乎就有了好学生的名声。我可以说的，就是我在阿尔比中学上八年级时，有过一个非常好的老师——德尔加先生。当我九岁离开他的班级时，我已掌握了全部基础知识：使我能够正确运用法语写作、会话，掌握词的拼写和语法知识，掌握有关算术的基本概念、心算、法国历史和地理的知识。随后，围绕并依据这一坚实的核心，即推理的逻辑、对祖国语言的了解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其他的知识也就汇集起来了。如今，在我们的学校里，还有哪一个学生能够这样说呢？

无论如何，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在阿尔比中学读书时成绩优秀。我的老师尽管职称很低，学术上也无多大抱负，却很尽职。这些老师，有的遭到学生的起哄，有的叫学生有点害怕，不少是学生很喜欢的，可是没有一个给我以深刻的影响。然而，我对一个准备报考教师学衔的年轻教员却另眼看待。二年级下半学期，他教了我们三个月，是他引起了对于文学与诗歌的兴趣。在结束这部分叙述以前，让我们再提一提加德拉先生，他是我后来在图卢兹高等师范学校低级预备班时的历史老师。他是法国西南部拥护共和政体的一分子，一个热情的爱国者，脸部曾在1914—1918年的战争中受过伤。他以弥士莱^①的激情，以及加克索特^②和马迪厄^③的学识，使历史、特别是法国历史重现在我们面前。他歌颂法兰

① 儒勒·弥士莱（1798—187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多卷《法国史》和《法国革命史》。其著述在法国影响较深。——译者

② 皮埃尔·加克索特，法国当代历史学家，主要研究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的历史，著述颇多。——译者

③ 阿尔贝·马迪厄，法国当代历史学家，他的著作主要论述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其中《法国革命史》已在我国翻译出版。——译者

西的伟大，在他的笔下，路易十五和罗伯斯比尔的形象也颇具魅力了。他对我的影响很深，甚至影响到我的政治态度。我之所以从1940年起就成为彻底的戴高乐派，而且对贝当元帅从未有过辱骂之词，那是因为加德拉先生教育我要尊重丰富多彩的法兰西，要真正地体会其基本实质。我在图卢兹路易大帝公学有过一些很好的老师。他们教给了我很多东西，但也仅此而已。人们会注意到，我从未有过著名的哲学教师。或许这对我的智育有所影响，尽管我也读过柏拉图的许多著作。

应该说，我在一生中曾博览群书。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父亲，只知道学习。我的童年生活是为学习而安排的。我的功课做得很快，所以为了消遣，同时也出于爱好，我便一头扑在阅读上。在阿尔比上学的那几年中，我每天至少读一本书。从儒勒·凡尔纳和蓬松·迪泰拉伊的书以及关于印第安人的小说，到大仲马、小仲马，然后到巴尔扎克、司汤达和普鲁斯特的著作，还有希腊、拉丁和法国的古典小说，法国所有诗人的作品，外国文学的精华，或是我所认为的精华，尤其是英国小说和俄国小说。我尽力把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今天。我觉得，至少在文学方面，我的空白相对说来还不算多。所有成文的东西，尤其是有关人和人的命运的作品，过去吸引着我，现在对我也仍然具有吸引力。如果我说，我从内心深处觉得自己首先是一个伦理主义者，而且在六十岁上仍然相信十六岁时在哲学课中所主张的美与善相一致的简单论述，那也许会使人感到惊讶的。

在中学优等生会考中，我的希腊文译成法文的考试得了头等奖（我父亲是多么高兴啊！），但在随后的中学毕业会考中，我却成绩平平。我的中学学业就这样结束了。有时人们

对我毕业会考的成绩之差感到惊讶。其实，那是我的性格和思想的两个特点所使然。只有我非常熟悉的事，我才能干得好。可是，当时我在知识方面还有许多空白，因为我从十四岁起就对科学和当代语言不再感兴趣了，对于课堂上教授的那种哲学，我也没有用心钻研。第二个特点是，对于我认为已经掌握的东西，我是很自信的。我知道我在中学毕业会考中不会不及格，所以就不再为通过考试而作任何努力了。我的这一缺点甚至发展到了轻率的地步。因此，我在哲学课笔试时，用两个不同的题目写了两篇论文：一篇是给我自己写的，另一篇是给班上一位姑娘写的。我们俩都得了应该得到的分数，我的成绩正如事先估计的那样，而她的成绩则有点出乎意料。我还记得，当我把写好的那篇论文递给我的意中人时，我们的监考老师——他曾经教过我——似乎觉察到了什么。不过，他毫无表示。他是很喜欢我的。

这种自信——现在可以这么说了——还掺杂着某种谦虚，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谦虚便逐渐减少了。我知道，要通过中学毕业会考，我是很有把握的。但是，当我到路易大帝公学升入高等师范学校预备班时，我确信，自己已置身于出类拔萃之辈当中，只能相形见绌了。学期一开始，我就得了几个好分数，但这并不能打消我的那种念头。我还记得同几个同学的一次谈话，谈话中我对其中的一个同学表示了钦佩。他在路易大帝公学里名声特别响亮，头一年在高等师范学校初级预备班时曾获得优等奖。突然，在场的同学对我说：

“你在笑话我们！你明明知道你比他强。”这使我为之愕然，但我并不相信。后来，在高等师范学校入学考试时，我就尝到了这点自卑感的苦头。在我看来，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都是些天资近乎神奇的人才。况且，高等师范学校预备班还使

这种精神状态得以维持下去，每个人都记得路易大帝公学前两年考入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们那些明显的优点，其中有：巴代什和布拉齐拉克、珀蒂邦、塔拉格朗（蒂埃里·莫尔尼埃）和让·贝拉尔。当我得知我已通过初试时，我感到惊奇。学校当时的秘书长让·托马曾对艾蒂安布尔说：“今年，无论是从通过初试的人数，还是从成绩来看，路易大帝公学的学生都不怎么样。”当后者告诉我们时，我便得出了结论：自己肯定是忝陪末座。我象中学毕业会考时哲学口试一样，也是漫不经心地考完了口试，而主要精力却放在为同学们鼓劲儿上。发榜时，我发现我的笔试考了第十七名，我惊呆了。口试后，我成了第三十四名，而录取人数却只有三十一名。可见，要是我在口试中认真一些、专心一些的话，我本来也会被录取的。从此以后，我自认为自己是“行的”，别人也和我一样，都承认这一点。开学后，同学们选我当了预备班的“头儿”，如今则叫做“代表”，这既是对我预料中的能力表示的敬意，又是对同学之间友谊的一种检验。那时候，还有桑戈尔和一个名叫范唯谦的年轻的安南人。后者一度当过越南驻法大使。由于我天生具有的人类平等感，以及我对与自己不同者的好奇心，我同他们建立了一种特殊的交情。后来，戴高乐将军有一天对我说：“即使是你，蓬皮杜，你也不相信一个黑人抵得上一个白人。”从统计的角度来看，从目前来看，他并没有说错。但是，没有天生的低劣，有些人证明了这一点，桑戈尔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还记得让-米歇尔·弗朗丹，他后来死了。他的一生就是为摆脱肉体所遭受的痛苦而进行长期斗争的一生。我还记得保罗·居特，他那宽宏大度的慈善心肠使他乐于言过其实地赞誉他人。我还记得其他许多人，我曾同他们保持着联系，在我的一生中，包

括在爱丽舍宫的时期，我都经常见到他们。其中有：雷蒙·博兰，他后来在巴黎大学任哲学教授；让·居赞，他后来作为文科生考进了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时却获得了自然学科的学衔。在学校里所认识的人当中，我要特别提到勒内·布鲁耶，他是最忠实的朋友，聪颖睿智，擅长分析。勒内·马亚尔去世过早；勒内·比利埃尔当过国民教育部长；雷蒙·阿拉斯曾同比内先生共事，当时是一个热情的社会主义者……在我的记忆中，还浮现出许许多多男同学的名字，他们的生涯经常是在大学里执教，而且同我们一样，都喜欢有独到的见解，都喜欢有思想自由。

尽管如此，我的前途已经确定。我取得的成绩一定会使我名列前茅。路易大帝公学的所有人都确信，我将以第一名考入高等师范学校，从而使这座古老的中学获得多年来所向往的成功。然而，情况却并非如此。我在考试时有点漫不经心，结果笔试名列第九，口试后，排为第八名。高等师范学校入学考试的第一名是让·布斯凯。他是从波尔多师范学校预备班来的；四十年后，我让他当上了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这是一个在知识上和道德上都很杰出的人物，他的成功决非偶然。后来，他继我之后，在下一年的文学教师学衔考试中再度夺魁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路易大帝公学的好几个同学的成绩都在我前面。应该承认，这使大家都感到惊讶。他们之中，皮埃尔·普热一直是我的朋友，在教师学衔考试中，我反而超过了他；后来，我先后任命他担任我国驻摩洛哥、雅典和罗马的文化参赞。他十分聪明，而且具有非同寻常的幽默感，同他交往曾使我防止自满！

在高等师范学校度过的三年，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并不太用功，只要能够顺利地通过各项考试就行

了。但是，我博览群书，经常欣赏画展和电影，尤其是和同学们一起，就某些想法没完没了地进行讨论。我们在圣米歇尔大街喷泉旁咖啡馆的露天座上，花了无数的时间讨论各式各样的问题：哲学、艺术、文学或政治。我报名参加了社会党大学生组织，一年后便很快同一切组织断绝了关系。不过，我热情地站在左派一边；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和自由，也意味着向咄咄逼人的法西斯主义和正在抬头的希特勒主义作斗争。可惜，后来出现的情况却使我感到失望。

因为有几个“塔皮尔”^①，我便十分悠然自得。在一个不大讲究仪表的环境中，我好象是一个上流社会的绅士。我靠助学金和对成绩优秀学生颁发的奖学金外出旅行，到过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和德国。1933年，我路经慕尼黑时，碰上了希特勒分子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我被吓呆了。我很容易地就猜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法国和它的几届政府——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府——对此没有作出反应，我对此感到痛心。不久，我们的无能就在阿尔贝·萨罗^②的身上显示出来（“我们决不让斯特拉斯堡处于德国的炮火之下”），随后又在我曾竭尽全力为之呼吁过的人民阵线中显示出来。这种令人懊恼的情景，为我后来赞同戴高乐将军的制宪思想作好了思想准备。

不管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有什么地方比三十年代的高等师范学校更能使思想得到自由的发展。从同情共产党的雅克·苏斯代尔，到据说在自己房间里一边打枪一边叫喊“杀死

① 指法国师范学校中上个别辅导课的学生。——译者

② 阿尔贝·萨罗（1872—1962），法国激进社会党人，曾多次出任政府部长，三十年代初期担任过法国总理。——译者

犹太人！”的布唐，我们能够就各种不同的观点进行交锋，而从不越出同窗友情的界限，我们都很爽直，不屑过问琐事，但愿了解别人并让别人了解自己。凡此种种，在很大程度上当然是由于我们没有参加行动的缘故。然而，我怀恋这种自由，即使后来当我懂得这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没有肩负责任的时候，也是如此。行动要求于性格的，比要求于智力的更多，但是，应当承认，从很多方面来看，它都使人贫乏。

我在这里没有谈及自己的恋爱经历，人们是不会感到奇怪的。女人在我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我至今仍然相信，少女的脸庞和灵巧、温柔的年轻身姿，同诗歌一样，也是世界上最动人的东西。但是，我在这方面成败的细节，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也不会使任何人感到兴趣。后来，我认识了我的妻子，我的全部生活从那时起，就发生了变化。

这个幸福时代的结束，是以1934年文学教师学衔考试为标志的。我考了第一名，尽管有不少考试委员认为，我不象我的竞争对手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有人会以为，我为我的父母，为我的父亲感到高兴，我父亲的生活道路起初受到贫困的干扰，继而由于战争而中止，因此我在高等师范学校以及随后在教师学衔考试中获得的成功，会使他得到慰藉。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却感到沮丧。我知道，自己青春已逝，应该走向社会，自谋生计了。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个起点，而在我看来，却象是一种终结，一种限制。后来，我的婚姻重又给我以希望和幸福。

那时候，我早就表现得善于利用机会，而不善于创造机会。我本来可以设想出一条道路。我在古希腊语方面的天资，本来可以把我引向雅典的学校。但我却听其自然，糊里

糊涂地到马赛圣夏尔中学去当三年级的教师了。

在此期间，我服了一年兵役，先是在圣梅克桑，后来在克莱蒙费朗，让一米歇尔·弗朗丹的友情在那里吸引着我。对我来说，这是战友情深的一年。我对职业军人的美德颇为敏感，而对这些军人在高等师范毕业生这类高级知识分子面前表现出来的多少有点哗众取宠的弱点，又使我感到局促不安！这种使人忘却个性的智力上的自卑感，是我们军队的一大弱点。这种弱点加上我们各级参谋部的保守无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们失败的原因。对1914年的战争，人们仍然感到羞愧的是，它曾使一代又一代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在步兵部队的低级岗位上战死，而人们对佩居伊^①的回忆，至今还沉重地压在大家的心坎上。可是，对一个国家来说，任何东西也比不上使知识分子成为一个特权阶级更为严重的了。军队把所有的或几乎所有的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安排在各个参谋部工作，以为这样便能更好地使用“智力”。事实上，它在人民与文化受益者之间制造了一条鸿沟。而我呢，起码是一半出于懒惰，一半出于教义，我拒绝去上有关参谋工作的课程，这就使我在战争爆发时，到一个步兵团去当了一名中尉。对此，我毫不后悔。

接踵而来的，是我在马赛度过的那些岁月。在这几年里，我陶醉于普罗旺斯和地中海的景色之中。但愿工会代表们不要见怪，教师这种职业给人留下了极多的闲暇。尽管讲授文学课——法国文学，古拉丁希腊文学——比讲授其他任何课程都要花去更多的备课时间，尤其是批改作业的时间，同前

^① 夏尔·佩居伊（1873—1914），法国著名文学家。法国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前线战死。——译者

来看望“主课教师”的家长们接触的时间还不算在内，但是，除假期之外，我每星期还有两天、甚至三天的时间，可以用来在内陆揽胜，或在海滨娱乐。当时一片荒芜的莱博和更加荒芜的圣特罗佩，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在中学里，我和学生们保持着兄弟般的关系。由于偶然的原因，我在教完了三年级之后，当上了二年级的教师，后来又当上了一年级的教师。这就是说，在三年当中，我每星期有十二、三个课时，教的都是同一批学生，这真有点让他们厌烦。在师生关系和教学方法上，我喜欢比较自由的做法，这是讨学生的喜欢的。我教给他们基本知识，这些知识在中学毕业会考时都是用得着的。他们几乎全都通过了考试。不过，我也使他们开阔了眼界，或者说，我起码是试图这样做过。从此以后，人们就谈论起教育现代化的问题。在人们的建议中，我认为推理很不严谨、知识又很贫乏，这些建议没有任何新的东西，而且都是我已经本能地实践过了的。我觉得，人们可以收到效果而不感到厌倦，可以面向世界而不陷入庸俗和理智混乱，这一点我是有把握的。

我在马赛过了三年以后，又怀念起巴黎来了。我的教师学衔（尽管人们可以料到，督学对我的评价很一般）和一次偶然的对调机会，使我得以在亨利四世中学应聘。我当时二十七岁，是巴黎所有中学里最年轻的正式教师，何况还是在亨利四世这样一个素享盛名的中学里任教。我在那里教了五个学年，起初教三年级一班，后来教二年级一班，同时还让我和我的朋友拉乌尔·奥迪贝尔蒂轮流担任移民学校预备班的法语教学。另外，我还着手准备一篇关于小说家巴尔贝·多尔维伊的论文。后来，由于战争与烦恼，我便永远搁笔了。

1939年夏。我作为预备役军官，仍被派驻在马赛。1939年7、8月间，我到第141现役步兵团参加了一期预备役军人训练。当时，该团正在索斯佩尔地区进行演习。我出发时很高兴，相信我就要熟悉那个部队了，因为可能会动员我到那里去。总之，在这一期训练中，我结交了马内斯上校。这个十分出色的军官（朱安、德拉特尔等和他同时代的军官刚刚晋升为将军，他对此颇有几分嫉妒）是莫拉斯^①的忠实信徒。同时，我还结交了德比耶营长和两位年轻的中尉哥达乔尼和西尔旺德，营长后来战死沙场，年轻的尉官们一直是我的朋友。

训练结束后，我回了家。三天之后，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我被动员服役，又踏上了前往马赛的道路上。我们团从马赛出发，向格拉斯地区开拔，在那里充当阿尔卑斯军的预备队。

在阿尔卑斯滨海省的那次逗留，宛如度假一般。然而，在这样一位前途无量的上校所领导的现役团里，是不会不遭到恶果的。10月份，我们便向洛林省进发，来到了同敌人接火的马奇诺防线的前沿。在整个冬季和初春，我们先在洛林，继而在比兹东部地区经历了“奇怪的战争”。天气奇冷，我们不发起进攻，却让敌人牵着鼻子走。敌人炮轰，我们就还击。敌人不开炮，我们就不动。只有一些巡逻队在黑夜里用马枪互相射击。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能使人消沉的了。然而，我们却相信，战争是会打赢的。我们团利用从前线撤下来的那段时间进行休整，把我派到西索纳军营去实习。对于那次实习，我至今记忆犹新。我不时听说，德国的步兵人

① 夏尔·莫拉斯（1868—1952），法国作家，政治活动家，法兰西行动党的主要领导人。——译者

数更多、装备更精，炮兵的火力更强，坦克和飞机也更多。有一天，一位空军上校向我们简单介绍情况，我贸然地问他，我们怎样才有希望赢得战争。“靠我们的参谋部。”他回答说。“德国没有军事理论，我们在这方面的优越性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忘记了这位军官的姓名，并为此而后悔。但是，我很难相信他说的话。

在此期间，一切都在变化。在团里，马内斯上校离开我们去当将军了，接替他的是格拉尼埃上校，过去是高等师范学校预备班的学生。后来，在法兰西战役中，他表现得很有才干。他是乔治将军的信徒，那位将军曾到阿尔萨斯前线视察过我们的部队，却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挪威战争爆发了。一天，有人通知我们，打算让我们前往纳尔维克^①。只让军官们志愿前往，不愿去的将分配到驻阿尔萨斯的其他部队。自然，我选择了挪威。我们团向布列塔尼开拔，先到了朗迪维肖，后来又到了朗德诺。

这次调动使许多情况都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我们和另一个团一起，组成了一个拥有自己的炮兵、坦克和比较现代化的反坦克武器的师，只是兵员不满额。以后我们会交好运的。

5月10日，德国果然发起了进攻。我们当时刚要上船。根据我们携带的参谋部地图，我们是从挪威一直前进到东普鲁士。然而，我们在5月10日接到了向东移动的命令。于是，我们便乘上了去鲁尔的火车。几小时以后，有人给上校送来一张纸条，要我们在布尔歇^②下车，并命令我们做好立即进入战斗的准备。无需说明这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震惊了。因

① 挪威西北部的一个海港城市。——译者

② 巴黎郊区地名。——译者

此，我们来到了布尔歇。最后，我们被塞进了巴黎的公共汽车，向北方驶去。我现在还记得哥内斯的多叉路口，路口中央，有一个可怜的家伙握着机枪，奉命阻击古德里安^①的装甲车。尽管如此，而且还挨了几次飞机轰炸，我们还是到了哈姆，我们师要在那里保卫索姆河南岸。我们刚到达，就发现德国军队已经占领了河的北岸。

在将近三周内，我们经历了一场激烈的阵地战，死伤较多。6月5日，德军发起进攻。在我们师的战线上，我们灵活地部署了兵力和火力，击退了所有的进攻。5日晚上，我们很高兴。敌人似乎放弃了越过索姆河的企图，我们还抓到了一些俘虏，一切都很顺利。这时送来了军部的命令：立即向贡比涅撤退，任务是南下战斗。

面对这种荒唐的命令，大家又突然惊呆了，失望的情绪又抬头了。此后，我们情绪沮丧，开始边打边撤，先后撤到贡比涅森林、瓦洛河的克莱比、马恩河、塞纳河、卢瓦尔的苏利、歇尔河和布尚塞。要不是执行命令，我们决不后退。我领教过“斯图卡”^②的轰炸，用这种飞机攻击地面“人员”收效甚微。我也领教过“梅塞施米特”^③的机枪扫射，这种扫射比较危险，因为飞机驾驶员纯粹是在从容不迫地“打靶”。当然，我还领教过步兵战、炮兵战和坦克战。我们团保持了团结一致，师里的第二团也同样如此。尽管我们蒙受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名德国将军。——译者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容克87歼击轰炸机的绰号，意为“俯冲战斗机”。——译者

③ 梅塞施米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飞机制造家，“梅塞施米特AG公司”的创始人，这家公司制造的Me109和Me110型歼击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

了损失，但大家重新进行了整编，又能在歇尔河地区进行战斗了。为了使我们不致受到包围，便要我们立即转移了。到了哈姆以后，我就一直处在战情公报上所说的“鸭嘴”之中，这就是说，我们成了法国军队插进德国进攻部队之间的一支尖兵。经过一场令人疲惫不堪的急行军，我们在停战时正好摆脱了敌人，秩序井然地来到了上维埃纳省的圣伊莱尔广场。我们计划中的最后一次战斗部署，是在让·吉罗杜^①所钟爱的加尔当普河。

人们猜想得到，对当时发生的事情，我们是难以接受，甚至是难以理解的。至于我，从我们不得不极其痛苦地放弃哈姆前线的那天起，我就在内心里给自己定下了规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落入敌人手中。也许，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这是我的决心。当时的情况使我能够不太困难地实现了这一决心。

尽管如此，我的周围却没有任何人在任何时候感到自己的实力比不上敌人。我相信，除了有一个不幸的小组在我们部队先朝南作战，后来又突然掉头向北时被遗忘在瓦兹河北岸以外，我们基本上没有人被敌人俘虏。我曾设法想找回那个小组，但未成功，因为瓦兹河上的全部桥梁都被大量后撤的部队堵住了；而且，不知是哪位校官，听到我说要到右岸去寻找我们的士兵，就威胁说要枪毙我（原话如此）。在我们的周围，我们看到的是混乱、逃跑、溃败，我们不理解，我们没有被人流裹走。我想，正是在这充满战斗友情和充满战士豪情的气氛中，我汲取了直接发自肺腑的信念：法兰西是不会被彻底打败的。我们在卢瓦尔河偶然听到了请

^① 让·吉罗杜（1882—1944），法国当代著名文学家。——译者

求停战的消息，这使我们感到意外。接着，我们便同外界音信不通了。直到6月22或23日，我们才听到人们谈起戴高乐将军。说实在的，他的名字，我们根本不熟悉，他最初的几次号召，我一次也没有听到。在我的上校看来，这是一个胡思乱想、自命不凡的家伙。后来，我们有了电，我们便收听伦敦的广播，我自己也因此受到了鼓舞，因为我具有普通士兵的本能，而不赞同军官们的反应。我不知道我赞成什么，但我懂得，英国会坚持下去，法兰西帝国、法国舰队依然存在，我们迟早是一定会打赢的。

1940年7月给我留下了特别坏的记忆。我们当时在所谓的自由区，过着宿营部队的生活，感受着周围老百姓对于活象幸存者的士兵们的友情。军队被政客战胜的传说，开始在军官中广泛地流传开来。在使我恼火的这个把戏中，我的上校和他的助手可谓佼佼者。我对战略一窍不通，对戴高乐将军的军事著作和理论上的论争一无所知。但我辛酸地回忆起在西索纳时关于我们的参谋部的优越性的论述，以及加姆兰^①将军1940年5月10日那一天令人难以置信的议事日程。在我看来，我们的军事首领在投降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清楚的。我还记得一件事：一位校官说，贝当元帅的政府终于要把那些不是地道的法国人的军官从军队中赶走了，我一听就嚷了起来：“好啊，这样我们就可以摆脱掉魏刚^②了。”我不知

① 莫里斯·居斯塔夫·加姆兰（1872—1958），法国将军。曾任法国国防部参谋长，1939年9月被任命为盟军司令，1940年被魏刚将军所替代。——译者

② 马克西姆·魏刚（1867—1965），法国将军。出生于布鲁塞尔。曾接替加姆兰盟军司令之职。他支持政府的停战请求，并担任过维希政府国防部长之职。——译者

道这是否公正，但却反映了我的精神状态，人们可以想象出当时别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当时，我还看不清戴高乐将军的意图以及他能做些什么，但从那时起，他的目标在我看来就是法兰西的目标。

正是在这时候，我的妻子奇迹般地找到了我。她是怎么知道我们在哪儿的呢？她是怎么独自一人来到上维埃纳省的呢？至今我还很难想象。她向我证明，她不知道害怕，也不能想象我们俩怎能天各一方。这一点，我是知道的。在我正式复员前的最后几天里，我们俩自问：在圣伊莱尔广场能够做些什么呢？在利穆赞省这个小小的角落里，我们感到迷失了方向。我想，正是这种情绪占了上风，使我们决定返回巴黎。到那儿再说吧。实际上，我们是在自投罗网。

如果不算那些飞行员、水手、拉芒什海峡^①两岸的居民、海外法侨等有可能不太困难地前往伦敦的人，那么抵抗运动就可以说是在自由区里诞生的。无论维希政府的警察有多大的作用，但同德国占领的压力相比，也就微不足道了。我决不向维希政府要求任何东西，我决不要求占领军当局作出任何陈述。从那时起，我便置身于开始在里昂、甚至在维希诞生的运动之外了。我蛰居于我的小套间，或呆在巴黎的中学里，我不掩饰自己的看法（我觉得，那是大多数法国人的看法），但不能将它化为行动。当然，我只能通过言语鼓励所有的朋友和同事从事抵抗，鼓励他们不要失去希望。当然，对于我在高等学校预备班的学生，我也照此办理，不过，对于先后在三年级和二年级跟我学习的十四至十六岁的孩子们，我认为没有权利向他们灌输某种思想和观点。当

① 即英吉利海峡。——译者

然，后来有人把一些传单神秘地送到我这里时，我散发了这些传单。当然，有些犹太朋友请求我给予保护时，我接待过他们，尽量帮助过他们。但是，我承认，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被动的。可是，我却报国无门。最初同我谈起要采取行动的那些人（尤其是亨利四世中学的一位教师），在我看来，都是头脑不清，甚至到了发傻的地步，而且还可能是一些“教唆者”。然而，我却曾多次同意让他们派来的人住在我家，可是，除了一次以外，那些人从未来过。我希望行动，但又害怕荒唐的冒险，因此我没有找到通向行动的大门。只有一次，我遇到了机会。当我从杜洛克地铁车站走出来时，我碰巧遇上了让·卡瓦耶，我知道他同伦敦有联系，并且是从德国人手里逃出来的。我走近他，说愿意帮他的忙。卡瓦耶当时知道自己正受到追捕，所以一见有人认出自己并上前搭话，便显然感到恐慌。他简单地回答我说：“好，好，我会告诉你的”，说完就匆忙离开了我。直到他被处决的消息传来之前，我一直没有再听到谈起他。

伦敦之声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大家却是在困苦、愤怒中度过时光，我们主要的慰藉在于家庭生活之中。我还要说明，1942年11月之后，我遇到了许多朋友，他们“在行政机构中进行抵抗”，而且完全了解我的想法，但却没有要求我做什么事。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倾向于认为，根据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抵抗者的圈子正在不知不觉地缩小。后来，我终于同一个人有了接触。此人自称是某抵抗组织的“干部”。我相信，那个组织叫做“解放北方”。他吸收了我，并为了解放巴黎，交给我一项明确的任务。这一回也还是一样，规定的日子来到了，向我宣布的事情却丝毫也没有实现。因此，我又成了孑然一身。如果说我在战斗中冒过某些

风险的话，那就象是一个离队的士兵所能干的那样。

但愿人们不要以为我在企图为自己辩白。诚然，我犯过许多轻率的错误，险些遭到流放；那样的话，无论是死是活，都会使我成为一个英雄。但是，我显然缺乏冒险精神。如果我想要无视命运的话，我无疑是能够这样做的。我在这里分析的是一个“潜在的抵抗者”的情况，归根结蒂，他只是采取了某些孤立的、无意义的行动。我认为，也许是出于审慎，在自由区诞生的抵抗运动，不多久就有了关门主义的倾向，而且逐渐地以一些政党和一些高级官员或军人的圈子，以及战端未开就已存在的一些宗教流派为核心组织起来了。不属于上述某个集团的个人，只有在象犹太人和1941年以后的共产党人那样不得不为之的情况下，或者为了逃避到德国去服劳役，才可能加入整体的运动，否则就要铤而走险，但也只有为数不多的真正的抵抗者才能做得到。只身一人，如果与有组织的抵抗运动造成的封闭的社会各界毫无联系，如果没有充分地感到需要进行无目的的冒险，就只能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也就是说，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

我应该说，我曾参加为教育界颁发抵抗运动勋章的委员会，所以我发现，许多获得勋章的人还不如我做的工作多。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象有的人向我提议的那样要求颁发勋章的又一条理由。我希望这种勋章是一种特殊的勋章，而我却没有做过在我看来有理由获得这种勋章的事情。

为了使我的叙述完整起见，我还必须说明，1944年6月，我在亨利四世中学的同事、历史课和地理课教师、共产党员泰尔森先生来找我，他告诉我，由于阿尔贝·波拿尔周围的人的告发，已经决定逮捕我。我采取了一些预防的措施。可是，如同前几次向我宣布的行动计划未能实现一样，这一次

的危险也没有成为现实。我由此得出了结论：真正的英雄——那些不假思索，却又自觉自愿、十分清醒地甘冒各种风险的人——是为数不多的，正如同自愿而坚定的叛徒也是很少的一样。这使我后来不仅对抵抗运动的某些荣誉称号有所怀疑，而且对某些“被清洗分子”，尤其是我作为行政法院报告人，看过他们材料的那些“被清洗分子”表示了宽容。

接踵而来的是解放。在此以前，我关切地注视着从德国向俄国发起进攻以后发生的种种事件。这些事件渐渐地为希特勒异常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崩溃准备了条件。有些人对纳粹在西欧、波兰、捷克、俄国的所作所为，尤其是对灭绝犹太人的滔天罪行感到愤慨，但对致力于征服世界的德国人民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却怀有极其崇敬之情。我也属于这样的人。八千万人居然在几年之间同无比强大的美国所支持的整个欧洲相抗衡。后来，我吃惊地注意到，我所遇到的德国人都忘记了或者否认了德国历史上的这一篇章。但这并没有使他们的形象在我眼中显得高大起来。我对那些在1933—1944年期间抵抗了希特勒主义的德国人怀有深深的敬意。对于那些从1945年起才否认希特勒主义的德国人，则不那么敬重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是不可割裂的。即使我在1940年6月也从未承认过维希政权，但我却认为，法国不能也不该否定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940—1944年期间，法国的大部分地区是拥护贝当元帅的。自由区拥护他，是因为他保护了自由区；占领区拥护他，是由于认为他在内心深处是反对德国人的。许多人是从1944年夏天起才拥戴戴高乐的，而在同年春天拥戴贝当的也正是这些人。我还记得，戴高乐将军有一次从南锡回来后谈到了一个问题。在南锡的斯塔尼斯拉斯广场上，他受到了狂热的欢呼。他指着一张贝当元帅站在广场

阳台上面向热情欢呼的人群的照片，对我说道：“你可别上当，同样是那些人。”这是事实。在两种情况下，人民实际上显示了同样的感情：对敌人的敌视，对保护他们的领袖的信任。我想，对于德国人民也同样如此。我感到惊讶的是，自从胜利以后，我所遇到的任何一个德国人，谁也没有对我说过：“是的，我曾经跟随过希特勒，我曾经希望德国取得胜利。”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一谈解放。从解放之初起，就有朋友来找我，有的来自伦敦，有的来自那神秘的抵抗运动的行列。他们要我同他们一起工作，或者去新闻部，或者到内务部。当然，什么事情我都愿意干。但是，我却从未有过在法兰西复兴之时重返亨利四世中学的念头。我已经给勒内·布鲁耶写了信。听说，他已应召担任要职。一些同我们夫妇俩有交往的朋友告诉我，将任命布鲁耶为省长。从我当时的眼光看来，这就是一个显要的位置了。我向他说过，我愿为国家复兴与他合作，什么身份都行。他给我回了信，约我到他的办公室见面，并告诉我，办公室的地址在圣多米尼克街。于是，我便前往圣多米尼克街，但却根本不知道布鲁耶在其中办公的楼房是怎么一回事。然而，那正是陆军部大楼，戴高乐将军就在那里！布鲁耶告诉我，肯定会要我，但还不知道安排什么岗位。几天之后，正当内务部秘书长埃米尔·拉封要我负责共和国警察分局局长联络处时，布鲁耶再次召见我，要我到戴高乐将军的办公室工作。人们很难想象，我是多么出乎意外，多么感到惊奇啊！我不知道办公室为何物。但是，想到在将军身边为他工作，我欣喜若狂。就这样，我在1944年9月底成了临时政府总理办公室的特派员。我在勒内·布鲁耶的直接领导下，负责联系新闻部和国民教育部，

并奉命在他的领导下注意国内政治问题。

没有经历过这一时代的人，是无法想象在第一次接近戴高乐将军的人的心目中，他的形象是怎样的。直到那时为止，他是在无线电里以法兰西名义说话的一个声音。他仿佛是一个传奇人物，一个神话英雄，一个超群绝伦的角色。突然间，他的形象具体化了，他是一个形体奇特的人，个头特别高，头部同躯体不成比例，身着一套准将级的戎装，迈着笨拙的步伐走上楼到他的办公室，同时向四周射出高傲的目光。在他经过之处，每个人都象立正似地站立不动，同时垂下眼睑，仿佛为了不看这个不应该被自己看见的人，因为他不属于世俗世界。听到伦敦时代的合作者——帕莱夫斯基、比兰·德罗齐埃——谈论将军时，人们便感到惊愕。如同善良的修女们谈论一个熟人那样谈论上帝，他们也象谈论某个人那样地谈论将军，虽然说这是一个可钦佩的人，但毕竟还是一个人。无论如何，就我而言，一想到要略尽绵薄，参与一个超人的行动，我就充满了崇敬之情，而且感到极度兴奋。

有人说，将军曾要布鲁耶寻找一个“善于写作的教师”。这是胡说。办公室的人选，是由帕莱夫斯基和布鲁耶商量定的。他们当然要考虑能力的问题，但也要考虑伦敦的班子和国内的人员之间的平衡。巧合和老交情，使帕莱夫斯基选中了布鲁耶，为的是在他这个来自伦敦的人的身边，能有抵抗运动全国委员会主席乔治·皮杜尔的一个合作者。巧合和老交情，又使布鲁耶把我要到了他的身边。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巧合和老交情不仅对我（这是当然的），而且对法国，都产生了深远的、难以预料的影响。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对办公室的工作真是一窍不通。

不过，我很快就学会了。我到任两、三天之后，接待了一个身穿军装的妇女。她抱怨说，她的人道主义行动受到了妨碍，要求我给予帮助。我立即拿起一张印有总理府笺头的信纸，口授了几句很有份量的话，随后签上了字：“特派员乔治·蓬皮杜”。过后不久，一个警察分局的局长来问我是否认识这位妇女；她复制了我的字条，并到处传播。至少，她的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我承认了，而且引以为训。从这一天起，我再也没有轻率地在文件上签过字。

几天以后，我失去了我的祖母。办公室里一位初相识的同事向我表示了哀悼，他十分激动，我反而不得不安慰他一番。我从中得出了有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些结论。后来路易·瓦隆来了。他有一间很大的办公室，紧挨着我的办公室。他对我很友好。他的特长就是把那些令人厌烦的或者其势汹汹的来访者全都“塞”给了我。我还特别记得，有一次他接见一批要求立即处决贝当元帅的“女共产党员”的情景。当时外面有人突然叫他，他便请我替他接待。我当然这样做了。我还记得，我尽量向这些妇女解释什么叫作司法，什么叫做尊重法兰西。这次会见给我招来了一篇报复性的文章：

“蓬皮杜先生，你是戴高乐将军的发言人吗？”但是，这件事也使我猜想到，路易·瓦隆说话风趣，而不喜欢干繁琐的事，哪怕是一些小事。还有一次，他们要我代表戴高乐将军的办公室，去参加内政部举行的共和国特派员会议。阿德里安·蒂克西埃部长对他认为是监视的举动最为厌恶，他也被人视为脾气很坏的人。别人认为这是一项苦差事，不愿意干，我却接受下来，匆匆赶到博沃广场^①。我当然是迟到了。

^① 法国内政部所在地。——译者

我走进一间巨大的会议室，正好面对着阿德里安·蒂克西埃。他停住话头，看着我。我不好意思地在一个空位子上坐了下来，等待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我们这个办公室里，不仅有人心胸狭窄或害怕承担责任。但是，还有一点把我们大家连结在一起的，那就是认为将军为法兰西及其复兴而生，因而对他无限的崇敬。我每天工作十五个小时。晚上，我们经常到一家专供戴高乐派聚会的饭店去，在那里可以见到科洛斯特尔曼、迪佩里埃、卡巴尼埃等许多“伦敦的英雄”。我们离开饭店时，往往为他们的荣誉感到高兴，我们自己也仿佛沾了他们的一点光。

我已经说过，我的活动范围是新闻部和国民教育部，当时是皮埃尔-亨利·泰让掌管的，人民共和运动曾加以充分利用。我奉加斯东·帕莱夫斯基之命去帮助“激进分子”。因此，我接待了伊冯·德尔博斯和贝莱，并为《图卢兹电讯报》复刊作了很大的努力，但该报后来并未因此而感激我。在国民教育部里，我是同勒内·加比唐打交道。他的戴高乐主义思想是人所共知的，不久，我就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狂妄自大的习性。他曾设想把他这个约有二十几个司局单位的部进行“改革”。我设法控制损失，而且获得了成功。勒内·加比唐可能从那时起，就得出了我是一个假戴高乐派的结论。

我的职责主要是接待大批的来访者，其中很多人心中感到烦恼。为了保护这些不幸的人，应该有多少调解工作要做啊！他们并没有多么大的过错，后来我还发现他们都很健康，谈起戴高乐将军及其亲信在整肃工作中的宗派主义时都感到愤怒。的确，我也曾出于同志般的情谊以及对知识的尊重，力图拯救布拉齐拉克，因为我肯定他确实同敌人合作过。可是，我的气力白费了。

我渐渐地进入了政界。戴高乐将军需要有人起草一些函件，布鲁耶总是拖拖拉拉，来不及在发信时间前写好。于是，便由我来起草函件了。读者可以在附件^①中看到我起草的一封函件。虽然写得不很好，但还是由将军亲笔加注后退给了我。对这样的“手迹”，我感到非常高兴。

加斯东·帕莱夫斯基同勒内·布鲁耶的关系不大和谐。于是，帕莱夫斯基越来越频繁地找我。他让我参加每天上午举行的办公室会议。他乐意听取我的意见。他信任我，特别是在谈到选择投票方式时更是如此。这就使我能在《鸭鸣报》上发表了我最早撰写的几篇短文。

也许应该在此扼要地谈一谈戴高乐将军周围的人的情况。对这些著名人物，曾有过种种流言蜚语。在戴高乐将军左右，至少有三类人。首先是政府总秘书处，由若克斯领导，我们对它几乎一无所知。其次是副官，负责安排接见，因而在某些情况下起到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克洛德·居伊上尉，他善于促成一些希望接见的请求，并将另一些请求置之脑后。最后就是将军的办公室，下设民事办公室和军事办公室，军事办公室的政治影响不大，但却负责处理法国军队战时建设以及原有军队同来自“法国国内武装力量”^②的部队混编的问题。领导民事办公室的是加斯东·帕莱夫斯基，他是报界的攻击对象，特别是《鸭鸣报》的攻击对象。《鸭鸣报》指责他举止轻浮，讲究穿戴。但人们夸奖他，说他在上流社会中深受欢迎，并善于博得妇女的垂青。说实在的，他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机智过人，政治上十分敏感。如果说他有什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1、2、3。

^② 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沦陷时国内抗击德国法西斯的民众武装组织。

么弱点的话，或许就是他忠于在议会里结识的那些老朋友，因此不好阻止戴高乐的一批死敌回来，而这正是因为这些人从来没有拥护过他，也从来没有反对过他，他们对这种事实上并不放在心上。戴高乐主义对他们来说是十分陌生的。他们认为，战争不过是打断了世事的正常演变，使政治游戏暂时遭到破坏的一种事件而已。应当使一切都恢复本来面貌，把不幸在1940年7月中断的那盘棋接着走下去。他们的首席正式发言人居托利，是协商会议里年龄最大的一位代表，因而担任协商会议主席。在他们中间，有的还回到了制宪议会，而且从最初起就兴奋地感觉到，这场游戏实际上很快就会重新开始。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在他的题为《蓬斯·皮拉特的欲望》一文中，曾对此作过淋漓尽至的描述。

尽管如此，加斯东·帕莱夫斯基仍然是忠诚地、顽强地、娴熟地为戴高乐将军工作。他在民事办公室的好处是，可以引来圣多米尼克街的一些公爵夫人和女演员。共和国卫队的警卫们神情激动地看着她们登上通往二楼帕莱夫斯基和戴高乐将军办公室的高大的楼梯。两个办公室之间隔着一个巨大的候见室。来访者可以在那里欣赏一位身穿陆军妇女辅助人员制服的美丽少女。她坐在一张大办公桌后面。对面是居丹·迪帕维荣，她那粉红的脸色使他看起来仿佛永远激情满怀。换了别人，即使面对一个不怎么漂亮的少女，也是会激情满怀的。这种温情脉脉的长期共处，可能会使人感到有些灰心丧气。至少在旁观者看来确实如此，因为当事者对此毫不在意。

人们经常看到，加斯东·帕莱夫斯基从他的办公室走出来以后，便匆匆走进将军的办公室。他从将军的办公室出来时，有时轻松愉快，手舞足蹈，有时忧心忡忡，愁眉不展，

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在1940年以前一直是陆军部长的办公室。戴高乐将军不愿使用它，我不知道是由于偶然的原因，由于有点迷信思想，还是由于不要那套玫瑰色和金黄色的豪华家具才作出这一抉择的。

加斯东·帕莱夫斯基办公室的后面，是勒内·布鲁耶的办公室。关于将军身边的人，一谈起帕莱夫斯基，就说这个热衷于上流社会生活的人作风轻浮，一谈起那些副官们，就说这些军人粗暴无礼。布鲁耶想依靠坚持不懈的彬彬有礼、耐心、和蔼的态度，来改善一下将军左右的名声。布鲁耶在政治上更倾向于人民共和运动和乔治·皮杜尔。加斯东·帕莱夫斯基则赞扬社会党和樊尚·奥里奥尔。此外，在将军和他的外交部长之间，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也越来越多。这就是说，在政治上他们的关系并不和谐。不过，这一切终究不太重要。

将军其他的助手都在底层办公。那里有路易·瓦隆，他为人异常诙谐、机智，为我们增添了欢乐的气氛。他是“左翼”的代表，但他在“左翼”中是否有足够的影响和伙伴，我却无法断定。此外，还有艾蒂安·比兰·德罗齐埃，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彬彬有礼，甚至令人感到十分神秘（他负责外交政策），但他很快就表现出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朋友，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他似乎是谨小慎微的化身，但他的生涯却表明他是一个容易冲动、热衷冒险而不顾一切的人。让·多内迪厄·德瓦布尔是出了名的才智过人，他在工作上和生活中都十分认真，甚至十分严格，他还非常愿意帮助我们完成强加给我们的无数苦差而作出自我牺牲。在我们这个班子的其他成员中，还有吕埃，他被视为非洲问题专家，但这并未影响他担任巴黎市议会议长；还有图夏尔，他在暗地

里散布一种看破一切的论调，每次谈话的开场白就是：“一切都不令人鼓舞。”我决不会忘记马格里特·米利埃，他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十分清晰的思想完成了一些无比重要的任务，其中最令人厌烦的任务就是整理加斯东·帕莱夫斯基起草的文件。

还应当谈一谈伊丽莎白·德米里贝尔领导的新闻处。与法国记者相比，外国记者，特别是英国记者，跑新闻处跑得更勤。他们从那里可以了解到在这个混乱时期中将军办公室生活中最微妙的一些问题。将军的许多助手来自伦敦和阿尔及尔，在理解法国政治生活中不可捉摸的问题上还有一些困难。或许当时人们还很不了解荒谬而复杂的议会里的繁琐问题。但是，抵抗战士与法奸之间的差别、德国占领所造成的敏感问题，再加上战前的传统习惯等等，这就使得新闻界、抵抗运动和各党派之间的关系特别微妙。对于许多响应了戴高乐将军6月18日号召的青年来说，一同法国接触，便感到困惑不解：他们的亲属和朋友，大多具有爱国的甚至“黩武主义”的传统，都是在贝当元帅威望的影响下走上维希道路的。相反，抵抗运动许多领导人的表现，正是人们长期以来告诉他们要加以反对或担心的。由此而产生的一些误解，却被在共同行动中表现出来的巨大诚意和热情消除了。我不相信在一个政府首脑的办公室里，能经常有这样的同志情谊。这种同志情谊的产生不是由于出身相似，不是由于智育或社会教育相同，也不是由于党内团结，而完全是由于具有完成任务的自觉性。戴高乐将军后来所倡导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的精神，在这个由几十名男女组成的班子里已经得到了体现；他们来自社会、政治、宗教等各个方面，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理想。用理想一词并没有什么不当之处，而且我还

要冒昧地加上一句：1944年至1946年期间，对戴高乐将军左右的人来说，大公无私或者无论如何也要保持廉洁乃是绝对的准则。这本来应当是普普通通的事，但经验却证明并非如此。

我们的时间大都花费在交际应酬这类苦差事上面。幸好，那些最可怕的差事时间都不长，其中有一项就是接受大使们的国书。这件事事先从来不做任何准备。在身穿礼服的礼宾司长到来之前的片刻之间，各个办公室里异常忙乱。一些接待人员和警卫忙忙碌碌地搬走加斯东·帕莱夫斯基用的家具，形形色色的“密使”跑遍了所有的房间，寻找衣着象样可以撑撑场面的内阁成员。按照惯例，文职人员和军人的数目要相等。在军事办公室里找人总会有结果，而在文职人员中间找人却显得比较困难了，因为至少要求有一件白衬衫。我们中间有的人不得不匆匆向副官居伊中尉借件衬衫，他的卧室就在这里，因此他的衬衫也在这里。

应当承认，对我们来说，将军先后对法国各地进行的访问，比身穿白衬衫、被人介绍给各国大使的荣幸更具有吸引力。至于我自己，我曾高兴地和他一起走遍了我的故乡奥弗涅，我们也曾陪同摩洛哥的苏丹及其随行人员，在这个以鹰像著称的地区游览。我还记得康塔尔省的一位正直的农民，他在这些摩洛哥显要经过的地方叫喊说：“黑人们了不起！”可是，我并不相信这种热情的欢呼声能使人们都感到满意。还有一次，我陪将军视察巴黎市郊。那是在1945年1月，由于天气寒冷和缺乏食品，工人们处于严重的困境。在那次视察中，我曾设法使副官德庞普洛纳中尉息怒。在郊区的一个区政府里，使德庞普洛纳感到惊愕的是，将军受到了共产党区长雷蒙·居约先生的欢迎。夏尔·德庞普洛纳曾在俄国被俘，越狱后又被拘禁起来，他在苏联停留期间受到了俄国官

员们令人厌恶的讯问。他对我说，就是这个雷蒙·居约当时曾积极协助俄国官员。如果我说明了这一点，大家也就更加明白他为什么会感到惊愕。

在交际工作中，还有一项就是在纳伊区戴高乐将军的家里举行晚宴。出席这类晚宴的角色，通常是将军办公室的“一家人”，副官们在安排客人的“轮换”名单时非常注意礼仪和可能存在的敏感问题。随着岁月的流逝，我的管理工作越来越得到欢迎。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1945年9月25日的一次晚宴，贵宾是莱昂·勃鲁姆，陪同他的有他的夫人、儿子和儿媳。就是在那天晚上长时间的单独谈话中，戴高乐将军告诉莱昂·勃鲁姆，他想在制宪议会会议结束后退出政界，并建议这位社会党领袖接任。勃鲁姆借口年迈体弱，拒绝了这一建议，同时推荐了“法国的艾德礼”^① 费利克斯·古安。

参加那天晚宴的还有安德烈·马尔罗。几个月以前，他已重返圣多明尼克街。大家很少见到他。我并不是在那时才有可能赢得这位伟大人物的友谊的。他曾力图使戴高乐主义的思潮在全国消失。不过，这是徒劳的，因为各政党已在各地重新组织自己的干部队伍，而且在网罗本党的支持者，并在尽量避免从正面攻击将军声望的同时，利用将军的名字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因此，在这种含混不清的状况之中宣告了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共产党人几乎不再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更加胆大妄为的激进分子已就法国人民走回头路的愿望大做文章；对于社会党人来说，充当犹大^② 的时刻快到了；在1945

①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1883—1967），1935年起为英国工党领袖。1940年起先后任掌玺大臣、枢密院院长、首相等职。——译者

② 《圣经》中出卖耶稣的耶稣门徒。——译者

年夏举行的社会党代表大会上，达尼埃尔·梅耶煽起了一场抗议的风暴，他大声叫嚷：“我们要记住，我们是一个戴派党。”只有人民共和运动仍然是一个“忠诚的党”；但是，它奉行邦杰曼·龚斯当^①的格言：“让我们为高尚的事业服务，为我们自己服务。”

国民议会的会议一开始，人们就发现，解放时的气氛恶化了。人们现在还记得，共产党的奢望曾给政府组阁造成了困难。当时，社会党以“强制委托权”^②的形式要求按照国民议会的榜样组成政府，而共产党在国民议会里的席位超过了25%。但是，社会党后来却恬不知耻地指责戴高乐将军让共产党入阁，并且吹嘘自己把共产党赶出了政府。我想没有必要长篇大论地叙述那些众所周知的事情。将军曾一度决定放弃让共产党参加政府的想法，后来又象大家所知道的那样改变了主意。这在当时曾使人们感到不安。下面引用的11月19日的电报可资佐证：

“属于法国的您的小岛，从1940年6月以来一直站在您一边，现在它要求您继续执政。

您的惊惶不安的森岛”

最后，终于找到了一项折衷的解决办法（共产党出掌陆军部和装备部）。但是，大家都觉得魅力已经消失，旧戏将要重演。我在前面说过，弗朗索瓦·莫里亚克曾经维妙维肖地描述制宪会议头几次会议的情景。在这些会议上，法国参众两院对头面人物的传统仇恨一下子就重新表露出来，更何况这样一个享有盛誉、举国感激的人想要实行统治，那也实

① 邦杰曼·龚斯当（1867—1830），法国著名作家和政界人物，原籍瑞士。复辟时期曾为法国自由党领袖。著有小说《阿道夫》等。——译者

② 原指议员必须按照选民意见办事。——译者

在是太过分了。从字面上的意义来说，一个几乎全靠将军声誉选出来的国民议会，过了不多久就只想摆脱他了。

对我们来说，这是属于感情的范畴，但又掺进了另外一些因素。同法国历届的议会一样，国民议会不能容忍由政府实行治理的主张。每个众议员、每个众议员小组都希望能够不断对政府行使的职权进行干预，对政府指手划脚、发号施令。此外，将军担任政府首脑，负起政府的责任，还使那些参加将军政府的各党各派，都以为可以把不得人心的措施所造成的后果全推到他的身上，而且可以象过去当反对派时那样，自由地反对这些措施。如果从共产党方面来说，这种态度并不怎么使人感到惊讶，因为人们都了解它的目的，而且在它认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应当和戴高乐共组政府的情况下，这种态度还比较正确，那么社会党的行为却显得较为令人吃惊，甚至令人气愤。例如，在戴高乐将军访问美国期间，社会党的一位部长为了支持该党的竞选运动，竟取消了面包券，而在几星期以后，又不得不通过一项恢复实行面包券的措施，并将采取这一措施的责任推到政府首脑一人的身上。再如，在1945年12月31日和1946年1月1日对预算进行投票时，多数派的主要组成部分的社会党议会党团突然要求削减20%的军事拨款。该党的“战术家”们毫不犹豫地承认，他们要求的削减只是“装潢门面”而已，其目的在于讨好他们的支持者，至于实行与否，则听政府自便，即使在对原有措施大肆渲染一番以后，又匆匆忙忙地通过另一份文件，恢复了原定拨款。但愿人们相信我的话，因为确实是这么说的。在那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戴高乐将军和各党各派对政府的看法有着根本的分歧。如果补充说明一下，社会党当时的正式发言人，就是后来被该党（不知出于什么卑鄙的原因）

贬低到了微不足道地步的卡普德维尔先生，那么大家就会明白，曾在各条战线上不辞辛劳、坚持战斗六年的这位人物到底讨厌什么。这场辩论以妥协而告终（我完全可以说这种妥协是可笑的，因为那是我的主意，是我在走廊里悄悄地对亨利·德比杜尔说的，他后来又告诉了阿维南，由阿维南加以修改……）。戴高乐将军勉强接受了这种妥协，但它并不会使人产生错觉，因为这届政府的寿命已屈指可数了。

戴高乐将军是在什么时候决定辞职的呢？当时我还不知道。过了几个月以后，我仿佛发现，我在戴高乐将军办公室的职责明确了，也扩大了。而且，战争的结束以及后来进行的选举（这不属于我的职权范围），减少了军事和外交政策的相对的重要性，增加了国内政策的份量。然而，当时我对戴高乐将军的秘密和他私下磋商的情况不太了解。他在选举前就有过的辞职打算，在制宪议会开会以后以及在1946年1月1日的辩论中，都不可能不重新显露出来。他在南方逗留的那几天里，这种打算是否已经变成一种决定了呢？我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固然当时尚未作出最后的决定，但我认为，在1月16日（星期三）那场令人厌恶的议会辩论发生时，就已经作出了最后的决定。在那一天的辩论会上，人们看到，爱德华·赫里欧在给戴高乐将军上“军事荣誉”课（这指的是给1942年11月在卡萨布兰卡抵抗美国登陆部队时牺牲的水手追授奖章，并且不合时宜地在“政府公报”上发表，以便海军部门补办手续），而且人们还认为，爱德华·赫里欧在会议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此人既自高自大，又老奸巨猾，就是他当时在恭维莫里斯·舒曼的一次演讲时说：“您使我想起了我说过的一些话。”

不管戴高乐将军的决定到底是在哪一天作出的，直到最

后一刻，即使对将军最亲密的同事也仍然秘而不宣。1月20日（星期日），戴高乐将军在内阁特别会议上宣布辞职。我认为，加斯东·帕莱夫斯基是在17日（星期四）知道的。总之，我是在那一天知道这个秘密的，因此我认为，制宪议会16日举行的会议打消了政府总理最后的犹豫。共和国特派员的午餐会于18日（星期五）举行，他们应内政部长的召集而来，每月在巴黎聚会一次。按照惯例，戴高乐将军要为他们举行一次午宴，午宴后，先同他们交换看法，然后再阐明他自己的政策。正是这些即席谈话最充分地表明了将军思想沉着、语气高傲。然而，这次聚会是在特殊情况下举行的，因为地区性的组织已被禁止，而且已经决定在春季取消共和国特派员的职位。当时在场的人，都对法国国内组织即将发生的变化感到担忧，也对自己个人地位即将发生的变化感到担忧。他们曾经以各种各样的身份充任临时政府最忠实可靠、最引人注目的助手。他们的消失是一个重大事件。将军的消失将是一个更为重大的事件。将军在例行的简短讲话中没有透露任何东西。他找到了他们中间的“年序最长者”，把他带到了自己的办公室。这就是勒戈尔热先生，他原先是布雷斯特激进社会党参议员兼市长，后来担任行政法院的法官。十分钟以后，勒戈尔热从楼上下来，神情显然非常激动。他搓着手兴高采烈地说：“事情要闹大了！”我之所以引用这句话，是因为象勒戈尔热这样属于法国激进派中传统的政治工作人员之列、但又被抵抗运动加以深刻改造的一个人，当时显然是赞成戴高乐将军的决定，赞成决定所体现的不让人拉回到1939年政权的道路。几年以后，就是这同一个人，由于受到他的党的指责和旧习惯的影响，不仅谴责法兰西人民联盟，而且回过头来谴责戴高乐将军的引退。法国人就是这样难以

驾取，一旦听任他们放任自己，那就更难以把他们拉回来了。

除了戴高乐将军办公室的几名成员和共和国特派员以外，只有少数几个部长在1月17日至20日期间知道了将军要辞职。在他们中间，除了“戴派”以外，还有各大政党的几个成员，如皮埃尔—亨利·泰让和贾科比。贾科比是由我奉命通知的。他听了以后顿时脸色苍白，我看得出来，他的感受非常强烈，可是他并没有用别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感受。

戴高乐将军离开了政府，他的办公室也就解散了。那里的人谁也不准备留在费利克斯·古安先生的办公室。^①因此，每人都重操旧业或返回原单位。而我的情况稍有不同。因为让·多内迪厄·德瓦布尔在1945年秋天，曾说服我申请担任行政法院审查官。我本人根本没有这种想法，他向我表示的友情和敬意感动了我。再说，能够进入国家第一流的机关，我也感到高兴。但是，当我的任命还未下来时，戴高乐将军让内阁批准了一项决定，一有空缺就任命我。这份“遗嘱”后来由乔治·皮杜尔政府付诸实施（皮埃尔—亨利·泰让在这个政府里担任掌玺部长），不过推迟了几个月，为的是在任命我的同时，还任命樊尚·奥里奥尔的办公室主任。因此，在1946年春夏两季，直到遇上这么一个小小的机会，人民共和运动的领导人仍然愿意谨慎地对待戴高乐将军和社会党。将军在1946年3月25日同我的一次交谈中说起了这一点，在谈到皮埃尔—亨利·泰让的时候，他大声说道：“可怜的家伙！”可是，他对谁又不是这么说的呢！

在等待任命的期间，我没有回大学去，而是当了奥弗涅的共和国特派员亨利·安格朗的助手，他已被任命为旅游总

^① 如要了解1946年至1955年间的情况，请参阅第二部分的《有关文件汇编》的附件。

署主任。即使任命我为行政法院的工作人员，我也要 and 安格朗共事三年。我对旅游业有着十分良好的回忆。到行政法院工作时，我要完全专心致志、自觉自愿地从事严肃的诉讼案。而旅游工作接触到的问题已经把我改变了，也使我摆脱了这种繁琐的事务。应当说，没有什么更比学习新东西更令人振奋的，我甚至有好几年时间曾热衷于行政法。

尽管如此，将军退职所造成的一个意外后果，就是使我同他更接近了。随着形势的变化，将军办公室的许多成员都已经散了。例如，政府秘书长勒内·布鲁耶和让·多内迪厄先后前往突尼斯。后来，勒内·布鲁耶在突尼斯迦太基他的家里接待过我。有些人仍然同加斯东·帕莱夫斯基保持联系，并回到了布朗利沿河大街的那所房子。我也是其中之一。在布朗利沿河大街，我、克洛德·居伊，还有另外两三个人，同路易·瓦隆一起安置了将军的“档案”。路易·瓦隆设法得到了他的朋友、货币和奖章管理局局长罗贝尔·拉科斯特斯的任用。

然而，在十八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很少有机会见到戴高乐将军。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科隆贝度过的。那里有一名副官值班，通常是克洛德·居伊。他在那里接待来访者。我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去钻营这个头衔，而且我已经忙于尽力履行自己在行政法院和旅游总署的新职责了。将军在路过巴黎时曾召见过我一、二次，但从谈话中并未看出他在考虑要我同他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

戴高乐将军同各政党谈判，特别是同人民共和运动的谈判，导致他在埃皮纳尔发表了演说，并使1946年颁布的第二部宪法遭到了反对。这些谈判对我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不过，我还记得1946年秋季公民投票的结果，还记得那些叫人

投票通过宪法的人，看到戴高乐将军争取到了全国三分之二的人投弃权票或反对票时感到十分沮丧。宪法还是通过了。在议会里，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即使加起来，也不再是绝对多数，激进派和温和派的人数更多。除此之外，新旧议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后来就成立了法兰西人民联盟，我和大家一样，是从戴高乐将军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说中获悉的。再往后就是1947年市政选举的竞选、万森跑马场的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有将近五十万人向戴高乐将军欢呼，欢呼在市政选举中取得的胜利，特别是在巴黎、马赛、里尔、波尔多市政选举中取得的胜利。在此期间，世界发生了变化：莫斯科会议确认了美苏决裂；法国共产党人不得不离开拉马迪埃政府；美国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北大西洋公约、马歇尔计划），把西方聚集在它的周围。但是，人们早就可以猜想到，美国给予法国的支持将使现存体制得到巩固，有地位者惊慌不安的心情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从社会党直至人民共和运动和激进党的各政党的神圣同盟。这个同盟的唯一想法，就是靠美国援款生存下去，并且消耗革命的力量。在市政选举中，法兰西人民联盟已经对革命的力量进行了一次检验。一场有时间限制的斗争开始了。在这场斗争中，各利益集团都反对将军，将军终于在1951年的普选中败北。

不过，这是后来的事了。现在，我回头再来谈谈1947年秋天的情况。当时，法兰西人民联盟在选举中取得辉煌的胜利。皮埃尔·戴高乐当选巴黎市议会主席。拉马迪埃政府刚刚垮台。我成了将军府上的常客。

怎么会这样的呢？什么原因呢？戴高乐将军对我和我在他办公室工作期间的回忆起了一点作用。加斯东·帕莱夫斯基，路易·瓦隆（当然是他！），特别是与将军形影不离并

善于利用自己影响的克洛德·居伊，他们当时对将军说的话也起了一点作用。但是，我作为戴高乐基金会（以后更名为安娜·戴高乐基金会）司库所起的作用，很可能有助于我成为将军府上的常客。基金会成立时，让·多内迪厄·德瓦布尔负责制订基金会的章程，最后又当上了司库。在他动身前往突尼斯时，他提名我接替他。他说了那么多蠢话，说我可以靠洛特希尔德家族来资助这个慈善机构！实际上，我当时并不认识洛特希尔德家族的人。此外，基金会是靠社会保险机构支付的“日工资”，这种“日工资”极低，而且是修女们勤俭节约出来的。这就是说，我的作用相当小，只限于根据支出和收款日期之间的时间，来进行检查并做好最低限度的准备。不过，这使我能够同戴高乐夫人时常接触，有时还同戴高乐将军本人接触。我还记得1946年3月25日同他的那次谈话，他在谈话中象替自己辩护一样，向我解释了他辞职的原因，而且禁不住对未来作了一番悲惨可怕的描述：法国的未来将被第四共和国牺牲掉；世界未来的危险将起因于苏美之间迫在眉睫的战争。这种悲观的情绪或许反映出他有点痛苦和失望。我记住了关于盟国对我国态度的那句话：“连我也无法永远养活一个懒惰的法国。”

不管怎样，即使我没有参加导致成立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讨论，将军对我的态度也日益明确了。我放在附录中的将军给我的两封回信可资佐证。一封是他在离开政府的时候写的，另一封是他在1947年生日的那一天写的。前一封信写的是普通的客套话。^① 后一封信^② 完全是另一种语气，以后的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4。

②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5。

信也就可想而知了。克洛德·居伊把这封信交给我时对我说：“这样的信几乎没有人收到过。”

在叙述我同将军的直接合作之前，我先要简单地说一说我在法兰西人民联盟成立后所起的作用。该联盟领导委员会的组成，使加斯东·帕莱夫斯基大为失望。他本来认为戴高乐政府即将成立，并曾设想在这个政府中出掌外交部。但是，莱昂·诺埃尔和贝努维尔进入了领导委员会，或许还有谈及此事的那些话，对他来说，仿佛把外交部的大门关死了。他当时的想法是成立一个智囊委员会，负责为将军研究“重大问题”，并为必须进行的改革做好准备。加斯东·帕莱夫斯基要我掌握这个委员会的“总秘书处”。于是，我同意了，但同路易·瓦隆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不过这是头一回。因为，他们提出付给我报酬，我拒绝接受，同时说明我情愿提供无私的协助。“啊！你是怕承担责任，”瓦隆对我说。他把承担责任同“领钱”连在一起了。不管怎么样，我的意见还是占了上风。我得到了一笔经费，因此我能在靠近索尔费里诺街拐角处的大学街69号租了一小套房间，离联盟总部只有一百米，并且雇用了一名女秘书。我聘请的是曾经在圣多米尼克街让·多内迪厄·德瓦布尔那里当过秘书的马德莱娜·内格雷尔。她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因为她是戴派，很不乐意和费利克斯·古安那帮人在一起。这个“智囊办公室”由我负责多年，甚至在我到将军身边任职后，也仍由我兼管。到那里去的有：米歇尔·德勃雷，他总是在搞联盟章程草案；雷蒙·阿隆，他很有远见地描述经济形势和货币情况，而且非常自信地作出预测，但未得到事实证实；亨利和凯里安，他们是我在行政法院的同事，后来的发展则截然不同了；阿尔班·夏朗东，他后来离开了我们，在阿尔及尔的银

行工作；可能还有别人，不过我已经把他们的姓名忘记了。但是，这一切都仅仅是纯理论的。归根到底，最有用的，还是位于索尔费里诺街5号之外、但同它紧挨着的一套房间。在这里完全符合将军对我的期望。由于里面有几个房间，被我安顿在那里的，有克洛德·莫里亚克和他的《精神自由》杂志社，还有福卡尔和他领导的负责法兰西联邦^①的班子。我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套房子里度过的，我给行政法院的报告也是在那里起草的。

事情终于发生了。1948年春的一天，我正在贡比涅参加一个宣传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贡比涅市市长、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成员勒让德尔发言以后，将军发表了讲话。在贡比涅，我不期遇上了瓦隆。两个漂亮的女人一边一个陪着他在散步，一个是布里吉特·弗里昂，另一个是帕特·埃隆。他把我介绍给她们时，称我为“戴高乐将军办公室未来的主任”。当时我大吃一惊。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说的是对的。

1948年4月23日是圣乔治节^②。在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教会对之有些冷淡不恭。就在这一天，戴高乐将军在索尔费里诺街召见我，向我表示愿意委派我担任他的“办公室主任”。他认为这个职务应该由法兰西人民联盟以外的人担任。办公室主任是直接受将军本人领导的，因而要同联盟以

① 1946年的法国宪法规定，由法国和它在非洲的殖民地组成“法兰西联邦”，成员国除法国本土、“海外省”、“海外领土”外，还包括前法属非洲的十二个国家。由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法兰西联邦”日趋瓦解。1958年，法国制订的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把“法兰西联邦”改为“法兰西共同体”。——译者

② 圣乔治为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的亲王，于公元303年被罗马教皇迫害致死。——译者

外的政界以及行政机构或经济界建立和保持联系。我原则上接受了。将军对我说，如果我最后打定主意，他就去见行政法院副院长卡森先生，以便使我在他那方面不会遇到任何麻烦。我说，从工作角度出发，我完全可以继续为行政法院诉讼庭安排必要的时间和提供必要的档案材料。当天晚上，我同居伊上尉共进晚餐。自1946年1月以来，居伊一直以他应采取的方式担任这项职务。我觉得他内心里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思想，他希望由我而不是别人来担任这个职务。5月12日，我再次见将军，向他表示我最后决定接受他对我的委任。他建议我选用蒂博(特罗多巴斯)为助手。蒂博是我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他到伦敦以后一直同雅克·苏斯戴尔合作。5月，我同将军在拉佩鲁斯旅馆再次谈话。在谈话中，我对此事提出了几点保留意见。一方面，我不愿同法兰西人民联盟总书记苏斯戴尔发生任何联系。尽管我同苏斯戴尔的私人关系很融洽，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担任的角色是重要的。另一方面，我个人应付工作已绰绰有余，特别是我想让克洛德·居伊继续发挥他原来所起的作用。此外，自从这次谈话之后不多久，有一次我同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友共进午餐时碰见了蒂博，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并不是所有的人对我到将军身边工作都是表示欢迎的，索尔费里诺街的一些人正在考虑，是应该立即还是晚些时候把我干掉。总之，蒂博事件不应再出现余波了。

6月初，勒内·卡森召见了，他事先已见过戴高乐将军。他同意我担任此职，并要求我谨慎从事。这符合他谨小慎微的作风，也符合我的意愿与性格。

7月份，我同戴高乐将军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单独谈话。我对此仍记忆犹新。将军回顾1940年的往事时颇有怨言，特

别是对那些国会议员毫不留情。他说：“1940年7月，在维希政府内，出现了一些所谓‘共和党的反对行动’，但没有任何一次行动是反对停战的，也没有涉及6月18日的号召^①。1942年以前，他们和我没有任何接触。也许因为当时维希政府开始逮捕国会议员，但是他们更愿意同丘吉尔和罗斯福联系，因为他们想摆脱法国”。过了一会，将军向我谈到1944年夏季阿贝茨、皮埃尔·赖伐尔和爱德华·赫里欧共进的一次晚餐，并作了讽刺性的描述。

在这些单独谈话中，戴高乐往往就全局性问题侃侃而谈。例如，我在笔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机器出现后，从此天下纷纭。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来到了世间，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着。野心勃勃的人当然是有的，但总的说来，人们安于现状。现在，机器定期地、不断地使天下混乱不堪。谁都不满意自己的命运，从布萨克先生到普通的小职员，无一例外。这是个全球性的烦恼。马克思主义本身也不过是生长在机器上的一个普通的蘑菇。你可能会说，英国的情况表面上看来不一样，但是他们没有经受两次外来的侵略，政体没有发生变化，巨兽依然如故，后边是一群俯首贴耳的羊羔（原文如此）；只有在他们中间生活才……法国人对一切都评头品足，横加指责。怎么治理国家呢？怎样才能使人不伸手要东西而去思考别的事情呢？正是这种令人不安的脾气将德国推入战争之中，对德国来说，战争就是消遣。”

我顺便提及了自己对勒内·梅耶和当时的行政法院院长罗贝尔·舒曼的一些不大好的看法，或者有关解放巴黎的某

^① 指戴高乐将军于1940年6月18日，首次在伦敦电台号召法国人民继续对德军作战。——译者

些无关紧要的秘闻。

戴高乐将军也提到了约里奥·居里夫人，说她是“伟大的科学家，思想成熟”。1941年，德国人将她列为保护对象。

“我并不想利用她，但我手里有材料”。

谈到1944年8月的秘密商谈和贝当元帅考虑筹建摄政委员会时，将军对我说：“我拒绝移交任何权力。我不能承认维希政府是合法的。我从来不想承认它，就象我不想承认第三共和国一样，因为承认它就等于承认停战。我原则上可以肯定，从停战之时起，权力就被篡夺了。所以，当我看到那个莱昂·勃鲁姆担心我触犯共和国的合法性时，我十分气愤。我唯一的一次触犯，而且是极为严重的触犯，恰恰是他们在1940年6月18日认可的。实际上，在这种人看来，贝当元帅是合法的。假如当时没有赖伐尔，贝当元帅本来是会同勃鲁姆和赫里欧之流组成政府了”。

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只记得有关罗贝尔·舒曼的一句格言：“长期懦弱终将使你成为老好人”。

8月4日，戴高乐将军对我长时间地谈起已进入安德烈·玛丽政府的保罗·雷诺。他说：“我让人对他说，‘你是这个国家里为数不多的有用人才之一，不要卷入一个将使你一事无成的部门’。他答复我说，他很受感动，但他已经陷得太深了。去他的吧。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我还以为他具有政治家的气魄呢。他只有国会议员的勇气，但没有政治家的胸怀。1940年，我又见过他。他把我叫去，我耐心地对他说：‘投降或去阿尔及利亚，两者之间你可以任选其一。’正是为此，我催他先到布列塔尼去。因为我知道，一旦德国人到来，他是会上贼船的。6月14日，在图尔，保罗·雷诺同可怕的博杜安一起舌战丘吉尔、哈利法克斯、坎贝尔、比弗布

鲁斯和斯皮尔斯。他回避了所有其他的人。我走进屋里。他不好意思让我出去，我就这样参加了他们的大部分讨论。唯一的议题是：‘还我自由，也就是单独签署停战协定的可能性，我向你们保证不交出舰队’。6月15日，我在波尔多对他说：‘你应该到阿尔及利亚去。’他对我说：‘我去’。‘你去吗？’‘是的’。‘那我就去伦敦商谈，准备必要的船只，把尽可能多的部队送去’。‘好吧’。我来到了伦敦，要了船只后，我从唐宁街给雷诺打电话说：‘比利时国王或克列孟梭^①，两者任你选择’。丘吉尔接过电话说：‘雷诺，戴高乐说得对’。保罗·雷诺回答说：‘我得看看，我会尽力而为’。6月16日，我来到波尔多。所有的人都辞职了。我见到了保罗·雷诺，他同波尔特夫人和马尔热里夫人在一起。到那时为止，他的表现还好。他们一起游玩，谈论着旅行和孩子，个个如释重负。他明白了：麻烦又开始了。保罗·雷诺两眼只盯着国会。当他见过赫里欧和舒曼后，便以为一切都清楚了。他不了解广大群众，也没有看到1940年全世界广大人民的行动”。

我还记载了这样一段话：8月31日，戴高乐将军在巴黎呆了一个下午。克洛德·居伊力图说服我，说我去见将军并没有多大意义。不过，在他动身的时候，我在楼梯上偶然碰到了将军。他对我说：“噢，原来你在这儿啊。我真没想到。中午到科隆贝同我们一起吃饭吧。”我详细地记载了这段小插曲，因为它对客厅内发生的事具有某种象征性的意义。果然，几天以后，我注意到戴高乐将军同克洛德·居伊的关系紧张了。

^① 乔治·克列孟梭（1841—1929），法国政治家，曾两次出任内阁总理，并参加了凡尔赛条约的谈判。——译者

在这里我还想附带说明一点。我觉得，在我对国家事务不起任何作用的那些年代里，能使读者感兴趣的，无非是由于我天天记笔记，读者可以从我同戴高乐将军的谈话里了解到一些情况。我叙述法国或世界的政治生活，并非出于不正当的动机；没有我提供的材料，历史学家也是可以撰写历史的。我在这里只想简要地介绍我本人的经历以及将军左右的人。

首先介绍一下我的经历。除了在行政法院诉讼庭的工作以外，我继续在政治学院主持教学法讲座。直到1958年，我一直承担这项工作。我对教学以及同青年人接触感兴趣，而这项工作能使我感到满足。相反，我放弃了旅游总署总秘书处的职务，以便更多地致力于将军办公室的工作。

我在上边已经提到，我在1947年应我的朋友、突尼斯政府秘书长勒内·布鲁耶的邀请前往突尼斯。布鲁耶安排我到突尼斯南方旅游。我惊奇地发现，当我们乘坐的官方汽车经过一些农村时，人们显然是敌视我们的，甚至向我们扔石子。我当时并不了解北非，以为它无疑是法国的延伸部分。这种遭遇使我感到十分困惑，而且后来对我在阿尔及利亚危机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也有影响。

至于将军身边的人，他们几乎全都确信（但我除外）将军即将重理朝政。这就使他们的竞争激化，使他们的野心急骤膨胀。在戴派的威胁面前，历届政府怒不可遏。1948年春末，当朱尔·莫克捏造圣灵降临节阴谋时，就出现过这种局面。总的局势和连续不断的危机加剧了这种愤怒情绪。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于9月4日到科隆贝去进午餐，这是我参加过多次的礼遇。我是在将近中午时赶到的。有人把我直接领到办公室。下午1时，我们收听了新闻广播，随即开始用餐。在饭后饮咖啡时，我们又开始了交谈，戴高乐夫人也在场，但

她没有说话，往往是忙着手中的针线活。后来，将军拉我到花园里散步。他走得很快。转了一圈后，我们又回到办公室，继续交谈，谈话的内容也越来越一般化。下午4时左右，则看天气如何，如果天气有雾，大家就催我赶快返回巴黎，否则就和大家一起喝茶，然后再上路。将军的接待是亲切友好的，也是十分庄重的。

9月4日这一天，将军对我几乎无所不谈。他认为政治局势的特点是领导人逃避责任。

对于这个问题，将军提到了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当时成群的被流放者和囚犯在亨利·弗雷内负责的那个部的楼前游行示威，高呼：“吊死弗雷内”。

“所有这些人，包括人民共和运动在内，他们的观点是让共产党人回到多数派当中来，但由于美国的缘故，他们还不能这样做。当时，我们要么进行选举，要么彻底垮台。否则，我将被架空。他们不愿隐退，因而不想求助于我。你还记得1945年10月勃鲁姆的态度和1943年他写给我的那封信吧。他在信中谈到了共产党，谈到了社会党，无所不谈，就是不谈战争，这还是在1943年！赫里欧呢，他在1946年2月，说我一碰到暗礁就避开了。在他看来，我在1940年至1945年之间没有碰到过暗礁，因为只有国民议会里才可能有暗礁。对这些人来说，1940年至1945年是个间歇，在这期间似乎什么都未发生。1940年7月，维希政府的机器停止了转动；1945年12月，政府又和议会同时恢复了活动。同谁一起治理国家呢？在法国，杰出的人物焦虑不安。实质上，这一切都涉及到合法性问题。1789年以来，公认的合法性已不复存在了。第三共和国试图恢复重新树立合法性，而且在1918年几乎取得了成功。第三共和国取得了胜利，本来应该由克列孟梭

和普安卡雷这些策划者执政。但是，与此相反，各党派又各行其是，并摧毁了一切还可以保留下去的东西。1944年，假如赫里欧和勃鲁姆愿意的话，本来是能够以我为中心重新组成合法机构的。这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然而，他们却只想建立一个与我为敌的政权。有必要重新夺取政权吗？怎样夺取呢？和谁一起去夺取呢？可怜的法兰西！在战争年代里，法国没有战斗。每当有个不幸的人被杀害或枪决，就到处树起墓碑或纪念碑，这样的墓碑和纪念碑到处可见，数不胜数。这是令人感慨，也是令人伤心的。你看，人们并没有什么欢乐的表情。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贝奈斯^①去世了。他本该早死半年。丘吉尔想永垂青史，因为他想同斯大林打仗，但将来他是不会打的。那么，他为什么要重新出面呢？在法国，我们处于崩溃的边缘，这种处境我们也见过多次。不过，有共产党人，问题就严重了。他们有组织、有军队、有领导。他们可能取胜。那样，一切就全完了……文明的基础何在呢？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它捣毁。看看罗马吧！我们对罗马各大家族的名字都很熟悉。它们谁也未能在野蛮人的侵略中幸存下来。可想而知，这会造造成多么严重的破坏和毁灭啊！你在圣奥迪尔见过异教徒墙吗？可以想象，那些不幸的人们用自己的双手把这些巨石运来，这该令人多么心惊胆战啊！另外，农奴制只不过是把农民拴在地里的一种手段，为了阻止他们由于害怕野蛮人而逃跑。兵燹、凶杀、强奸层出不穷；农民四处逃亡，饿殍遍野。法国成功地生存下来了，这的确有点象中国。不过，依靠共产党人，俄国人也生存下来了。他们可能放逐居民，摧毁篱笆，让拖拉机便于行驶……还有，

^① 贝奈斯(1884—1948),1935—1938年、1946—1948年曾二次出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在1940—1945年曾领导在伦敦的捷流亡政府。——译者

这是否可信呢？在俄国，我看见农民象沙皇时代那样在火车站上卖鸡蛋。”

在这次长时间的谈话中，我还记下了将军对外国的一些看法：

关于墨索里尼，将军说：“只要他为意大利民族本身的利益服务，他就是伟大的。任何伟大的行动没有不符合民族本能的。一旦他为希特勒效劳，并背叛了拉丁民族时，他就完蛋了。也许他打算玩弄阴谋诡计呢？他希望法国和英国战败，好让他能得到他想得到的东西，但又不要败到他无法利用它们来遏制希特勒的地步。然而，如果法国和英国战败了，希特勒也一定会吞掉意大利。墨索里尼已经老了，他过高地估价了自己的国家……你还记得希特勒在墨索里尼被游击队抓住那天的讲话吗？那是他第一次讲了人话，他预料到自己的失败的日子已经临近了……”

关于英国，将军说：“我摸透了英国的底细。英国是本能地反对法国的，到处与法国作对，但有某种限度。美国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法国。他奉行自己的政策。对它来说，是不存在什么限度的。有一天，我对罗斯福说：‘美国意识到自己应起一个大国的作用。法国已不再是一个大国了，但它知道什么是一个大国。一个国家成为大国时，就不允许别国反抗。它只知道把别人当作工具；它不容许争辩，只会发号施令。’他没有反对我的观点。”

关于德国，将军说：“它越来越重要，它正准备讨价还价。它利用俄国来实现本国的统一，然后转过来反对俄国。不过，这是个危险的把戏。”

总的说来，我觉得他感到了失望。他说：“如今世风日下。五十年后，世界也许会变样。”

我记得，九月份在贝勒夏斯街召开了一次政策研究委员会会议。该委员会是在克耶政府组成后建立的。会上，雷蒙·阿隆就即将向我们袭来的迅猛异常的通货膨胀做了可怕的描述。我看法不同，我提醒他说，长期以来，货币流通量的增长速度第一次低于物价上涨的速度。他回答说：“这就是信号。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通货膨胀十分猛烈，因此无法印刷足够数额的纸币来满足要求。”我谦虚地说，我认为与此相反，我们将面临一个暂时稳定的时期。后来的事实证实了我的预料。

同样是在这个月里，将军去格勒诺布尔视察时，发生了一起事故，造成一人死亡。这使当时的政府和朱尔·莫克找到借口攻击将军，并撤掉了他的警卫，就如同拉马迪埃撤消了克洛德·居伊重新应召服役的后备军军官契约书一样。真难以想象，这些人的心胸竟如此狭窄。

我偶然记下了帕罗迪在一次午餐上发表的下列意见：“每当我同将军讲话时，总是一无所获。”

有一次，我同安德烈·马尔罗共进午餐。他说：“将军并不得人心，他只是享有盛誉。甚至在马赛，当马里于斯喝了几杯茴香酒时，如果他听到将军讲话，也感觉到自己参加了创造法国历史的行动。共产党人的唯一出路就是消除人们头脑中认为戴高乐将军代表法国荣誉这种思想。”

1948年10月7日，我同将军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

他说：“我们的时代面临两条出路：一是民主；二是努力创造另一种东西。我们已经见过这另一种东西的极端形式：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我赞成民主的道路。即使这条路行不通，我们还要坚持下去。我要保持法兰西人民联盟，

但也要加强宣传工作。此外，法兰西人民联盟不过是个工具而已。许多人并不喜欢这个组织，因为他们不想参加什么派别，而且正如德波利尼亚克先生所说的那样，‘他们不喜欢别人’，不过他们是会归附于我的。我觉得该做的事我都做了。假如1945年我建立了某种军事独裁，它也会以造成有利于共产党人的民族灾难而告终。因此，应该让这种所谓的民主建立起来，但事先就应加以谴责。我已给他们套上笼头，使他们无法摆脱，而且在此期间，国家也将逐渐习惯于遵守必要纪律的说法。

“然而，最大的障碍该是公民思想情绪的低落和民族意识的消沉。这是在1940年。全国人民都同意放弃主权。我们可能战败于沙场，也可能因此付出割让几省领土和偿付战争赔款的代价，但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国家主权，从来没有让敌人查阅外交函件，让敌人同意任命大使、颁布法律等等。然而，包括赫里欧和勃鲁姆在内，大家都接受了这一切。今天，‘蒙哥马利事件’^①也同样如此。国家的防务落到英国人手中，人们对此却泰然自若，问题就在这里。”

我表示，舆论之所以无动于衷，可能是因为觉得事件本身仿佛是一出闹剧。

他说：“是这样，但维希政府也是一出闹剧，而且是公开演出的一出闹剧。我说我同敌人合作，但这不是真的。这就是米尔博事件：离奇的被告，离奇的案件，离奇的起诉，离奇的审判，然而到头来还是真的，上了断头台，而受害者大声疾呼：‘这不是真的，是开玩笑’……”

“我们的政治形势也会如此。我劝说人们仍采用民主的

^① 根据组织西欧联盟的条约，各国部队组成的武装部队由英国蒙哥马利元帅指挥。

解决办法，可是他们为了使自己留恋国家要职而毫不退让，这就会把国家引向灾难。到那一天，他们会目瞪口呆，因为他们要付出代价。如果共产党人取胜了，他们就会被吊死。如果是我取胜，他们也会被吊死，当然这是打个比方。

“实际上，这一切都无关大局。整个世界也都很消沉，就说美国吧，除非它自己遭到攻击，否则它总是袖手旁观。”

我反驳说，将军们完全可能制造事端。

他回答：“将军们如今也都是官员了。”

这一年的10月末和11月份，人们主要忙于“邮票运动”和准备共和国参议院的选举。“邮票运动”就是向科隆贝发出大约七十万封信件，为法兰西人民联盟出售三百万张邮票。

关于共和国参议院的选举问题，我注意到在人选问题上，人们从各个方面来敦促我参加竞选。特别是桑戈尔，他答应让我担任塞内加尔参议员。我拒绝了，原因是大家都猜到了的，也是站得住脚的。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我不愿从事职业性的政治生涯。直到1962年，我一直坚持这条原则。

这时，将军收到了保罗·邦库尔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他很遗憾，不能担任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候选人，因为他的党不允许他这样做。戴高乐将军给他写了回信，内容如下：

“主席先生：

“各党派的体制埋没了法国最杰出的人才，这种情况是十分荒谬的。您的来信为我提供了新的证据，这使我感到格外痛心。

“请您相信，我是特别希望看到您参加我认为应该继续从事的复兴与改革行动的。然而，我不能不看到，您参加了一个政党，这就迫使您拒绝向我表示赞同和支持。我认为贵

党的宗派主义与撒手不管的思想是有害的，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贵党的领导人竟然对我肆意诽谤。

“主席先生，你肯定会首先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我本人和聚集在我周围的人必然要到处为共和国参议院的选举推荐一向支持我们的候选人，因为在这个时候，我们希望他们和我们都能得到更大的支持。

顺致最崇高的、友好的敬意。”

另一方面，鉴于巴黎选举团的组成，竞选的结果并不难推测。于是，人们便在巴黎候选人名单上大搞阴谋诡计。特别是竭力使将军接受与世隔绝的人、激进党人或法兰西人民联盟左翼人士。将军对我说：“人们把法兰西人民联盟看作一个垃圾箱。”我也注意到，瓦隆极力再三推举洛特希尔德银行总经理、主管巴黎地区财务的勒内·菲荣。总之，尽管将军本人大力推动，这次选举并没有多大意义。在同一时期，还决定撤掉路易·瓦隆在法兰西人民联盟内部担任的巴黎地区的领导职务，因为巴黎地区不但秩序混乱，而且浪费严重。因此，让瓦隆负责社会政策。瓦隆接受这项工作时相当勉强，因为这至少会使他失掉许多物质方面的好处。他写信推荐克里斯蒂昂·富歇作为他的继任。他在信中措词生硬，借此发泄不满^①。将军对此并未责怪他。瓦隆说应该选择“一个集戴鲁莱德和路易·布朗两人优点于一身的人”。最后，将军只好任用了富歇。

我还记录到了如下的一段话：将军在同红衣主教蒂斯朗进行一次谈话之后，就已经发现共产党人和某些天主教徒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了。他说：“每当共产党人中有人第一次去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6。

教堂领圣体时，他们都叮嘱这些人装作信奉基督的进步人士。这些人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还高唱：“永远是天主教徒和法国人”。

关于柯尼格和德让两人的候选资格问题，将军回顾了1942年的情况：德让违背了将军的指示，向英国人让了步。关于对他的指责，他回答将军说：“将军，我同你一样是法国人。”将军说：“这是可能的，不过你不再是外交特派员了。”

在谈话中，我还随便记下了将军的一些看法：“我们是群众性的政党。无论什么地方，人们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把宗派小集团放在心上，就会取得胜利，宗派小集团也就会归顺了。同样，无论什么地方，要是人们参与了帮派活动，我们那些头脑简单的代表们就会上当受骗。”

还有：“我决不重新起用叛徒。让别的人到我这里来吧，但是背叛过我的人，绝对不行。”

关于托雷^①，将军说：“由于他喋喋不休地重复他那几句话，终于使我们相信他对我们是有恩的。”

11月12日或18日，戴高乐终于在拉佩鲁斯旅馆接见了乔治·皮杜尔。

在我的1948年11月的笔记中，我发现一个美国人写的一封信，将军还为此信加了批注。出于对历史的好奇心，我在这里发表这封信的复印件。为了便于人们了解，我想谈一谈将军在谈到他让人交给亨利·托雷的一封信时所表达的一种想法。在信的开头，将军称呼他“亲爱的托雷”。戴高乐对我说：“一般说来，对于比我年长的人，我是不写上他们的名字的。”

^① 托雷为著名律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纽约负责《法国之声》报的领导工作。1944年7月，他在纽约接待了戴高乐将军。

对于人民共和运动，将军还说过一句话：“它只剩下一小撮谈论教皇通谕的怪人和学究。”

此外，马尔罗同苏斯戴尔之间的争斗愈演愈烈，马尔罗对我说：“我要是猫，他就是狗。”

我是否谈过瓦隆和罗贝尔·拉科斯特主持的一次午餐呢？拉科斯特当时是工业部长，他愿意同我们“保持联系。”在餐后上点心的时候，拉科斯特拿出一包“购车券”（当时很缺）分给我们大家！我当然拒绝了。这是什么作风！

这一年的12月，将军收到米歇尔·德勃雷的一封信^①。信中交织着效忠和哀叹的词句，再就是对党员们宗派主义的批评以及要求同政界各“领导人”接近的劝说。这个古怪的德勃雷！将军把信递给我时说：“这个可怜的德勃雷，他总是叫苦连天。”

12月23日，我同将军就各种不同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他说：“第三势力没有出路。从前有过出路：普安卡雷、杜梅尔格、国家联盟。现在没有了，因为要搞联盟，就要以我为核心，而他们却不要我。那么，他们在想什么呢？

“特别是美国的贷款是不会长期提供下去的！现在，亚洲有了战火。印度、缅甸、印度支那将来也会发生战火的。为了准备战争，美国需要钱。美元将要贬值……

“对我们来说，严重的是第三势力一定会把所有的牌都搞乱。

“应该解散议会。遗憾的是，我们肯定还需要人民共和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7。

运动。我希望，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但我怀疑……怎样说服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各地的干部接受莫里斯·舒曼或皮杜尔呢？我的人为数不多。请你注意，在我所设想的体制里，按照宪法，各部部长都要辞去在议会和他们政党中担任的职务，因此必须想到，他们将会注意这一点，并团结在总理周围。某个人虽然从虚荣心和党性来看今天会有所失，但明天将会成为一个体面的部长。

“总之，要当部长就要辞去党内的职务，否则共和国总统就要根据宪法把他赶走。”

“那么，法兰西人民联盟呢？”我提醒他说。

将军回答道：“它不是政党，因此还可以同时是该联盟的成员，很多人都可以这样，请相信这一点。至于宪法，我把它建立在公民投票和解散议会的基础上。只有向全国发出号召，才能渡过各种危机。可以设想一下，人们不得不对共产党人采取非常严厉的措施。在向全国发出号召后，法国就一定会讲话。而且，如果进行选举，我就会这样讲：法国公民们，我建议你们和我签订一项公约。我将领导政府，并请你们给予帮助，主要是请你们给予帮助。我还要继续对国会负责。因为，只要监督是客观的，那就有必要。”

关于鲁尔协定，将军批评说：“问题还是德国的结构，它应使德国归入欧洲。而且，由于苏联的存在，欧洲的建设更显得必要。”此外，将军在他亲手修改的给库德诺夫—卡莱吉的信^①中也是这样讲的。

美国公民小雷蒙·扬给戴高乐的信

戴高乐批语：我认为他说得对。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8。

将军：

我以美国诚挚、正直、聪明、廉洁的全体公民的名义告诉您，当我看到杜鲁门取胜时，我感到吃惊。杜鲁门的胜利得到了法兰西人民联盟的一家机关报的好评，这是同官方和第三势力的所有报刊是互相呼应的。我希望，我这个无名小卒的介入，至少将有助于联盟领导人从思想上（由于外交政策的礼节关系）纠正由于不了解情况与轻信而得出的这个错误印象。

我曾给您写信，您对其中几封信也曾惠予重视。这就是我作为一个忠于法兰西人民联盟理想的美籍法国人，就美国人民昨天所蒙受的政治灾难向您表达我的诚挚意见的部分原因。杜鲁门的胜利是第三势力的胜利，是懦弱者的胜利，是蛊惑人心者的胜利，是阴谋家的胜利，是贪污行贿的胜利，是无政府主义的胜利，是所谓增加对欧洲援助的高昂代价！

目前，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和今日法国的政治形势相同！但是，美国没有戴高乐！

顺致最崇高的和最诚挚的敬意。

小雷蒙·扬

1948年11月5日于圣克劳德拉兰蒂街6号

1949年

1948年，即法兰西人民联盟取得成功的最后一年，就这样结束了。从此，戴高乐对政权的威胁日益减弱，选举前联盟内发生的几起变节事件和它所遇到的财政困难就是证明。将军期待选举获得全胜，以致对区级选举都给予极大的重视。一月初，当我对他说应该推迟选举时，他气得跳了起来，火

气十足地说：

“当然，当然！难道你是说永远也不搞选举了。民主完了。我要让普选来讲话，我会是最后一个民主主义者！他们的下场会是……，完全如此。他们连搞自己的专政都不够资格，因为那需要……他们太嫩了！不过，他们是不会退缩的，他们象一群受了伤的野兽，还会张牙舞爪，还会咬人。因此，要驱散他们，就得来一场天灾。我把希望寄托在天灾上，而不是寄托在选举上。如果美国善于耍弄手腕，他们就会听凭美国支配。可是，美国和他们一样……于是，他们不得不装出他们就是国家的姿态。然而，这是一种幻想。他们自己，也包括樊尚·奥里奥尔在内，他们都是心中有数。

“解决办法吗？我孤身一人可无能为力，就象战争期间有人对我说，战争拖延得太久，抵抗运动也已感到厌倦时，我不能只身登陆一样。对法国来说，要避免共产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不和政权发生联系，以免自己的名声受到影响。共产党人对此十分清楚，因为他们的口号是‘只要有克耶，就同意戴高乐上台’。那样，或许会同后期罗马帝国^①一样，终将被‘蛮族’^②征服。”

我提醒他说，后期罗马帝国也延续了几个世纪。

他回答说：“现在可快了。当时是老牛拉破车。现在是停不下来了，这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不再有人满足现状。古代解决问题，是靠奴隶制，基督教社会——这个社会也日薄西山——是把希望寄托在来世。现在，奴隶制不复存在，人们也失去了信仰。第二个原因是俄国的存在，而且它还恢复了奴隶制。”

① 指公元235—476年。——译者

② 古代希腊、罗马人所谓的外族是指日耳曼人。——译者

在谈话中，他对有些人迷失方向感到遗憾。这指的是人民共和运动的某些人士，其中包括普利文。将军收到了普利文的一封信，他在信上作了这样的批注：“请让人代我回一封信，感谢他对我和我家人的问候。”普利文来信全文如下：

将军：

值此新年之际，我象往年一样，向您和您的亲人表示敬意和亲切的祝愿。我很清楚您的孙子的诞生给您的夫人和您带来了极大的欢乐。在我根据传统表示的祝愿时，也特地向他致以祝愿。

“圣诞节那天，小女弗朗索瓦兹的第三个孩子贝特朗·昂德洛尔在梅克内斯出世了，我夫人和我都非常高兴。遗憾的是，根据规定，我们还得再等一年多才能见到他。

“我知道您非常关心这些新生命的前途。我希望，在1949年，完全由于偏见和误会而变得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能够终将得到消除。

“祝您在1949年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基于这一愿望，我请将军接受我对您和您的夫人的崇高敬意和诚挚的友情。”

普利文（签字）

1948年12月31日于巴黎

“普利文算完了。我不是说他不能再任部长，但是他完了，我很惋惜。对其他人，如雷诺、赫里欧，我并不遗憾。相反，我还为此感到高兴。赫里欧除了从鲁尔撤退外，其它毫无作为，而且那次撤退还是由于他害怕麦克唐纳造成的，而

后者实在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不喜欢布里昂。但是，他还做了一些事情：实行政教分离、通过了三年法、组织萨洛尼卡远征、签订洛迦诺条约。赫里欧却一事无成。不过他还是个有影响的人物，因为许多人都变得象他那样平庸无能，卑躬屈节。”

就是在这个时期，人民共和运动在皮杜尔的领导下，内部关系似乎变得亲密起来了。将军认为皮杜尔“平庸无能但又诡计多端”。皮杜尔对将军说过：“我的朋友们都有殉道者的精神。”将军说：“我回答他：‘不包括忍受酷刑痛苦！’”

将军向我说明了蓬佩（法兰西人民联盟政治部主任）关于共和国参议院候选资格的政策。他是这样说的：“我是个猪猡，你也是个猪猡。只要你跟我签个契约，听我安排，你便可以为所欲为。”

他提到了让-马赛尔·让纳内作为第三势力的候选人在格勒诺布尔市参加竞选的事。他说：“到我这儿来吧，你会在巴黎得到任命的。”

当时，将军正在起草《致法国公民书》。他感到有必要为自己辩护，说明他为什么辞职。他说：“我给法国公民写信，但是，路易十四那样的时代是不会重演的。”

莫兰向我讲了关于若克斯的一件事。在阿尔及尔，若克斯有一天为法国现状况哀叹。“算了吧，若克斯。法国会把我们统统葬送掉的。”

将军为了消磨时间，曾向我概述了克耶在他的内阁发表的讲话。他是这样概括的：“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能干。因此，目前一切都是最完美的。这就是我的纲领，激进的纲领。”科斯特·弗洛雷说：“那印度支那呢？”；克洛迪

斯·珀蒂说：“还有房租问题呢？……不建住宅了吗？”
社会党人说：“普安索·夏普伊呢？”舒曼说“还有欧洲呢？”于是，克耶对他们说：“让我们各党各派之间休战吧，哪怕装装样子也好！别提普安索·夏普伊，别提欧洲，也别提印度支那。对国家来说，这是令人厌烦的，而对激进党人来说却是那么舒服。我们什么都不做。这就是真正的休战。”

1月21日，传来了蒋介石引退的消息。

将军说：“这是美国人的错误。昨天，我听了杜鲁门的讲话，他谈到了上当受骗的人民。可是，人民，不论是波兰人，匈牙利人，还是罗马尼亚人，都没有上当受骗。他们是被出卖了。杜鲁门是一个可怜的老牌资产阶级政客，是个胆小鬼……因此，究竟把法国舆论引向何方，我还举棋未定。不惜一切代价支持美国，这样做不好。假如手中有原子弹，有实力，就可以放手不管了。万一欧洲出点事呢！在欧洲，高卢人和日耳曼人之间一直存在着谅解。应该最终寄希望于德国，希望德国将来创造出一个神秘的欧洲。唉，要是有个强大的法国该多好！可是法国，有克耶老头在，就吸引不了任何人。”

我提出异议，说：“为什么要让欧洲对抗美国，对抗英国，对抗俄国呢？”

他回答道：“我并不是说要让欧洲去和美国、英国或俄国对抗，但是，必须创建一个欧洲。”

关于任命帕罗蒂为外交部秘书长的^{问题}，他说：这不好。他在联合国时工作很出色，但到外交部就不行，因为他和罗贝尔·舒曼在一起，正好是优柔寡断的一对！”

关于在鲁贝被杀害的一个共产党人或所谓的共产党人，

他说：“人们会说，无论戴高乐将军到哪里，他都会因为死了一个人而受到良心的谴责。我的双手上沾满了鲜血……这倒是真的，但我从来没有先开枪，在叙利亚，甚至在达喀尔，我都没有先开枪。而且，连我开枪打过的那些人也不怨恨我。多么奇怪的国家啊！”

2月6日，我和好几个人共进晚餐。席间，加斯东·帕莱夫斯基讲了几件有趣的事。例如，斯大林在莫斯科曾对将军说：“我见过你们的多列士。我看他是个很好的法国人。请你不要马上把他关进牢里去。”

关于将军和罗斯福、丘吉尔的关系，将军对我说：“表面上，我和罗斯福的关系相当好。但是，罗斯福从来没有宽恕过‘不劳而获的暴发户’。至于丘吉尔，在北非登陆时，他不得不屈从于罗斯福，可又声称：‘我不能和你们的戴高乐一起行动！’”他对将军当初迫不得已而背叛他这一点一直耿耿于怀。

博纳瓦尔从科隆贝回来时告诉我，将军对安德烈·玛丽—圣拉普特和勃里斯公司事件的发生感到伤心^①。将军说：

“从我创建联盟以来，我找到的人全是一群怪人，这是怎么搞的？总有一天，我要把他们赶走，自己也隐居起来，我要对大家说，我曾经设法促使法国团结起来，我没有成功以及我没有成功的原因。”

1949年初，我明显地感到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前景开始暗淡起来。当然，有人说里尔的会议开得不错。但是，付出的代价很高，苏斯戴尔多次提醒将军注意实行必要的节约，

^① 安德烈·玛丽当时任掌玺部长。圣拉普特和勃里斯是一家公共工程公司。

（主管财务的）博泽尔公开抱怨开支庞大。我也认为，如此重视区级选举工作，未免有点小题大作，而且会引起错觉。政治领导的中心工作全放在地方上搞交易上面。当我向将军提议把政治领导委托给德勃雷时，将军回答我说：“他的魄力不够。”但是，将军也了解所处的困境，并开始考虑在1951年进行大选。他说“法兰西人民联盟能顶得住。”不过，他也想到联盟可能失败。假如失败，那就完了。他接着说“假如失败，那就会比1940年的情况还要严重。1940年，人们是在贝当和戴高乐之间进行选择。不论选上谁，都还是个法国式的解决方案。对那些把贝当推上台的人的想法，我是不会搞错的。但是，那时贝当在克莱蒙、里昂、尼姆等地聚集起来的人，我都见过了，都是些法国人，因为贝当当时是一位法国元帅，是法国的希望。明天则要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不发生意外，政权是可以存在下去的。可是，一旦发生意外，就会和1940年一样。没有人来逮捕赫里欧、让纳内和雷诺，也没有人来把勒布伦赶走。政权是自动垮台的。可是，谁能对我们说不会有经济危机、共产主义危险、美国的孤立主义、苏联的推进政策那样的意外事件呢？目前，莫斯科的工作重点是挪威。不是瑞典，也不是芬兰。这是两个‘正派’的国家，不会对我们造成威胁。可是，那个挪威就不同罗！连多列士都会说：‘真可怕！我们最珍视的和平将受到挪威的威胁。’进步的基督教徒也会随声附和，布尔代会写文章，加里·达维斯会发来电报。说什么美国人有原子弹，将来不会总是只有他们一家拥有这种武器！”

2月25日

将军说：“区级选举以后，我要接见金斯伯格·史密斯，

把他们美国人的所作所为告诉他：‘你们是腐蚀人的家伙。你们不但没有扶我们一把，反而把我们都腐蚀了。’早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不顾丘吉尔的反对，就背着我和斯大林作了交易，把欧洲拱手让出。他让苏联进入了易北河地区，进入了维也纳……，因此我拒绝去阿尔及尔到他的装甲巡洋舰上去向他讨好，并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我拒绝了，也讲了为什么拒绝。罗斯福回到了华盛顿，讲了讲主要的情况，后来就去世了。他在世时，美国还有自己的政策。他死后，就没有了。现在是，杜鲁门异想天开，艾奇逊夸夸其谈，参议院的政客们沉思不语，不称职的大使们的报告纷至沓来，银行家、大学教师 and 老处女们意见纷纷……我要对他们说：‘你们都是腐蚀人的家伙。你们的责任是对欧洲说：“起来！站起来吧！”，并且帮助它站起来。俄国是个白蚁巢，没有什么比白蚁巢更可怕的了。面对俄国和它在思想意识方面巨大的实力，应该具有一种精神力量。只有美国才能成为这样的精神力量。’”

我反驳说，精神力量应该来自欧洲，美国应该仅限于帮助欧洲。

“可是，伟大感这种精神力量在哪儿呢？丘吉尔是有的，可艾德礼呢？在德国，不全是纳粹分子。德国国防军^①的骨髓里浸透了德意志伟大感，教会也是，知识分子也是。然而，在纽伦堡，却不分青红皂白，把将军们统统绞死了。错误就在于此！”

2月25日

将军接见了某人。

① 指1921—1935年的德国国防军。——译者

他说：“在灾难之中，德国有一个不卑不亢的阶级。在这个时期，其他的阶级都是奴颜婢膝。然而，只要形势一好转，这个阶级就仿佛横了心似的，态度一下子变得硬了起来。欧洲的希望在于法、德两国间的谅解。但我们坚决反对德意志帝国！三个帝国都是在法国人的血泊上建立起来的。”

2月28日

人们在谈论选举。将军仍然反对单名投票^①，他宁愿采用比例代表制。关于这一点，他对我说：“如果我重新掌权的话，请相信我，我不死是不会下台的。”

3月7日

将军回忆起四十年代的事：

“为什么没有向索姆河发起进攻的尝试呢？那是因为英国人不想干，因为运输跟不上，还因为士气不高。从一开始，指挥部的士气就低落。这是因为，指挥官们在战争理论上已经被战败了，这比什么都糟。大家原来都主张采用就地防守的理论，反对使用快速机械化部队。而他们正是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打败了。他们在理论的阵地上被打败了，再也振作不起来了。至于魏刚，自从他来到以后，就一心考虑牺牲无法挽救的部队，以保全主力，防止革命发生。这里的士气已经一蹶不振了。”

他告诉我，死在阿尔萨斯斯特鲁霍夫的弗雷尔^②手下有一个军士长。据说弗雷尔对这个军士长说过：“我从这里可能出不去了。不过，你是出得去的。你出去以后去找戴高乐

① 指选票上只填写一个候选人姓名的投票选举。——译者

② 弗雷尔将军于1942年11月被任命为军队抵抗组织的领导人。他于1943年6月12日被捕，他曾主持军事法庭。1940年，该庭曾对将军进行缺席判决。

将军，告诉他，在1940年的作战会议上，只有我和他两个人投票反对等死。”将军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何况，我也不在乎。”

3月17日

克洛德·居伊给我捎来了将军的一句话：“我不怕死亡。但我还有些事情要做。我希望在死以前，能使法国摆脱它的那些政客们。”

3月21日

区级选举的结果令人失望。马尔罗幸灾乐祸地说：“蓬佩完了。区级选举也完了，搞正经事还得靠我们。”

3月23日—4月12日

在这段时间的多次谈话中，我没有听到什么引人注目的内容。将军对第二轮区级选举的结果感到满意，他表示准备迎接1951年。他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此刻出现了一些秘密活动。克耶派出一些称职的使者去拉关系。警方在搞新阴谋的传闻在散播。

4月2日，我见到了莱昂·诺埃尔^①。他给我的印象是十分自负。他对我说：“我担任过那么多的重要职务，现在对什么都无所谓。我唯一感兴趣的事，就是把我成功的经验告诉给少数几个值得告诉的人，具体地说，就是告诉戴高乐将军（原文如此）。”

我收到了夏朗东的一封信。他在出席经济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后感到灰心丧气。那里尽说些堂而皇之的话，但是毫无结果！

① 莱昂·诺埃尔，外交家，行政法院法官，前部长，法兰西人民联盟领导委员会成员。

将军收到了庇隆的一封信并给他写了回信^①。

我从一次谈话中得出这样的印象：对将军来说，他的合作者都被视为工具。然而，他又是个易动感情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显得冷酷无情：他不会说令人不愉快的话，而且他若想和谁分手的话，就干脆不再见这个人，也不愿看到他的名字。

将军在科隆贝逗留期间，我和马尔罗于4月29日共进午餐。我们海阔天空地闲谈，特别谈到了他的工作。他非常想了解将军对他的看法。当我们谈到克洛德·居伊可能会重新出头露面时，马尔罗对我说：“伊丽莎白（德米里贝尔）确实是进修道院了。”他还补上一句：“将军是当恺撒^②还是当弗洛比明^③呢？”

5月1日

法兰西人民联盟组织的盛大的主保瞻礼节活动是成功的。

“该去的人都去了。我没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但我不能把五一节让给共产党人。在巴黎，有戴派，有共产党，还有在城里请客吃饭的人。所以，才有了戴派的示威游行。当然，我不会让他们去修筑街垒反对克耶。而且，他们也是不会去的。如果他们能象狮子那样骁勇，事情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衰败没落成了普遍现象。看看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吧。美国指望的不是国民党分子的突然进攻。他们指望毛泽东被腐蚀掉。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9。

② 恺撒（公元前101—44年），罗马帝国皇帝，曾征服高卢，即现在的法国。对罗马帝制进行改革，后被暗杀。——译者

③ 弗洛比明（公元前253—184年），希腊政治家，曾英勇组织希腊人抵抗罗马人的进攻，后失败。——译者

毛泽东在前进中会遇到种种腐败现象。他可能会被战胜。”

他对阿隆也很恼火。他说：“早在伦敦时，他就不是自由法国的战士，他怕我征他入伍。当时他在《自由法国》杂志社工作。”

谈到已被议会拉过去的米歇尔·德勃雷时，他很失望，口气沮丧。本书附有德勃雷给我的一封信^①。

就在这个时期，将军又继续撰写他的《回忆录》。

5月13日

吉罗将军的《回忆录》出版了。谈到他时，将军说：“这是个随波逐流的家伙。在他的讲话中，仿佛自由法兰西战士是我的人，非洲部队是他的。当时，自由法国部队是我领导的，但非洲部队也不是他的。这支军队是达尔朗、主要是朱安重新组建起来的。因此，吉罗在《回忆录》中，只字不提朱安，朱安也很憎恶他。”

本书附有吉罗谈皮什及其被处决经过的一封信^②。

5月31日

自封“北大西洋公约之父”的比约特十分激动地说：“美国人已经对克耶感到厌烦了。他们不会给他武器了，他们现在把希望寄托在戴高乐身上。”

“这种看法太幼稚了。美国人没有办法使国会投票通过贷款方案，于是他们就想使人相信是他们不愿意帮助克耶，并希望我为他们打掩护。比约特把我看作吉罗了吗？我是不让美国人介入法国的事情的。我并不阻挠人们向克耶提供武器。相反，我要求这样做。”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10。

②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11。

6月7日

人们又在议论一起阴谋事件，富歇为一个叫于贝尔的人辩护。将军说：“要是他们真搞阴谋活动，那倒好了。可是，他们又没有这样的本事。他们不敢放一枪，除非是朝天放空枪”。

樊尚·奥里奥尔的阿尔及尔之行，引起将军如下的评论：“1947年我在阿尔及尔时，就已经感觉到阿尔及利亚人有保留。这不是对我个人，而是对法国的。”

6月11日

6月18日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引起了某种程度的不安，为此进行了许多非正式的交涉。因为，这一次除了举行传统的仪式外，还要在奥尔良门发表演说悼念勒克莱尔（竖立纪念碑和命名街道）。然而，将军与政府的关系非常紧张。政府对将军将在巴黎公开发表讲话感到不安。幸好，我们收到了勒克莱尔元帅夫人的一封信，说第二装甲师的老战士认为，应由戴高乐^①发表悼念勒克莱尔的演说。政府对柯尼格将军也搞了点小动作（本书附有此信^②）。

大家，首先是我，都劝将军站得“高”一些，不要进行论战。可是，我们的建议无济于事。将军还是发表了众所周知的精彩演讲，说实话，听讲话的人不多，而且基本上是由法兰西人民联盟所属组织动员去的。在对待戴高乐将军这一问题上，周期性的危机开始在巴黎出现了，更何况，有人竭尽全力地散布将会发生事端的风声。

与此同时，法兰西人民联盟也每况愈下。首先是对马尔罗和苏斯戴尔之间无休止的争吵（附上有关信件^③）；财政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12。

②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13。

③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14、15。

上也有困难，这使大家都很难，特别是路易·瓦隆，他不愿受到限制，为要求辞职不知闹过多少次了^①。总之，情况不妙。

6月18日的纪念活动举行过后，将军和我进行了一次长谈。我记得他对勒克莱尔的评价如下：“他努力工作，有主见，不会由于别人的建议和想法而改变主张。如博絮埃所说，他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出色，干工作的劲头谁也比不上。他战斗意识强，善于占据有利地形，这是不可多得的。”

6月21日

将军同我谈起扩大执行委员会的问题，说委员会中要“有些头面人物（如帕斯特·瓦莱里—拉多），要有些积极分子（苏斯戴尔，马尔罗，帕莱夫斯基），还要有些可以任人摆布的‘小人物’（蓬佩，博泽尔，富歇）”。将军对我从来没有这样信任，这样友好过。

我向他讲了我对事和人的看法。这将得到事实的验证。关于帕莱夫斯基，他对我说：“在我看来，对他危害最大的莫过于他那种由于虚荣心作祟而想到处插手和表现自己的怪癖。”

6月23日

将军说：“我决心已定。我要继续干下去。”

7月7日

将军说：“基层是巩固的。有毛病的是首脑部。我可以等待，但我不愿意让‘污泥浊水’来玷污我。从法国、欧洲和全世界的状况看来，‘污泥浊水’将滚滚而来。必须离得远一点。我跟‘他们’不一样。”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16。

贾科比^①辞职了。将军认为：“他又重新陷入了激进主义。人们内心深处对他是惋惜的。”

他在谈到教会时说：“目前，出现了一场深刻的悲剧，这就是教会的悲剧。教会从内部遭到了破坏。如果它不坚决顶住，即使不说它完蛋，至少会大大削弱。”

将军在谈到安法会议^②时说：“与会的有吉罗那个废物，还有美国和英国，形势是严重的。罗斯福不能来看我，我也不去看他。不过，为了将来，不能把关系搞绝了。他看上去很象个贵族，态度和蔼可亲，我当然也是一样，因为我们都清楚，逢场作戏是必要的。此外，还有易怒、傲慢的丘吉尔，他对自己受美国人摆布十分恼火。罗斯福把丘吉尔当作一头公羊，用他来对付我。他们真有高招，导演了一幕幕的喜剧，连烟灰缸都擦在地上了。而我呢，却怡然自得，镇定沉着，寸步不让。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本来可以在六个月以前就去阿尔及尔，接受帝国枢密院，让布瓦松去法属西非，诺盖斯去摩洛哥，佩鲁东去某国等等。在六个月的时间内，我就会一败涂地，而且声名狼籍。”

7月7日

将军谈到贾科比的辞职时说：“你想象不出，这件事在多大程度上使我回想起自由法国的时期，回想起我和卡森、普利文和卡特鲁之间发生的麻烦事。他们都曾经想辞职。最后，最有本事的人留下来了。”

① 保罗·贾科比是激进党的领袖之一。1945年在戴高乐政府中任部长，1947年同社会激进党和戴派的几个议员在议会内建立了“争取真正民主跨党派行动小组”。

② 指1943年1月14—26日在卡萨布兰卡附近的安法召开的会议。会上丘吉尔和罗斯福曾向戴高乐和吉罗发出邀请，试图使两人和解。

7月19日—7月20日

他似乎认输了，但却坚信自己能战胜危机。他对有些人态度很严厉。他说：“苏斯戴尔和马尔罗还活着。别的人中间，只有帕莱夫斯基还活着。”

“实际上，我和那些人的全部区别，就在于他们同意说法国不再是一个伟大民族，而我却不同意。‘她已垂危，别再打搅她了。’他们将把法国送进坟墓，但我不去送终。他们会去，我不会去！”

后来，暑假到了。假期过后，财政上的困难使得相互间的关系更为紧张。马尔罗认为，博梅尔应对失败负责。瓦隆消瘦了，身体也不大好。富歇仍然感到满足。居伊始终病魔缠身。马尔罗完全失望了，他说：“谁也不能离开这只正在沉没的船。”他说他讨厌这一政策，但我觉得对他还是有吸引力的，而且可以肯定，如果让他负责执行这项政策，他是会很卖力的。这是一个自寻烦恼的人，但为了成为将军身边的头号亲信，必要时也会耍耍阴谋。

综观上述及其它情况，我的印象是：在象将军这样的人周围，肯定会有人搞阴谋诡计，拉帮结伙，阿谀奉承。而且将军还推波助澜，纵容人们相互攻讦。

9月7日

“应该被推翻的是这个政权。我攻击的不是人，而是政权。霞飞^①不顾当时政府的反对，却拯救了法国。克列孟梭同样是在政府反对的情况下拯救了法国。我也是把政府撤在

① 霞飞(1852—1931)，法国将军，曾多次参加法国在非洲和亚洲进行的殖民战争；1885年中法战争时，在进犯中国领土台湾的法军中任职；1911年任法军总参谋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法军总司令，在马恩河会战中制止了德军的进攻，但以后迭次失利。——译者

一边去重建法国的。”

将军对罗贝尔·舒曼的批评十分严厉。他说：“我们的事务是由一个人（克耶）领导的。这是一个在停战问题上投弃权票、曾参加停战政府的人。说到他穿过军装，而他只穿过德国的。什么样的政府嘛！看看德国的问题吧。有一个自称是内政部长的犹太人（莫克），他采取了一种立场。在同一个问题上，一个自称是外交部长的教士，又采取了另一种立场。另外一个自称是总统府国务秘书的共济会员（德维纳），采取了第三种立场。至于总理呢，他干脆不表态！”

紧缩财政开支给各方面都带来了影响。富歇抱怨自己的处境，他对离开外交部也很后悔。这个人的特点是：当他有求于你的时候，他就会对你殷勤备至。

内阁危机之后，奥里奥尔提出要见迪特尔姆和加比唐。将军拒绝接见他们。他说：“如果我要给他们出点主意的话，那就是劝他们对奥里奥尔说：‘我可怜的奥里奥尔，走开吧。你是共产党人的意中人，你推崇的是一部把国家引上绝路的宪法！’不过，他们是不会这样说的。”

我好不容易才说服大家继续支持“思想自由”。克洛德·莫里亚克将为此会感激我。①

9月19日

我设法使将军同意接见德勃雷了。德勃雷很高兴。我使他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他会理解吗？

将军回忆了拿破仑·波拿巴在1848—1849年时的情况，他说：“当然，我不会搞帝国，因为我不是拿破仑的侄子，在我这把年纪是不会搞帝国的。唯一的可能就是建立共和国。但是，必须结束多党制。”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17。

有关文件汇编

1. 决定

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
根据1943年6月3日有关建立法国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法令，并根据1943年6月3日和1944年9月3日的法令，
决定：

任命拥有文学教师衔的乔治·蓬皮杜先生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总理府特派员（唯一的条文）。

夏尔·戴高乐

1944年10月1日于巴黎

2. 法国政局日志^①

1944年10月23日，巴黎

① 戴高乐将军的批语是：

“我将结束语修改如下：

“善良的法国人所期待的，概括地说，就是法国不要象目前这样长期面临严重困难，没有制度、没有有效的管理、没有外交政策、没有等级制度……而且完全没有行政管理人员。我不可能、任何人也都不能在两个月的时间里纠正这种状况。这件事需要付出长期艰苦的努力，至少需要用一代人的时间。

“这种努力已经开始。我们等着瞧吧！”

夏尔·戴高乐”

这篇日志是要阐明政府和国家目前的关系。它不仅吸收了收到的各项报告，而且也吸收了同巴黎、特别是同外省可靠人士的多次谈话。

一、有关问题的情况

整个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大小不等的集团。

1. 有组织的抵抗运动

这个运动是少数派，但很重要。首先，它包括了一些党派。基督教民主党和共产党这两个党已全部参加了这一运动。此外，社会党已通过该党几位领导人和某些党员的行动，成功地扭转了由于该党大多数议员叛国所造成的局面，并向公众舆论表明自己是一个抗德的政党。因此，在公众的眼里，抵抗运动的某种形式的人民阵线已经形成。

但是，在抵抗运动中，还有一部分人是个别加入或以小组形式加入的，其中有的人是因受维希政府迫害而被迫参加的，大多数人则完全是出于爱国主义的热忱。有些人功劳更大，因为从他们党派的意识形态来看，他们本来是会向维希政府靠拢的。所有这些人虽然都已组成政党，但远不如原来的政党，特别是共产党那样的团结，也远不如它们那样有组织性。因此，在抵抗运动中最活跃的，特别是最引人注目的乃是极端分子。

2. 第二个集团代表全国的多数派。它包括大多数小资产阶级分子、官员、职员、手工业者和农民。这些人没有投降附敌，但他们对维希政府的态度各不相同。很多人从一开始就是衷心拥护戴高乐的，四年来一直支持并收听伦敦电台，但从未积极参加抵抗运动，至少是从未加入任何一个组织。

另一些人，特别是在自由区的人，则追随贝当元帅直

至1942年11月，因为他们认为，贝当就是抵抗运动的化身，甚至往往认为贝当同戴高乐将军暗地里是一致的。

还有一些人在北方，特别是西部的保守阶层，他们始终对贝当元帅保持着某种敬意，因为巧妙的宣传使他们接受了“两面”政策的说法。

最后，还有相当多的人，他们憎恨德国人，但主要是关心自己的生活，关心如何保住自己的财产，保护自己的家庭。

这批人全都热情欢迎解放，全都把戴高乐将军看作是救星。

3. 法奸

第三类人为数最少。在这类人中，有的是出于信仰、有的则是出于私利当了法奸。前者人数很少，目前群龙无首，暂时处于隐蔽状态。后者分布较广，主要集中在实业界。

最近几个月以来，在最妥协的分子中间，有些人为了洗刷自己而经常同抵抗运动联系。解放以后，有些人至少表面上已经改变了态度，准备在戴高乐将军政府的领导下和美国人一起继续执行他们在维希政府领导下和德国人一起执行过的政策。

二、政府在国内的处境

上面就是这个国家的尽可能真实的写照。然而，在绝大部分领土获得解放一两个月之后的今天，应当承认还存在着这样的怪现象：虽然几乎所有的人都声称要跟戴高乐将军走，但谁也没有表示赞同政府的政策。

原来的法奸认为政府是共产党手中的工具。他们只想着美国人，天天念叨着艾森豪威尔将军，恳请他来恢复秩序。

尤其是那些实业家，他们有意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戴高乐将军搞不了三个月，美国就会下决心对法国政策进行“必要的清理”。

尽管这部分舆论每天向盟国军官们的耳朵里灌输种种怨言，从而在国外给我们的国家抹了黑，我们仍可认为无关紧要。不过，必须清楚地看到，其他的舆论显然也并不更为乐观。

抵抗运动是分裂的。共产党人几乎毫不掩饰地持对立的态度，他们的外围组织则更公开对立。社会党人一方面指责政府没有反击共产党的宣传，另一方面，为了保存自己的势力，在宣传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他各党各派都不知所措，它们惧怕共产主义，但都认为政府已经“抛弃”抵抗运动，目前正在依靠或者至少是包庇昔日支持维希政府的人。因此，抵抗运动实现的联合不过是为了攻击政府的所作所为而已。

可是，又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抵抗运动怀疑这个政府，而大多数舆论却认为它是受抵抗运动，特别是受极端分子集团控制的。有人反复散布义勇军游击队^①或爱国民兵的过火行为，而且越传越厉害，人人都以为邻近的地区一片恐怖，而且即将漫延到自己所在的地区。最平静的地区，即西部地区，至少也认为毫无变化，毫无改善，黑市象维希时期那样仍然存在，仍然实行配给制度，党派之间又象1939年那样争吵不休。总之，人们差不多完全把两个政权的弊端搅在一起了。

政府的这种处境确实奇怪，似乎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

^① 1940—1944年间法国的抗敌武装。——译者

这个政府的首脑是大家一致欢呼推选出来的，尽管它是全国一致的政府，而且只此一家。甚至连国家的代表也都感到惶恐不安的情绪正向他们袭来。

三、造成上述形势的原因

这篇日志不打算探讨摆脱这种形势的办法，因为这超出了日志的范围和可能，但仍然可以指出造成上述形势的基本原因。

1.首先必须注意到：在各种各样的批评中，有一点是共同的。有些人认为，政府对共产党人放任自流。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政府对第五纵队或维希政府的支持者放任自流。但是，大家都认为，政府是“放任自流”的。每个人都指责政府不负责任。政府的代表说：“我们没有得到指示。”乐观主义者说：“省长没有权威。”悲观主义者哀叹：“这是无政府状态。”温和派抱怨：“这是共产主义恐怖。”抵抗运动的成员则大声叫喊：“这是对法奸的潜在专政。”不论什么时候，谁也不认为政府在实行管理。

2.为什么出现这些责备呢？首先是因为没有进行宣传。由于破坏和劫掠，由于战争的需要，由于缺乏交通运输，由于四年的奴役，政府在技术和政治上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是，任何一份报纸，任何一张告示，任何一本小册子都没有谈到这些困难，也没有指出已经取得的成就。

以下仅举数例说明：巴黎地区已恢复供电。有几家报纸只是发了个通知。另外几家报纸则把恢复供电归功于工人阶级的努力。谁也没有为此感激政府。面包的定量有了增加，有人认为这是靠美国的支持。大多数人则认为这是因为那些德国佬不在了。但是，谁也不认为政府的行动在这方面多少也

起了一点作用。另一方面，人人都说，如果政府愿意或者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目前的定量还可以明显增加。

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新闻界不但不为政府服务，而且经常说政府的坏话。广播电台开始建立，很多地区还收听不到。根本没有宣传工作。

3.或许还有更多的原因。政府有什么纲领？政府打算依靠谁？谁也不知道。

人们在谈论经济复苏。老板说：“经济没有复苏，要怪工人。”工人说：“这是托拉斯的过错。”政府打算怎么办？政府有什么样的经济计划？政府对社会问题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已经采取的措施看来是零敲碎打的，还没有拿出一项能够把善良的人们团结起来的计划。从司法和肃清法奸的工作来看，显然也是杂乱无章的。在南方，实行处决，在别的地方，好象是乱抓乱放。哪一种罪犯是戴高乐将军最近一次演说中提到的一小撮叛徒呢？罪行分几等呢？准备宽恕什么样的人？对此，人人都可以自由解释，而且往往趋向于认为，事事都不必通过政府。

因此，政府可以依靠谁呢？民主政府应当拥有多数。它必须依靠一个尽可能广泛的、有外围组织的、支持政府的党。哪里有这样的党呢？重新组建的党都在制订自己的政策，进行自己的宣传，而且，这些党不是攻击政府，似乎就是不理睬政府。

至于其余的舆论，至于那些正在探索的群众，无数的党派正在争夺，但在如何对待政府的问题上却没有表示态度。任何一个法国人，在加入其中的一个党派之前，都确实象购买一份报纸那样，抽出哪份就算哪份。

选举已经临近，可是那些非共产党的选民去投票时还不知道是投票支持政府，还是反对政府？

战前，他们习惯于追随某些人，但现在已宣布这些人没有被选举的资格。他们不得不同这些人断绝往来。但是，谁也没有代表政府来和他们谈话，也没有向他们作出他们等待和需要的指示。

或许，万事如意是不可能的。不过，要是为他们制定明确的目标，要是有人代表戴高乐将军通过地方报刊或公共集会吸收他们参加共同的事业，那么他们是完全愿意听从的。目前，他们感到自己被人抛弃了，因为在他们和将军之间没有人搭桥。将军的演说激发了他们的热情，感动了他们，但有些演说调子很高，因而显得太遥远、太笼统，也无法使他们得到满足。

因此，一切善良的法国人所期望的是，政府实行管理，政府要有经济社会纲领，让大家知道这项纲领，并动员全国来实现这项纲领，最后还要有政策和捍卫政策的，在各个地区、各省和各地成为将军和每个法国人之间桥梁的人。

乔治·蓬皮杜

1944年10月23日于巴黎

3. 戴高乐将军在1946年元旦招待会上对外交使团团长、教廷大使讲话的答词

教廷大使先生：

感谢您刚才代表派驻共和国临时政府的各国代表向我表示的祝愿。

您对法国人民目前为国家复兴所作出的巨大努力表示钦佩，这使我格外感动。

您所具有的洞察力一定会使您注意到，这种努力完全是为了法国的复兴，但又毫不放弃法国的传统。今天的世界正在谋求以富有成果的改革，来医治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所带来的惨痛创伤。在这个世界上，又一次受到极大考验的法国，准备使自己的复兴事业具有进步的特征。

这种努力是不会不遇到困难，而且在新的一年里，还会有很多考验。但是，法国将继续走自己的道路，因为它知道自己的强盛对世界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而各国人民对那些象以前的强有力的手段一样，既能造福于人，又能造祸于人的新的强有力的手段不禁产生了怀疑。

这就是法国不断以恢复了的坚定语气发出的充满理智和人道主义的呼声。

请阁下和陪同前来的诸位使节也接受我的十分诚挚的祝愿，祝你们各国的君主和国家元首个人幸福，祝你们的国家繁荣昌盛。今后，维持和平要靠你们各国的共同努力。

4. 戴高乐将军致蓬皮杜函

我亲爱的朋友：

您在我离职时的来信，使我非常感动。这一点，我迟迟没有告诉您，请见谅。

请相信，我对您保留着最良好的回忆，并请接受我亲切的、忠诚的情谊。

夏尔·戴高乐

1946年3月5日于马利

5. 戴高乐将军致蓬皮杜函

我亲爱的朋友：

您的祝愿使我非常感动。谨向您表示谢意。但是，我要借此机会告诉您，我对您是十分尊敬的。

未来并不属于我们。不过，要是属于我们的话，请您记住，我指望着您、而且完全信任您。

我亲爱的朋友，请接受我的诚挚的、忠诚的情谊。

夏尔·戴高乐

1947年11月22日

6. 路易·瓦隆致戴高乐将军函

将军：

我认为，克里斯蒂昂·富歇特别适合于领导巴黎地区。顺致崇高的敬意。

货币管理局局长 路易·瓦隆

1948年11月10日

7. 米歇尔·德勃雷致戴高乐将军函

我的将军：

获悉您对我在内阁会议上采取的立场不满意。我写此信并不是为了自我辩解。佩居伊说过，辩解是怯弱的表现。我仅想说明一下……

1946年，由于优柔寡断，并且自以为具备了政治素质（现在我才知道自己并不具备），我便到科隆贝去了。您的意见是明确的。因此，我离开您之后，就去图尔参加了左翼联盟。那一次，我的心情并不舒畅。然而，我的竞选既有激进派的色彩，又有戴派的色彩。此后，不管担任什么职务，我一直在工作。我成了该联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因为别人也都支持我。联盟推翻了自己虚伪的偶像。为了参加市政选

举，它和刚成立的法兰西人民联盟提出了共同的候选人名单。它听从我的指挥，并于今年9月份以绝对多数的选票淘汰了非戴派的候选人。激进派的市长们信任我。我对他们也从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我的写作中，在我的演说中，每次都提到您的名字。我对他们所有的人说，自我当选的第一天起，我就要参加议会中的跨党派集团。除非出现新的情况（也许很快就会出现），我仍然履行自己的诺言；当初我作出诺言时，是得到您同意的。

将军，请您相信，自戴高乐存在以来，我就是戴派。我并没有用显赫的行动来表明我的信心。但是，我也从未借此追求过勋章、晋升或实惠，我在这一点上一向坚持己见。如果因为自己没有得到或者主动拒绝那些令人羡慕的、能满足内心私欲的高级职位而感到痛苦的话，那么我宁愿为此吃苦。我经常去国会，但并非为了在克耶政府里当个副国务秘书；如果留在行政机关里，我会把工作搞得更好！我是忠于您个人的：这是我的私事。我忠实于您所代表的理想；在我们生活的时代里，面对国家的衰败、法兰西的没落和自由将被窒息的危险，我没有犹豫。若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也许是费里分子^①；如果是在1916年前后，我大概是克列孟梭分子。如果说我第二次获得委任（这一次，我知道自己不具备政治素质），那么目的就在于尽力为国家和共和国的复兴作出贡献……

的确，我具有一些“共和派”思想。这是我的第二天

^① 朱尔·费里（1832—1893），法国政治家，曾任公共教育部长、外长，由他宣布法国实行小学免费义务教育。——译者

性。当我看到，身着羊皮里子上衣，头戴巴斯克无沿软帽，脚踏绉胶底鞋的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宣传员混杂在图尔的农民中时，我感到吃惊。我在索尔费里诺街感到拘束，因为在那里似乎不可能随便讲话。我不喜欢那些过于严格的集团的纪律，它仿佛取代了人们不大了解的指导思想。我不畏惧强大和明智的政权，但却害怕赤裸裸的专制。您的政权是强大而又明智的，可是在您的背后，有多少人主张毫不掩饰的专制啊！我并不害怕由杰出的人物担任领导，恰恰相反！我害怕的是鄙视工人，更确切地说是害怕对工人毫不了解和对真正的社会问题一无所知。在您的背后，恰恰有许多人就是以对工人毫不了解和对真正的社会问题一无所知而著称……

请原谅我这样讲话。我是怎么想就怎么写的。我既然提起了笔，就要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在过去的年代里，我有时也比较随便地给您写过信。今晚，我写信时还要更随便些。也许我会使您感到讨厌，但请您相信，（除了我个人对您怀有的全部感情以外）我是怀着对一个在法国历史上最美好的时期占有其地位的人的敬意来写此信的。今天，那么多的法国人又一次把您看成是国家与共和国的复兴者。我之所以没有早给您写信，那是因为自从您重返政坛以来，我几乎还未对您的事业作出真正有价值的牺牲。现在，我已作出了一定的牺牲。我离开了行政机关。我舍弃了某些职务；放弃了向往已久的海外省权力机构的领导工作。现在，我完全从事于政治活动了。法国的衰退，这是令人悲伤的，但却迫使我全力以赴地从事政治活动。

第一点：我认为您最近取得的胜利，给您带来了两项义务。第一项义务是确定您的纲领；第二项义务是表现出宽宏大量。理由如下：

法兰西人民联盟关于宪法的纲领是相当明确的。您已确定了这一纲领社会理论的相当重要的一点，即联合的思想。不过，这一点还很笼统。在我看来，遗憾的是，最近的竞选宣言使之更为突出。然而，在我们上次的谈话中，我仿佛觉得您比过去更愿意表明您的想法。我认为，现在是时候了。我感到，许多知识分子、大学教师和政府官员，在这个组织面前犹豫不决。这个组织整个地围着一个人转，普遍存在着严重失望的情绪。必须克服这些阻力，同时还要争取人心。为什么不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发展生产、工农业设备与社会设施、工人培训、住房政策和必要的紧缩开支——首先是军费开支——等问题呢？为什么不谈一谈市政改革、行政机构改组呢？有修养的法国人（这里指的也是参加竞选的市长们）所期待的，如果不是许诺的话，起码是许多说明……

现在谈谈宽宏大量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必要的。法兰西人民联盟不仅饱尝理论上某种程度不明确之苦，而且还受到基层组织可怕的宗派主义之害（在这次竞选运动中，我有一天晚上几乎要舍弃一切！）。党员和宣传员们得罪了很多人。他们的对手对他们也不手软，他们今天的日子也不好过。不过，既然是法兰西人民联盟胜利了，那么联盟的领袖就得摆出胜利者的姿态。过份严厉，到头来只会挫伤最优秀的分子的积极性，最优秀的分子失败后，而前来投奔您的人只会是您的对手中最次的人（这一点至少是令人担心的）。您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开始就要宣布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联合进程并没有终止，宣布您并不要求作出效忠的保证，就可以接纳目前的反对派，以便根据选民事先同意的纲领来建设未来的法国。我觉得，提出明确的建议并不过分。在我看来，对选举法和解散议会来说，这些建议甚至是必要的。既要搞

垮我们的对手，又要软化他们。他们已经垮了一半（仅仅是一半）。现在，我们可以软化他们了。您将会看到一些优秀的新成员前来参加您的队伍，而且我还觉得，正因为您的一些对手们气量狭小，您的宽宏大量就会收到更佳的效果。不必担心人们所说的向“左”转。可以从共和派和非宗教分子那里得到好处。这是您的利益所在，您也一定能挫败对手。因为，乡绅是拥护您的，否则他们就不存在了。

现在，我来谈一谈几个更微妙的问题。我想明确地表达我的想法，不知您是否会责怪我。

首先，我认为，在许多省内，对省委员会的组成和方针，有必要重新加以考虑。对此，各方面都有反映。这不是新问题，也不是简单的问题。不过，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有必要扩大组织（例如邀请各党各派有能力的领导人）。其他的细节问题或许也需要重新加以考虑，因为对一个已经达到顶峰的组织要比对一个开始建立的组织要求更高。诺歇的文章是否总是格调最高呢？报纸上的反响是否过多了呢？应该发表“根据戴高乐将军的决定，成立了某委员会……”、“采取某一措施”等措辞的新闻报导吗？应该大肆抨击他人吗？更多地谈谈人们所需要的东西就够了。

最后，我要将我的思想全部亮出来。是否有人对您说过，您某些讲话的方式遭到了非议呢？我并不相信戴高乐将军会过分地经常地挖苦别人。将军完美的理论和与人为善的品质，应当使他能够避免（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采取过于粗暴的态度。您的力量不在于此。

在上述的言辞中，您可以看到我对您的胜利是关心的。胜利的时候快来到了。然而，我还觉得没有十分把握。法国并没有第二次成为戴高乐主义的国家。当然，这不是同一含

义上的戴高乐主义。由于人们对目前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深恶痛绝，因此人们的眼睛都盯着您了。有一天，我对您说过，1948年的戴高乐主义是对某种社会现状的一种健康的反应。它比昔日的戴高乐主义更加深思熟虑，但要求更高，更加脆弱。我认为应该永远不忘记这一点。

将军，请您原谅，这封信写得太长了。

顺致诚挚的敬意。

米歇尔·德勃雷

1948年12月5日（星期日）

8. 戴高乐将军给欧洲议会联盟里夏尔·库德诺夫—卡莱吉先生的信

瑞士

欧洲议会联盟

里夏尔·库德诺夫—卡莱吉先生

议长先生：

12月17日的来信收悉，感谢您对我的盛情好意。

没有人比我更加相信建设欧洲的必要性。这是导致解决德国问题的唯一方法。这种方法将有助于实现均衡，即它能给德国人民充分发挥才智的余地，而不致危及其邻国。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尤其是因为今天野心勃勃的苏俄会推动和支持冒险的行为。

我一直认为，法国的一边是英联邦所煽动的英国，另一边是为自己进行探索的德国，从地理位置本身来讲，法国也是注定要促进欧洲联盟的。因此，对您为促进这个联盟的实现所付出的努力，我当然是感到高兴的。

顺致最崇高的诚挚的敬意。

戴高乐将军

1948年12月29日于巴黎

9. 戴高乐将军致阿根廷共和国总统庇隆上校函

总统先生：

阁下向我和法国表示了友好的情谊并送来阿根廷国家宪法的文本，这使我深为感动。

在您的推动下，这部宪法的制订者规定建立一个公正的、完全能够保障公民自由以及民族团结和独立的国家。这也表明阿根廷人民赞同法国人恪守的一些原则。法国人经受了很多人很多考验，也见过少数暂时存在的假象，但仍恪守这些原则。

因此，对阁下的盛情关怀，我谨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请阁下相信我十分尊敬和热烈支持您本人和您采取的行动。我向阁下致以最诚挚的祝愿，并祝阿根廷人民幸福、昌盛。

1949年4月12日于巴黎

10. 德勃雷致蓬皮杜函

共和国参议院

亲爱的乔治：

1. 星期一的会能否推迟？现在向您提出这样的建议，恐怕为时已晚了。可我又不能出席这次会议，对此我感到遗憾。我不得不要求改变会期，因为星期一已成了一个令人不快的日子。

2. 将军收到一个名叫布洛努瓦先生的来信。我看他是一个有点歪才的疯子。他的才华表现在对城市规划、特别是对

巴黎地区的城市规划上。他曾请求我把他引见给将军，我迟迟未予答复，所以将军收到了他的一封信。现在需要做的事是：

(1) 到巴黎地区了解这位布洛努瓦先生的情况。他是个忠诚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分子，我看他尽管有点傻乎乎的，倒还是个热心肠的人。

(2) 可以派布洛努瓦到法兰西人民联盟主管这类问题的一个委员会或理事会去。

对这件事不要完全撒手不管。我再说一遍，他虽然有点疯疯癫癫，但是有创见，这样的人并不多见。

3. 至于我本人，对事和人都感到相当失望。我们的出路在哪儿呢？我不相信再等两年会有什么丰硕的成果。将军是想用现实的国家反抗法制的国家。可是后者防卫能力很强。它在自卫，以致使人们不得不进行曲线反抗。反对一个政权是可以不择手段的。而将军却恰恰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就只好在政权之外进行活动了。将军连这一点也都不愿意，也可能是不感兴趣。我们能跳出这个圈子吗？能，除非大难临头，否则，就别想跳出去。希望最好今后不会发生灾难。所以，我看不到前途。更确切地说，我看到的是缓慢的没落。

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令人鼓舞的。
生活就这样令人悲伤地流逝着。
致以友好的问候。

米歇尔·德勃雷

1949年4月21日于巴黎

11. 维尼奥致戴高乐将军函

我的将军：

我不是您的战友，我也不是凡尔登战役胜利者们的同路人，至少不完全是。我是法国公民中的一员，我正在努力寻找一条应该走的路，但一直没有真正找到。

再说，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与您无法相比，恐怕只有过了很久以后才能评述你们各自的功过。

在您的一生中，正如您有过不清楚的时候，有过血的教训一样，也可能您有时是明智的，有时作出过天才的预见。

看到昨天《费加罗报》关于宣判和处决皮什的报道，就不得不想到这些情况。遗憾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就象在其他问题上一样，吉罗将军的回忆录提出了一连串使人不安和令人畏惧的问题。

为了避免对我的感情产生误解，我要明确指出，原则上我丝毫也不反对共产主义，我之所以脱离共产主义，是因为它开始背叛和损害那些它应为之服务和加以拯救的人们。

诚然，在这部回忆录中，有一些幼稚可笑的东西，而且，至少从政治角度来看，吉罗将军显然缺乏领导人必备的坚毅性格。但是，同样明显的是，他出身名门望族，不失为一个十分正直的法国人。他是言而有信的。有幸当过法国的领袖并自称将要重新掌权的人，是不能甘心忍受这些指责而不作出回答的^①。文字的东西往往只是文字，而具体的背景则可使文字更加明确；因此，必须加以澄清，这一点对于法国可能比他本人更为必要。

顺致崇高的敬意。

^① 将军在这句话下面划了着重线并批注：“什么指责？皮什是法奸。他被判处了死刑，被枪毙了，就是这样！C·G·”。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总工程师L·维尼奥

1949年5月20日于巴黎热尔维克斯街2号

12. 勒克莱尔致戴高乐将军函

将军：

我想，对6月18日仪式引起的论战，您会和我一样感到十分难过的。

法国所有的市镇在以“勒克莱尔将军”命名街道或广场之前都举行了宗教仪式，所以我们认为应该由第二装甲师出面在巴黎荣军院做一次弥撒。

为了使6月18日仪式的预定程序不受任何影响，我于5月23日（星期一）亲自打电话给德拉米纳将军。他答复我说，6月18日九时，他没有安排任何活动。

因此，我们在5月23日晚把印制请柬的定单送到了印刷厂。

报界把这些情况都搞到手，我为此大伤脑筋。报界歪曲了我们举行这次弥撒的意义。

我们向所有的机关都发出了邀请，万万没有想到它们接受邀请这件事竟会象过去一样被人误解。

如果报界由于消息不够灵通，或居心叵测而进行歪曲报道，从而使您怀疑第二装甲师或我本人对您怀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想法，我是会十分难过的。

最近几天，我曾有机会和您的联盟的老盟员们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接触。我可以向您肯定，如果说大家对6月18日仪式引起的论战一致表示遗憾的话，那么也会同样一致认为，您最有资格主持命名“勒克莱尔将军大街”的仪式。

在您的老盟员中，谁也没有对您的人格提出异议，谁也

不否认您有权主持纪念我丈夫的活动。

我想，他们踊跃参加明天的仪式的行动，将向您表明他们忠于他们的领袖的感情与他们敬爱您的感情是完全一致的。

至于我自己，我将忠于曾经是您的忠实战友的人。将军，我再次向您表达我的十分忠诚的、最良好的感情。

勒克莱尔·德奥特克洛克（签字）

1949年6月17日于巴黎（十六区）克莱贝尔街26号

13. 柯尼格致戴高乐将军函

我的将军：

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要求我穿便服出席明天下午的仪式。我是一个将级军官，1944年8月曾和勒克莱尔一起跟随您进入巴黎，而且我还当过巴黎军区司令。我不能同意明天身着便服站在您的身边，让人嘲笑。所以，我不去参加下午三时举行的仪式。对我来说，这是令人伤心的事，因为我本来可以非常自豪地去参加的。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勒克莱尔夫人邀请我参加九时的弥撒，我还是决定不去，也不派代表参加。

但是，至少我会有机会在帕西桥上大声告诉人们，您对我们的恩情深重，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是需要您的！

明天晚上，我要到凯旋门和瓦勒里昂山去，在那里会有机会向您当面表达我对您的忠诚和爱戴，并向您表示衷心的祝愿。

将军，请相信，我是永远忠于您的。

柯尼格将军（签字）

1949年6月17日于巴黎

关于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情况

14. 马尔罗致蓬皮杜函

蓬皮杜先生

我亲爱的朋友：

以下是我所知道的关于默伦布鲁斯先生来访的情况：

他要求我部派人去默伦发表演说。他没有资格提出这样的要求，所以给他的答复是：只有省级行政机关和德桑热同意以后，才能派人去演说。对此，他回答说，已经得到了德桑热的同意；这无论如何也太奇怪了，因为德桑热刚刚来过电话，没有提到这件事。这与他说的不符。对此，他说，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机关（请您注意，不仅是指宣传机构！）是个“大杂烩”。莫热夫人听他这么说，就把他赶出了门。这是公道的。

过后不久，德桑热就来了。他认为，他宁可把目前尚未安排的演说家派去参加已经开始的竞选运动，而不愿意让某个地方代表心满意足。

当然，如果所有拜访我们的客人都只和天使们打交道的話，那当然最好不过了；不过，（一般地说）天使们都是懒虫，而我们需要的是肯干的人。总之，我觉得，如果单由我们自己负责组织集会，那将会取得好结果，混乱现象可能会少一些……

谨致友好的问候。

安德烈·马尔罗

1949年6月9日于巴黎

15. 马尔罗致蓬皮杜函

蓬皮杜先生

我亲爱的朋友：

我谨向您具体说明，那些请求戴高乐将军出席联盟日活动的地方组织所得到的指示（我估计，居伊也得到了这些指示）。

1.地区组织向戴高乐将军办公室寄去了一封申请信。信中还附有地区组织对我和居伊共同拟订的一份调查表的答复。

2.您好意告诉我，不知戴高乐将军是拒绝这一请求，推迟答复，还是接受这一请求。

我想，这一切您都是知道的。我之所以说明一下，只是为了避免产生任何混乱，因为地方组织有一种讨人喜欢的、但又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它们认为既然将军没有向它们作出相反的答复，那就可以肯定他一定会出席。

致以亲切的问候。

安德烈·马尔罗

1949年6月14日于巴黎

16. 路易·瓦隆致戴高乐将军函

我的将军，

博泽尔先生已作出安排，今天不把他应该给我们的款项交给夏朗东先生和埃梅里先生。那笔款子是从12月份的经费中拨给我们的一部分。

此外，他还说得到了苏斯戴尔的指示，不要把这笔款付给我们，以便迫使我们把关于冬季赛车场的宣传材料的印数从三百万份减到一百五十万份。

还有就是关于我昨天晚上在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呈交给您的1月份预算草案，他拒绝进行任何讨论，说什么也不能向

我们雇来开展活动的那些人支付工资。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向您提出辞去“职业和社会活动”全国书记的职务。

请接受我热忱的敬意。

路易·瓦隆

1948年12月24日于巴黎

17. 莫里亚克致蓬皮杜函

亲爱的朋友，不要以为我是忘恩负义的人；我深知您也是《精神自由》的最忠实、最有能力的朋友。我经常为您对我们特别积极和友好的关心所感动。在此，我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而且这是我早就应该做的（请千万不要把我的腼腆和羞怯误认为是无动于衷）。所以，您今天上午使用的“开小差”一词，使我感到刺耳。因为，一个退役的士兵还谈得上开小差吗？对于我们的失败，我感到难过，但在事物的运动中，这也没有了什么了不起的：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信任戴高乐，这样坚信他的事业之伟大。我绝不会背离他。

顺致诚挚友好的问候。

随时准备为您服务。

克洛德·莫里亚克

1949年10月4日于巴黎

第二部分 1949—1955年

现在，我以笔记的形式来记叙这段历史。除非有特殊情况，我一般只限于转述戴高乐将军在同我进行的谈话时所表述的想法。因为，在这一时期，我正巧是经常同他谈话的人，而且我们无所不谈。虽然他也经常会见雅克·苏斯戴尔，但那主要是为了讨论法兰西人民联盟的问题，这些问题在过了二十年或二十五年以后已显得微不足道了。他同马尔罗进行过十分有趣的谈话，但次数很少，这可从他的记事本中得到证实。至于其他人，他是顺便，譬如在法兰西人民联盟领导成员会议开会的日子才见见他们，不过这都属于“接见”的性质。相反，当他在巴黎时，我每天都要见他几次，而且总有一两次是长时间的会面。

在这些谈话中，他无所不谈，内容极为广泛。对历史学家来说，了解他当时的处境和他离开政坛以后喜欢夸张的倾向，以及他对法国和世界前途的一贯而深刻的看法，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

1949年11月2日

将军十二点半到达时，我去见他。我没有什么要事，他也好象不大愿意讲话。不过，他还是把我一直留到十三点二十分。他这次谈话的语调是很悲观、很泄气的，谈话的主题是“无事可做”。一方面，他表示不愿降低身份与政客为伍。他说：“他们都是一路货色。法兰西人民联盟的人和别人一样，我在巴黎和外省都见过。但是，我和他们不一样。因

此，他们都恨我。这个国家里的重大丑行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

“另一方面，国家对这些丑行却心安理得。从1940年起，国家就不再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了。³⁸戴高乐是要作出努力的，但谁也不愿意作出一点努力。他们承认自己力不能及。他们激进党人在走下坡路，每经历一次危机，他们都朝下滑一点。勒内·梅耶^①对他们来说实在望尘莫及。

“人们只能指望世态变迁。如果发生大难，人们会受到一点震动，也许会做点事儿。但这也难说。

“谁都对自己的命运不满意。布萨克不高兴，工人也不高兴，两方面都不高兴。我到外省时，会碰到很多人。要是我走进人群，同他们谈话，他们就会抱怨：赋税太多啦，挣钱太少啦。他们想的就是这些事。比如在芒市，皮诺是靠卑鄙无耻的手段上的台。可是，新闻界却无人抗议。我注意到，没有任何人为他捧场。是的，但也没有任何人揭露他。人们甚至不再注意他的无耻行径。”

我指出，路易十四也受到野心家和渎职者之流的人物的包围。将军说：“是这样，但那时还有愿意献身的贵族，有强大、众多的百姓。有正直的标准。如果某人的无耻行为被揭露，他也就完蛋了。可是在今天，这种人会爬得更高。然而，现在却找不出一千个愿去边境为国捐躯的法国人。”

谈到国防时，他说：“人们将由于经费问题把国防毁掉。印度已经丢掉了，印度支那马上也要丢掉；还准备丢掉突尼斯。这些虽不会毁于一旦，但必将如此。”

① 勒内·梅耶（1895—1972年），曾任法国财政部长（1947年）、国防部长（1948年）、政府总理（1953年）。——译者

还有许多激动人心的话语，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只记住了这句话：“法兰西正在死亡，而且已经不可救药了。我说这话时心情沉痛，但这是事实。我就象弗莱尔和卡亚韦剧本中的教士一样：‘我虽尽力而为，但却无能为力’。”

这次谈话的重点是法国放弃了自己的前途。这是他思想深处的看法。但是，他以前很少如此清晰地表述过。

1949年12月22日

我从几次谈话中记住了下列内容：

有句话我大概忘记记下来了：关于达拉第、雷诺等人，将军对我说：“他们是来去匆匆的人物，他们不象我，他们的命运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我由此推断出，他不愿毁坏自己1940—1945年期间的历史形象，因而在行动中始终受到这一愿望的约束。）

谈到波兹^①争取雇主们的意图时，他认为会结成反对波兹的金融联盟。他不相信雇主们能理解这一点。他说：“某些雇主能理解，但不可能让所有的雇主都理解。你要牢牢记住这一点：个人可以理解，但从整体来说则决不可能。军队就从来没有明白过任何事，雇主协会、工人阶级、财政监督机关也都如此。（他没有提行政法院！）有些军人可能是聪明的，但军队、参谋部从来都不聪明。因此，领导国家乃是一门艺术，是让整个机构服从总体利益的艺术。为此，需要一些制度。可是，法国却不再有这类制度了。”

21日晚上，他花了很多时间向我介绍叙利亚问题。那里刚刚发生了一次新的政变。他严厉批评了美国人的愚蠢，对于只晓得用行动使别人困窘的英国人也很不客气。他肯定，在雅尔

^① 法国国家工商银行总经理阿尔弗雷德·波兹对经济改革计划作出了重要贡献。

塔时^①，丘吉尔要求罗斯福和斯大林同意在叙利亚的反法行动，这样他才接受参加他们关于欧洲的妥协方案。因此，在同德国人停战之后，英国人马上就向在叙利亚的法国人发起进攻，而罗斯福和斯大林对戴高乐将军发去的电报却保持沉默。

他责怪皮杜尔放弃了黎巴嫩，而他自己曾在1945年12月与英国人签署协议，拯救了这个国家。“如果我们留在黎巴嫩，叙利亚迟早会重新求助于我们的。”

1950年1月6日

我立即记下了1950年1月6日的一次虽然简短但却有趣的谈话。1月1日，他曾收到普利文的一封信，信中提到了“我们紧紧地团结在您周围”的那段时间。他曾对我说过他想在回信中这样写：“除了三个人——米塞利埃、舒曼和你之外，他们一直在我身旁，至今如此。”今天（1月6日）上午，他告诉我他最后决定不给普利文回信了。我提醒他6月18日普利文将到瓦勒里昂山去。他说：“那我就去了。”我回答道：“这可是十周年啊……”他说：“要是你知道我是多么不在乎6月18日就好了。我这个6月18日使他们讨厌。他们将本着什么精神来庆祝这个日子，我是很清楚的！”后来，他又进一步说：“你懂吧，一切都完了。法国曾经碰到过前所未有的良机，却没有抓住它。第一次，法国差点儿灭亡，1914年是霞飞老头拯救了它，1917年和1918年是克列孟梭拯救了它。第二次，法国垮了，但多亏我才保全了荣誉。下一次，法国将会消亡。俄国的力量变得很了不起了。我刚通过纪尧姆^②得到一些情报，他很了解俄国人。他们不全是

① 指1945年雅尔塔会议。——译者

② 纪尧姆将军曾于1945年任驻莫斯科的武官。在他的著作中，我们仅列举《为什么红军得胜了》和《苏德战争》。

共产主义者，但他们都主张俄罗斯统治世界。斯大林的死不会改变这一切。相反，俄国可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因为现在轮到它了。”

我从这次谈话得到一个深刻印象：他不再相信自己进行的战斗了。在他自己眼里，他已经是一个满载往昔荣誉的过世之人。请参考一下不久前他对我谈起达拉第和其他人时说的话：“他们不象我，他们的命运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

1950年1月10日

将军对前途十分悲观。“这个社会完了。”我提到人口出生率。“我说的不是人种，而是社会。人种还将生存下去。”他认为人们愿意有孩子并不是基督徒的反应，而是人种的反应。我们谈到了夫妻生活中的混乱现象。“巴黎腐败了，这个社会也腐败了。”他对庸碌的芸芸众生感到惊讶，而且这种状况不仅仅存在于法国。他说：“再也不会会有好戏，不会有好小说了……”

关于《费加罗报》发表的就保卫斯特拉斯堡^①致艾森豪威尔的信，他提到当时的情况：美国人象法国人1940年一样逃之夭夭了，而下一次，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会溜之大吉。接着，他有点儿夸大其词地讲述了发生在凡尔赛的那一幕往事^②：当时，他说出了自己已经打定的主意，而丘吉尔却瞎忙一阵，毫无表示，“艾森豪威尔则睡觉了”。

1950年2月11日

同将军有过几次有趣的谈话。他非常乐观。不过，“如

① 1944年底，面对德军的攻势，盟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法军放弃斯特拉斯堡。戴高乐反对这一命令并为此致信艾森豪威尔。——译者

② 为保卫斯特拉斯堡一事，戴高乐给艾森豪威尔写信后又亲自去凡尔赛见他，丘吉尔也在场。——译者

果事情变糟以后由我出来主事，或者由我主事以后事情变糟了，那都一样……”

我记下了他就英国选举所说的话。他认为，这次选举会产生一个各派力量势均力敌的议会。“我喜欢，是的，我喜欢保守党人，尽管在叙利亚问题上我不会原谅他们。他们那里有一些君子。炸弹在头顶上，他们也能挺住腰杆，哪怕只是为了尊严也罢。工党分子只不过是一些披着基督徒外衣的人民共和国运动派。”

另一个想法：完全应该重新武装德国。“德国是士兵与音乐家之乡。人们把它的士兵除掉了，而音乐家又都是犹太人，都逃到美国去了。”

世界的变化出人意料。

1950年4月25日（星期二）

将军回到巴黎。我向他谈起雷米。将军认为他已经完了，“他在主要问题上退缩了”。使他震惊的是，一个“并不笨”的人竟能在他身边生活了十年而什么也不明白。将军因此十分悲伤。他提到贝当的旅行和1944年在南希拍的照片，并且说：“听我讲话的都是那些人。没有人看出区别何在。”我指出，在1944年，贝当在巴黎和戴高乐在巴黎是有区别的。他回答说：“如果1944年1月贝当能设法脱身并同美国人和解，他就可以象我那样进入巴黎，起码他不会徒步，可这也难说，因为他喜欢步行！”

但是，片刻之后，他在谈到选举时说：“法国有三股力量：共产党人、戴派、维希分子。”

值得指出的是，拉巴多尼寄给将军一封与雷米彻底决裂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了解他的虚荣心和野心……”

后来谈的都是国际政治。可谓“海阔天空”。他谈到了

海南岛。三千共产党人赶跑了十五万国民党人。他还提到了美国人出售的飞机的事件。“蒋介石跑到了香港。英国人刚把这些飞机交给了毛泽东！”我则谈到马来西亚，在那里十三万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对付不了四、五千名游击队员。

我们接着谈到英国。他认为英国会分裂为二。他说：“特别是那些年轻的保守党人，我了解他们。他们可不是胆小鬼。这些家伙不好惹，和纳粹分子差不多。丘吉尔会象一只孵出了鸭子的母鸡一样。”同样，年轻的工党党员也是些强硬派。最后，他说：“如果今后两三年资本主义世界——首先是美国——不能完全振兴的话，俄国将会捞到好处。它并不是最强大的，但其他国家将成为最弱小的。”

1950年5月1日

将军感慨地说：“没有治国的人才。只有一些办事员，没有治国的人才，也就是说没有那种善于表示不同意见而又言必有信的人，没有鲁瓦^①那样，‘在职时无人喜欢，离职后人人怀念的人’。”应当指出，当我提到莫克^②时，他对我说：“他可能算一个，尽管不能肯定他是一位言必有信的人；他把职位看得太重了。治国的人才应当不怕丢官。”

在他们之上是国务活动家，他们“领导着国家”。他举出克列孟梭。关于治国的人才，他举出了彭加勒和巴尔都。当今，没有这方面的人才了。“我还没看到。勒内·梅耶的行为(五千法郎纸币事件^③)证明他不是这种人才。皮杜尔也不是，克耶也不是……”

① 鲁瓦侯爵(1641—1691)，曾任路易十四的陆军部国防秘书，工作热情，思想清晰，但性情粗暴，制定了一些严厉的政策。——译者

② 莫克(1893—)，法国政治家，多次任部长。——译者

③ 指勒内·梅耶1947年任财政部长时强迫兑换币值五千法郎的纸币一事。——译者

1950年7月2日

将军直到22日（星期四）晚上才回到巴黎。星期五，我同他就他的演说^①进行了一次有趣的长谈。他谈到维希时，重新使用了弓和两根弓弦的譬喻，来反驳《法兰西景象》刊登的雷米的新文章。我让他删去了这句话。我向他指出，他这样做显得是承认自己被击中了，他接受了我的意见^②（关于将军在瓦恩谈话的“公报”发表之后，雷米寄来一封长信，同时，他的那个当修女的妹妹雅克琳也来信胡诌一通。将军回了一封简短而恰到好处信，拒绝通过书信展开讨论，还重申了对他的始终不渝的友谊。大概这封信到得太晚了，未能阻止文章的发表。尽管如此，雷米又寄来一封信。将军起初拒绝看这封信，后来他又向博纳瓦尔^③要去了。信虽然写得热情洋溢，但什么也没有否认，而且毫无悔恨之意）。接下去我们谈到了国家元首的权力。他对我说了他“思想深处的想法”。已有先例证明，鉴于法国的弱点，实行专制是不可能的，法国与这种制度不能并存。因此，目标是：要有一位强有力的、深孚众望的国家元首，“以免各党各派做得太过分了”。

1950年7月11日

我同布雷德福和迪奥梅德·卡特鲁一起重读了将军答记者问的稿子。我得知美国人的最新式的坦克完全被北朝鲜的

① 指戴高乐将军1950年6月23日，在法兰西人民联盟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说，大会在凡尔赛门举行。

② 当雷米上校揭露了戴高乐将军在法国获得解放后向他讲的关于维希的话以后，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话就是：法国的弓上应该有两根弦：剑与盾，将军是剑，贝当元帅是盾。

③ 加斯东·德博纳瓦尔上校，曾任戴高乐的副官。——译者

坦克摧毀了，而美国武器却无法穿透北朝鲜的坦克。在装备上处于严重的劣势。以后更不得了！

五时半，将军到了，他和我谈了将近一小时。这是一堂精采的哲学课。他象历史的鉴赏家似地静观世界的末日并作出辛辣的评论。产生这种悲观情绪^①有两个原因：朝鲜问题和（星期口举行的）北部区级选举的结果不大理想。

谈到法国，他的措辞很严厉。他说“1912至1913年间，人们感到战争临头，于是国家清醒起来了。1936至1937年时就不一样了；它参与搞了个慕尼黑，但不管怎样，全国还是动员起来了。这一次可是完了。我曾夸口，但第一军都是黑人和非洲人。勒克莱尔的师在巴黎吸收了2,500名志愿入伍者。事实上，我挽回了面子，但法国不跟上来……我将不执政了……让他们去见鬼吧。我把我心灵深处的想法告诉你：一切都完了。法国完了。我将写下最后的一页。”他谈到自己时往往称“戴高乐”，但这次他异常超脱，好象是与他本人不相干的一个观众，注意到有一个机会被错过了。他说：“机会，就是紧跟戴高乐……然而，他们都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甩掉他。我嘛，我才不在乎呢，我的生活已经够充实了。”

他在谈到资本主义世界时说：“这是一些该入地狱的人，一些喜欢搞卑鄙勾当的人。这个世界象地狱一样老朽了。”我对他说，他最终将接受挑战，亲自出马竞选。他表示：“一会儿上台，一会儿又下台，啊，我再也不干了！”我回答他说，应该让骑士的雕像走下来吓唬吓唬人。我嘴上这么说，但我并不相信这点。

^① 参阅将军1950年8月17日的声明，见《有关文件汇编》5。

1950年7月12日(星期三)

明显的变化：情绪很好。将军给我念了一段他在回忆录中对丘吉尔的奇妙的描绘（这段描写以及将军给丘吉尔的信^①见本书附录）。

1950年8月2日

谈话题目：“完蛋了！”将军说：“法国是可鄙的，而且受到了鄙视。还有必要拯救自由吗？他们拿自由干了些什么……他们买了食糖，别人也强不了多少……而我们呢，我们是法国，处在我们的位置上！美国在朝鲜打了败仗，而且在马立克先生的主持下坐在联合国开会！”

他对帕莱夫斯基谈的还是老一套，不过这一次却拍了桌子。

我对他说：“应该这样……”他回答说：“我就是这样做的。目前发生的事情正对我们的时代作出判决，他们迟早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哥萨克人打交道。”

另外，将军还收到了他自己称之为“雷米运动”的许多信件。他一般都批注：“不予答复。”他说：“啊，维希分子多么希望我起用他们啊！”

今天上午的谈话内容还有：“1940年，法国被占领了。因此，我使人们相信，法国是和我在一起的。但是，这一次，法国还是那个样子，大家也都看到它是个什么样子。”

1950年11月14日

六时至七时，我与将军进行了一次饶有情趣的交谈。他对我谈的主要是总的局势。他相信战争会打赢，但停不下来。他认为法国不会如期复兴，将会遭受入侵、轰炸，等等。我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3、4。

说：“大家不知如何是好。”将军说：“我也不知道。”
“应该试一试。”“我试试看吧。”

将军坚持认为，法国已经自暴自弃了。他说“这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希腊……罗马……今天轮到我們了。总之，我要有权力，能够绞死他们的话，我是会把他们绞死的。如果别人有权绞死他们，而我又能制止的话，我也不会制止。”我回答说：“他们是不会被绞死的。”他说：“谁知道？这一次够人受的。共产党人厉害得很，人民要遭殃。上次，有的人被枪决了，有的人被流放了。这次会有原子弹轰炸、饥馑、流放……美国人也是些野蛮的家伙，看看纽伦堡的情况吧！”接着又说：“我破天荒地救了他们，但他们却诽谤我，在讲话中，在文章里，在城里宴席上都诽谤我。明天，又会从头再来一遍。”

总之，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很超脱，对荣誉、对雄心、对一切都很冷漠。但是，最近几天，丘吉尔的回忆录却使他激动起来（详见《费加罗》报！）。

1950年11月28日

我同将军进行了一次简短而又有趣的谈话。将军很悲观。悲剧临头，而且非常可怕。他说：“我看到再次担负重任的时刻即将来临。这是什么样的担子啊！……但是，我经过考虑以后，认为必须紧跟美国。如同1940年那样，尽管有时叫人很不愉快，也必须紧跟英国人。最后，你会看到，同共产党勾结的人都会像维希一样完蛋。”

1950年12月4日

下午六时十五分开会，参加会议的有苏斯戴尔、米什莱、比约特、阿尔贝、奥利维埃、泰尔努瓦（我建议增加的）和我；帕莱乌斯基因意外的事故缺席。比约特发了一通议论，

但不象私下同我们谈话时那样悲观。他当时说，三天之后会爆发战争。但是，在朝鲜的失败引起慌乱。

对此，将军谈了自己的看法，然后宣读声明^①；苏斯戴尔建议在声明中加上“和平”二字，我们又建议加上呼吁团结的第四个问题。只有奥利维埃对回答中“候选人资格”的提法表示保留。

我对将军的意见深感兴趣。多么精辟啊！他讲了两个方面：

“在朝鲜，和在印度支那一样，打了败仗。战争初期，民主国家就连连败北。打了败仗，应当默认，而不应当公开承认。无论如何也不能搞亚洲慕尼黑。

“至于法国，则应根据总的局势作出推测。我认为，俄国目前不想打一场全面战争。那么法国应该怎样办呢？首先，不要让英国代表法国（这会使肖韦尔出丑^②）。”然后，他又说：“应该保留原子弹，这不是因为许多中国人被杀，今后几年会有许多人被杀。他们怎样被杀死是无关紧要的；保留原子弹，是因为要实现主要目标，就要保留主要武器。最后，要武装自己。”

他讲的许多话，我都忘记了，但他高瞻远瞩、镇静自如和精辟的见解使我钦佩不已。有时，他是以一个可以作出重大决定的政治家的身份讲话的。可惜，最后只不过是一篇声明而已！

1951年4月18日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5。

② 让·肖韦尔，法国大使，1949至1952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和安全理事会的法国代表。

他又讲了几句不参加竞选的话^①。他说：“这是我决不屈服于共同法规的一张牌。我不会开牌的。何况，我在向法国推荐的正是我自己！”

1951年4月24日

关于预定的选举法的投票问题，我问他应如何向(桑戈尔一类)优柔寡断的人做些劝说工作。他断然地回答说：“让他们投反对票。决不参与卑鄙的勾当。选举法规定的是比例代表制，但带有两个污点：联合竞选和塞纳河—外省双重体制。以恢复没有上述两个污点的比例代表制为借口而不参加投票，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但我们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在最后时刻玷污我们自己。我不着急。我等10月份的到来。只有为国家操心，我才着急。”

另外，他还批评议会说：“你看到了吧！他们进行了分区投票。你们看到了泰让^②那一伙与勒让德尔^③那一伙之间有什么不同吗？这种体制腐蚀了一切。所以，我不抱幻想。要么是我们灾难临头，而人家继续前进；要么是天下太平，虚荣心占居上风；要么是我用恫吓手段迫使人们前进；要么是他们象别人一样地背叛我。在我支持的200名候选人中，有180人抱着质询企图，想领导各个委员会，并且有沽名钓誉的想法。

“你看，人们行动的动力只来自两个方面：恐惧和虚荣心。要么是大难临头，一片恐慌；要么是歌舞升平，崇尚虚荣。”

① 指1951年6月的议会选举。

② 皮埃尔·亨利·泰让(1908年—)，法国政治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45—1956年间任法国政府部长。——译者

③ 路易·勒让德尔(1752—1797年)，法国政治家，曾参加雅各宾派，后成为热月党人，并在1795年5月领导了对牧月1日的人民日的镇压。

我反驳说：“我们可以用荣誉二字代替虚荣。”他说：“别上当，搞政治无荣誉可言。所以，要么是我行我素，因为他们害怕；要么是他们背叛我。”

除了对各党各派的批评以外，他还批评了议会制度。他说：“必须同议会决裂。我已拿定主意。只有巴拉香^①没有看到这一点，而他对此也抱有怀疑。在这个议会中，已经没有出类拔萃的人物了。连莫里亚克也是这样说的。”（见当天的《费加罗报》文章）

1951年7月8日

我对将军的评论也有些怀疑。应该指出，富歇对我说过：“这个人已是垂暮之年，不行了。”总之，看到他一方面固执己见，否认现实，另一方面又不承认他人的成就，我是感到怀疑的。

将军尽管实际上是让苏斯戴尔和巴拉香在议会问题上自行其是，但仍反复对我说：“要想让人们在议会里和通过议会达不到的目的，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办不到的。”但又如何办才好呢？当然，他想在国内作一点努力。可是，实际上，他赞成（正如他们过去都表示赞成一样）我提出的只向没有众议员的地区派出特派员的主张，他声称要把精力集中于职业培训和社会工作，并让他的兄弟来领导。他想干什么？从外部来摧毁议会制度？我想他不会这样干。那又是为了什么呢？或许是心里想，事件终究可能发生，因此应该长期保持法兰西人民联盟？……他真正相信这样的目标能在今后五年之内吸引很多人吗？

另一方面，竭力否定别人的成就。他对克耶表示不满。

^① 爱德蒙·巴拉香，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创始人之一，1951年曾任国民议会普选委员会主席。

他说：“他当了二十年的部长。我看谁也不会向我提到他做过的事，连一句话也不会提。”我不禁回答道：“他在竞选中获胜了。”应该说将军同意了这一点。他在多大程度上是装模作样呢？他是否由于乐观而犯了错误，现在却装出了悲观的样子，使我们以为他从未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会取得成功呢？

1951年7月24日

我宣布贝当元帅逝世消息时，显得有些笨拙，我说的是“贝当死了。”将军说：“是的，元帅是死了。”当我谈到发表一项声明时，他说：“不，以后再说。我不能象保罗·雷诺那样匆匆忙忙地发表声明！”我补充说：“不管怎么说，总算了结了一桩事。”他回答道：“不，这是一场历史大悲剧，历史悲剧是永远不会完结的。”

贝当之死也引起了将军的另一些评论，这一次并不是我引起的。将军说：“他的存在是法国很大的不幸。他把国家引入了歧途。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约束公民。国家只有使公民得到应有的东西时，才能起约束他们的作用。可是，贝当把国家给毁了，把军队给毁了。今天，我们如何重建一支从未打过仗的军队呢？如何重建一支已经沉没的舰队呢？他坑害了一切。他让共产党人骑到我的背上，他没有这种权利。国家的职责不是唆使人们从事卑劣的勾当。现在纪念贝当的人，其理由是见不得人的，因为正是贝当使他们免于作战。贝当保护了坛坛罐罐，但要拯救的并不是坛坛罐罐，而是法兰西。”他沉默片刻后说：“幸亏当时有我。”

1951年9月20日

我与将军有过两次饶有趣味的谈话：一次是关于他的计划。他说：“应该建设国家。我不过问区议会的选举。我很

少过问，是因为这不会获得很大成功。这不是我们的战斗。但我们将欢呼胜利。然后，我们将召开会议，重整国家。议会是一文不值的。”我反驳说，议会是权力之门。他回答道：

“我并不是说我拒绝某些形式。但是，只能靠国家的压力才能打开权力的大门。……在此期间，他们都在那里说应当请我出山。你见过马尔蒂诺—戴普拉。他们‘想搬掉戴高乐这块绊脚石’。1940年以来，米塞利埃、丘吉尔等人都在说搬掉戴高乐这块绊脚石。”我回答说，由于搬不掉绊脚石，终有一天就会成为房子的主人。

19日晚上，我们进行了一次更有趣的谈话。将军说：“英国将要举行大选。我认为保守党人将获胜。我很乐意看看丘吉尔将如何动作。因为他是政客。他在战争期间还过得去，但现在……不过，英国很需要振兴。然而，它是个岛国。而我们呢，处在我们这个地位，我们更需要振兴。美国不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财富。但是，我们……因此，我们需要作出努力。别人的情况也不比我们强多少。罗斯福死了。接替他的不是巨人。英国人兴高采烈地摆脱了丘吉尔，但他们推举出来的接替人也不是巨人。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后，德国和意大利又有什么人呢？就是在俄国，斯大林的影响已经消失，而在战争年代却总是感到他的影响，那时一切以他为中心，一切由他主宰。当今的时代已不是造英雄的时代了。”他笑着补充说：“其实，这样更好一些，因为永远伟大未免使人精疲力竭了！”（原文如此）

我的印象是：他不想再掌权了。他对“没有戴高乐的戴高乐主义”，对他自己能起良师益友和珈桑德拉^①的作用感

^① 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公主，女预言家。——译者

到满足。他已成为一位“历史学家和旁观者”。由于我曾说过应该在一切消失之前达到目标。他说：“任何事物都不会整个地消失。但是，至少在一代或几代人的时间里，法国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之中。这是在十八世纪大工业出现时开始的。在此之前，我们曾经是一个农业大国。后来，工业诞生了。我们没有煤，金属矿藏也不多，没有石油……而且屡遭外国入侵。正是入侵使路易十六走上了断头台，后来入侵又驱逐了拿破仑；正是对入侵的积怨点燃了1830年和1848年的革命之火；正是入侵赶走了拿破仑第三，随后成立了第三共和国。”他停了下来，我也不敢说下去了。

1951年12月4日

我记下将军亲自就国际事件对我讲述的一番不抱希望的话：“无能为力，这就是我内心深处的想法。都在策划反对法国，有英国，有美国，现在又加上德国，还有法国自己。人们逆来顺受。法国无法制定自己的政策了。”我反驳说，他本来是不该辞职的。他回答道：“当时我干不下去了，根本没有什么政府。人家搞了一部宪法反对我。部长们都背叛了我。生活又重新开始了。各个政党看到选举等活动中的种种鬼名堂依然如故，就对我群起而攻之。我已‘无计可施了’。只有一个人理解这一点，那就是多特里^①……这一切都叫人高兴不起来。军队也使我寒心，我是在军队中成长起来的，我曾目睹这支军队在1940年崩溃的情景，我也看到这支军队现在是在艾森豪威尔手中。谁也不感到奇怪，也不感到愤懑。”

可怜的比较特却热衷于安排戴高乐和艾森豪威尔的会

① 多特里，法国行政官员，工程师（1880—1951年）。——译者

晤。不过，将军回答说：“会晤当然可以。好主意！我将在欧洲盟军司令部隆重地接待他。”事情就算了结了。

1952年2月3日

1月30日（星期三）上午，我和戴高乐谈了一个多小时，这是最有趣的一次。他是前一天晚上到达的，不过先到解放战士荣誉团去了。由于星期天他在阿尔及利亚和厄尔—卢瓦尔两地的部份选举中失败，他满怀苦衷。他谈话坦率，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你看，实际上只有两条出路。要么是美国人离开欧洲，不是形式上离开，而是真正离开。在这种情况下，奥里奥尔那帮人和其他人将跪倒在俄国人面前。斯大林会发表安抚人心的声明，人们会看到巴甫洛夫，再加上窥伺时机的皮埃尔·科特，还有一、二个别的人，他们会获胜。这是毫无疑问的；要么是美国人留下来，这样，他们就俯伏在美国人脚下。事情已露端倪。我建立联盟是为了改变政体。我失败了。不过，我已经是竭尽全力了。可能部份是由于我的过失所致。但我不可能改变主意。何况我又不大相信人的作用。人们无视这场法兰西与政体之间的斗争。大家都承认已无国家可言。但是，每个人又都顺应现状。在外交方面，法国没有自己的政策。有些人在温文尔雅地发议论。人们在重新装饰门面。

‘亲爱的，把油漆桶递给我。’但也如此而已。”

我强调必须抓住时机。但他却不以为然。关于他去北方并会见那些无视社会问题的雇主一事，我表示反对，并说这可能是一伙反动的雇主。他说：“不。他们自以为是很关心社会问题的。他们不惜资金修建厕所和淋浴室，他们的夫人们四出奔波，散发新生婴儿的衣物用品。但是，在吸收工人参与管理方面，他们都一概反对。在我年轻的时候，人家是

反对提高工资，他们不想让‘工人更多地饮酒’。一切都是从这些精英分子开始变糟的。”

1952年5月4日

在卢瓦尔省的部份选举中，布鲁耶遭到惨败。第二天，将军十分激动，他要我到科龙贝去。我推说参议院里杂事太多，当时皮埃尔·戴高乐在安纳西，泰尔努瓦在医院，等等。6日（星期二），我在拉贝鲁斯进午餐。将军焦躁不安。下午，我在行政法院，他要我去见他竟达十次之多。快七时我才去见他。但他却把谈话推迟到次日。星期三，我们作了一次长时间的交谈。他说：“我想向您请教。我希望你把您的想法告诉我，您内心深处的想法。”

实际上，这等于问我：“他是否应离开政府？”我谈了很长时间，谈到了形势、前景，并说明一旦离开了政权，机会就很少了。我一开始就反对象1946年1月那样辞职。我本人赞成半脱离，但是他认为离职就等于承认失败，再说，如果他离开联盟，联盟必将分崩离析。总之，我仍然劝他10月份召开会议，等待良机与比内彻底决裂。

在我看来，他无论如何也（宁愿）决心继续干下去，但不排除辞职的可能性（他向我重复了两遍，并要我不向任何人透露此事）。

1952年5月18日

至于我，我接到了苏斯戴尔写给我的信^①，信中附有一封给将军的信^②。我于13日把信交给了将军，并同他作了一次重要谈话。这次谈话是上次谈话的继续，但要深入得多。他谈到了两种可能性：或者（悄悄地或堂尔皇之地）引退，或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8。

② 信的抄件见《有关文件汇编》9。

者在政权中玩弄手腕，但不能采取下述解决办法：不光彩地消磨力量，最后在历史面前败北。历史从来不会认为人民有错。它将会说：“戴高乐失败了”，而不会说：“法国犯了错误”。

我在谈话中反驳了他的全部论点，而且占了上风。他最后终于失去了耐心，并用这段话结束了谈话：“真理，真理就是他们这些人不甘心继续当反对派。工党分子、保守党人、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以及帝国时期的共和党人……他们也不甘心。”

1953年1月27日

我见到了将军，他身体很好。他主要谈到了弗朗索瓦·蓬塞的演说^①：“保护人，他们的保护人干得真漂亮啊！这个保护人并没有能使他们，首先是使弗朗索瓦·蓬塞逃避厄运：去德国服劳役、遭到流放。他们的这个保护人对我和盟国进行了攻击。维希派资产阶级发狂似地企图为自己辩解。”

此外，将军还谈到了中世纪、巴黎城下的圣女贞德、与敌人合作的资产阶级、相信戴高乐主义的人民以及查理七世和他的传令官。这位传令官在查理七世进来时高声说道：“国王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说。”将军说：“但我不是国王，我不可能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听说。当然，我尽可能避免过于认真。我只不过枪毙了两个部长，而事实上我曾尽力保护过他们。不幸的是，我不是国王。最大的不幸在于王朝的合法性已被摧毁。”

将军还论及国家机构问题以及反对政府的必要性。我表

^① 指接纳弗朗索瓦·蓬塞加入法兰西学院的演说，1953年1月24日。这位新成员代替了贝当元帅。参阅《有关文件汇编》10。

示了不同意见，说：假如他在1944年使宪法得到修改（将军说：“我当时无法做到这一点，贝当把局面搞乱了。”），并当了国家元首，那么在他离去之后，一切又会立即复旧。将军说：“我同意这一看法。”

关于奥拉多尔事件，将军说：“由于不要求引渡德国人，人们已经成功地使奥拉多尔事件成为法兰西人和阿尔萨斯人之间的事^①。正是这些阿尔萨斯人摧毁了奥拉多尔！在四百人中间他们只占十二人！”

1953年4月21日

我和将军谈了很久。将军深感失望。我们一起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将军说：

“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所有的政治流派都反对我。从1945年开始，人心一直在我们一边，但各个政治流派都毫无例外地反对我。在1946年国民议会第一次会议上，我就具体地感觉到这一点。”

“不管赫里欧、勃鲁姆等人对过去怎样想、怎样看，如果他们心里还有祖国，他们本来就应该说：应该让他掌权，只有他才配掌权。但他们却说了相反的话。今天，情况同样如此。连法兰西人民联盟也一样：从苏斯戴尔去爱丽舍宫并考虑组阁之日起，他在感情上总是向着我，而在政治上却和我作对。应该怎么办呢？我在贝叶^②演讲中说过，就是说：留点神，注意君主制度。贝叶讲话的精神，是我在战争期间深思熟虑后形成的。当时大家都同意这一精神。”

1953年5月9日

① 奥拉多尔絮格兰案件在1月12日开始审理。

② 1946年6月16日，参看弗朗克·布里代尔的文章。参阅《有关文件汇编》11。

将军对现政府的软弱无能作了正确的描述^①。在他看来，很想弄个明白，既然大家都采取了批评这一原则，为什么人们却又抛弃他，或反对他呢？他显得很激动：“蓬皮杜，他们到底为什么都反对我？为什么？而在批判现政府的问题上，为什么又和我意见一致？如果这是以共产主义的名义或者是以贝当元帅的名义，那我是能够理解的，或是早已理解了。然而，他们现在的那种做法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说不上是根据什么原则……”

他的话感人肺腑。他依然是那样自傲：“事过境迁了。……我在写我的回忆录，我在审校稿子……我是孤军奋战。要是没有我，那时就只会有几个法国飞行员在英国皇家空军里，在国内也只会有几个觊觎部长席位的阴谋家……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那些所谓的精英分子都彻底完蛋了。”

他还对战争作了精辟的分析：“上次战争不是群众的战争，只是飞机和坦克。解放法国的战役，实际上就是巴顿实现突破的那一仗，而其他的军事行动都是装装门面而已。现在，起作用的是原子武器，其余都不在话下。阻止俄国人行动的，不是李奇微，而是原子弹。此外，我并不反对防务共同体，也不反对北大西洋公约。但我不愿把法国拱手交给阿登纳。否则，当初就不必组织抵抗运动了。”

1953年5月23日

将军在重大问题上的看法比任何时候都更明智，他的自我辩解的愿望，也比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而他的行动却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消极。他曾在万森^②向五十万人建议进行选

^① 参考1953年5月6日戴高乐将军的声明。参阅《有关文件汇编》12。

^② 1947年市政选举期间，50万人聚集在万森赛马场，向将军欢呼。1953年5月，将军同意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议员可以自由采取立场。

举，而现在又向八十五名议员建议自由采取立场。将军对我非常友好、亲切：“蓬皮杜，你到底怎么看呢？……”关于议员一事，将军对我相当保密，尤其是因为当他暗示，一定要把苏斯戴尔抛掉（“我一定要使他不能控制报纸！！”）时，我却称赞了苏斯戴尔。可怜的沙邦跑来对将军说，假如他当总统，就要以避开人民阵线为行动目的！“人民阵线，我才不在乎呢！”显然希望发生一场灾难的将军这样对我说。“我决定不搞决裂，而要采取超脱的态度。我不参加任何有损于法兰西的行动，即使是以对一个不是全都错了的国家抱有怨恨为借口而采取的行动。”骄傲、自我辩护的意志以及自我中心感，损害了他的巨大天才。他又一次在我面前显露了他的上述特点：他谈到了四国首脑会议以及那些不利于法国的解决办法（把印度支那问题提交联合国——让德国通过联营染指非洲）。

1955年8月10日

我在格朗瓦尔^①之后见到了将军。将军身体和精神状况都非常之好。他在谈话时使用了讽刺的口吻，但却流露出悲观的情绪。关于格朗瓦尔的使命，将军非常挖苦地说：“人们自然会采取一种不能解决问题的解决办法——建立摄政委员会——，但这样可以使政府争取到时间。当然，现政府连这样一种解决办法也无法接受。为了争取时间，人们将会表面假装接受，同时却予以拒绝。”“格朗瓦尔将会说，他本来可以骂声‘见鬼’，但他是不会这样做的，至少目前不会。将来，他也不会全盘接受，因为他有一些……，但他终究还是要接受的。”将军又转而讽刺埃德加·富尔。富尔将会对

^① 吉贝尔·格朗瓦尔，当时是法国驻摩洛哥总代表，在此之前，任法国驻萨尔（阿尔及利亚）外交使团团长。

他说：“我和你是一致的，但不能说出来。总有一天我是会公开表示的。请给我时间……”。而实际上，埃德加·富尔已开始抛弃将军并听凭别人批评将军……将军说：“格朗瓦尔的劲头很足，但摩洛哥毕竟不是萨尔。”

然而，“大国”表面上将达成一致意见，决定“消除战争的策源地。有一天，人们将通过苏美协定迫使我们放弃在摩洛哥的权利”。埃德加·富尔将非常高兴地推卸责任。

“我们怎么能够不参加和平事业呢？……难道我们要去打乱国际格局吗？……”

总之，他相信人类迟早会冒险去尝试一下。“领导人（布尔加宁和艾森豪威尔）没有足够的权力去销毁他们的原子弹。因此，他们将保存它们，而且很快大家都会有这样的炸弹。裁军是做不到的。有的人将象可怜的法奇为了解决供应问题而大画其母牛那样，对俄国寄予不切实际的幻想。但裁军不会实现……不久，布尔吉巴也会有他的原子弹。某一天，人们将得知：‘五十三枚美国原子弹不见了。’忽然，另一个早上，一颗原子弹在地中海爆炸了。于是，大家出于恐惧心理，也将把各自的原子弹都扔了出去。”

“解放十年了，”我对他说，“变化可真大啊！”

“是的，现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同意塞内普作的那幅画，在他的画笔下，‘四巨头’双脚倒挂，被拖进了太空。人再也不是自己事业的主人了。世界一个劲儿地滑向毁灭的深渊。”

有关文件汇编

1. 戴高乐将军致蓬皮杜函

亲爱的朋友：

谢谢您亲切的祝愿。您个人的祝愿和您代表我们秘书处男女成员表示的祝愿，使我深受感动。你们赠送的这些美丽的鲜花，就体现了这种心愿！

请您告诉他们，他们的深情厚谊对我是一种安慰、一种鼓励。我十分珍视这种感情。

亲爱的朋友，请相信我的诚挚友情。

夏尔·戴高乐

1949年11月23日

2. 帕莱夫斯基致蓬皮杜函

亲爱的朋友：

十分感谢您的来信。此信文笔细腻，感情入微，富有远见卓识，酷肖您本人。

您在您担任的重要岗位上，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尤其是那位对我们和我们国家至关重要的领导人的信任。每当想到这一点，我就欣喜异常。

您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在他身边工作是多么的必要，他比任何人都有资格得到一些大公无私的顾问的协助。祝愿

您能长期在他身边担任您的职务，您是多么称职啊。现在，您已经充分显示出您的勤奋和效率。在最初的那些日子里，建立起来的人数极少的核心班子，团结一致地向您表示欢迎，并支持您的工作。

我不知道来年是否会赐予我们政权，但斗争必然会更加艰巨。在花了几天时间处理私事后，现在应当披挂上阵了。由于您的协助，我只须正面迎战对手而无后顾之忧了。这使我感到无比欣慰。真是幸运啊！

在这辞旧迎新时刻，请接受我对您和你们全家的热烈、诚挚的祝愿。

您的朋友

加斯东·帕莱夫斯基

1949年12月31日于波拿巴街1号

3. 戴高乐将军致丘吉尔函

亲爱的丘吉尔先生：

我正在写关于上次战争的回忆录。我无法预料什么时候能够出版，但我现在就先随函寄上回忆录中有关您的篇章，其中谈到了1940年6月8日我们在唐宁街您的办公室里的第一次会见。当然，这个材料只是寄给您的。

亲爱的丘吉尔先生，我希望您从中看到我个人对过去的诚挚感情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夏尔·戴高乐

1950年7月26日

4. 对温斯顿·丘吉尔的描写

丘吉尔先生在唐宁街接见了。这是我第一次同他接

触。他给我的印象证实了我的信念：英国在这样一位斗士的领导下，肯定是不屈的。在我看来，工作再艰巨，只要是崇高的，丘吉尔先生都能胜任。他判断稳健，学识渊博，对有关的问题、国家和人物大都很了解，对有关战争的问题兴趣很大。这一切都能自如地表现出来。最重要的是，从他的性格来说，他善于行动和冒险，善于非常果断地、非常自然地、无所顾忌地扮演自己的角色。总之，我觉得，他作为导师和领袖的地位是很稳固的。这就是我的初步印象。

后来的事实更肯定了我的这些印象，并使我发现丘吉尔先生有他独特的辩才而且知道如何加以运用。无论是在人群前、在议会中、在内阁会议上，还是个别交谈，也无无论是在麦克风前、在讲坛上、在筵席间，还是坐在办公桌后面，他的见解、论据和感情都是以别具一格的、富有诗意的、动人心弦的方式滔滔不绝地表达出来；几乎可以肯定，当可怜的人们在悲惨气氛中有所盼望时，这就使他得以平步青云。他在政治上是久经考验的，因而善于运用天使和魔鬼的才能来激励缺乏热情的英国人，并给外国人以深刻的印象。甚至连他那富有幽默感的言谈举止以及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怒气冲天的表情，也无不使人感到他在镇定自若地驾驭着他参与的惊险事业。

我们两人的性格迥然不同；我们各自国家在某些方面有利害冲突，在他的推动下，英国有时采取了对百孔千疮的法国有害的行动。因此，我们两人之间多次发生过严重的、令人不快的事件。这一点影响了我对首相的态度，但从未影响我对他的评价。依我看来，在这场悲剧中，温斯顿·丘吉尔自始至终是一个伟大事业的伟大先锋，也是一段伟大历史的伟大缔造者。

5. 戴高乐将军1950年8月17日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

暴风雨临近了。朝鲜战争就是前兆。众所周知，侵略总有一天会蔓延到欧洲和法国。

然而，世界上存在着战胜危难所必需的一切。苏联人之所以占有优势，只是因为别人气馁、懦弱、分散。自由国家一旦站立起来，就有能力确立和平。我们法国应作出榜样！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自救之路。尽管我们蒙受了重大损失，但应该付出的努力并没有超出国家的能力。

不过，在目前情况下，如果我们遭到攻击，我们只能以微弱的防御力量来反击侵略。世界范围内敲响的警钟，在某种程度上消除了官方和非官方消息报导所造成的模糊观念，从而使人们看到我们的国土没有设防，欧洲的防务根本没有有效地组织起来，我们的海外盟友也不会同意在必要时投入兵力，和我们一起保卫我们的边界。霎时间，我们作为政府所要承担的责任该有多么重大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除了自己复兴起来，别无他路。我们应该首先依靠我们自己并且为了我们自己而复兴起来。如果我们受到攻击，即使我们孤立无援，也要战斗到底，因为，一个伟大的人民如果不加抵抗就甘心受人奴役，就永远恢复不了自己的荣誉和独立。让那些蛊惑人心的政客不去首先保障自己祖国的安全而认真工作，反而大谈集体安全吧！再说，万一我们遭到进攻，也只有法国自己稳固坚强起来，才能得到外界的强大支援。只有法国基本上能守住大西洋的桥头堡，美国军队才会大力协助欧洲。总之，经历了如此之多的教训以后，要记住战争不是一部言情小说，也要记住，在战争突然激起的激情中，法国如果在联盟里软弱无力、俯首

贴耳，就会同法兰西联邦一起失去权利，受人嘲弄。我这样说，是因为我深知这点。简而言之，我们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和我们自己的决心，才能在应有的良好条件下同别人一起处理大西洋合作问题。

必须重建我们的海、陆、空三军；是的，必须重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军队！这不会妨碍我们的部队和盟国部队的共同行动；情况正好相反，而且我们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至少要有15个师的常备军，要有40个师的后备军，每个地区都要拥有发生战争时能立即进行防御和保障安全的小部队。所有这些部队要受到5,000架飞机的保护，还要有适当吨位的舰队和必要的海空力量来保护我们的主要港口和运输。最后，还要为全国兵役事先准备好人力和财力。以上就是为我们自己的开放，为我们对欧洲开放作出贡献所应该做的工作。这些工作应该在今后三年内在军队必须具备和应有的充满荣誉、生气勃勃和信任的气氛中实现，我国士兵在印度支那的光荣服务可资证明。应该根据要达到的目标来确定经费、服役期限、编制、装备、干部配备和武器制造，而不是象目前这样本末倒置。

这项组织工作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但与受人奴役比较起来，就算不了什么了。不过，它要求在法国人民必须作出努力和牺牲的情况下，重新造成已遭到分散主义破坏的全国团结的局面。这种可怕的创伤，其深刻原因在于劳动者只是雇佣劳动者这一制度。另一个原因就是当局对那些利用社会不公正为入侵作内应的人始终软弱无力。当祖国面临威胁，因而求助于自己的儿女时，必须把所有的人团结起来共同生产，提高生产率。必须改善劳动条件，使劳动者同他们自己的企业结合起来。这样，他们也就把自己同搞好国防直接联

系起来了，同时还必须粉碎破坏国家的阴谋。这是刻不容缓的。

我们必须使欧洲团结起来。目前的斯特拉斯堡委员会^①是做不到的，它没有欧洲的有效授权。为此，必须有法、德之间的真正和解作为基础，因为真正的战略上的实力和经济上的实力都基本上汇集在我们这个古老的大陆上。还必须建立一些机构，由欧洲公民直接投票产生，并在经济和防务方面拥有各参与国所授予的主权。最后，还必须有一个共同防御体系，在正常情况下由法国来制定这个体系的计划并指定负责人，正如这一优先权在太平洋战场属于美国，在东方战场属于英国一样。整个体系置于各国理事会及联合参谋部的最高领导之下。只要欧洲这样形成并坚持下去，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就会重新出现希望！

我们要改变现在使共和国进展缓慢的政权。这个政权是软弱无能的。当今，地球上没有一个人看不到这一点。原因并不在于这一政权的各级机构缺少智慧，而在于它只代表政党，也就是说它造成了我国的分裂。它把全部权力都交给了各个政党，这就等于什么权力也没有了。总之，现在模棱两可的态度已不复存在，所以政体就与国家的愿望和感情完全不一致了。只要把这些弊端列举出来，就可以确定采用什么办法，这也是我同其他一些人经常所采取的做法。但是，改革是刻不容缓的，因为民族要有灵魂，国家要有权威，否则就会灭亡。

目前，面临的威胁乃是这一政权的自暴自弃。它遇到直接危机时将会如何呢？当全世界都处于戒备状态时，议会竟

^① 指总部设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委员会。——译者

然不对任何有关防务的措施进行表决，甚至不进行辩论就休会了。当然，即便议会进行辩论和表决，也只能搞出些不三不四、令人啼笑皆非的东西。在朝鲜战争爆发两个月之后，政府仍未采取任何措施。在美国的迫切要求下，政府似乎泛泛地表示了一些意向，但它又说这些意向的付诸实施取决于外界给予它的捐赠。然而，只有使自己的作用得到发挥的法国，才能要求得到广泛的支援，因为自由世界所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法国。至于大陆防务的最高指挥权，基本上就是说我国防务的最高指挥权，则交给一些英国领袖们掌握，而英国现在只同意派一些象征性的部队到欧洲来！总之，这个政权干的事，就好象一个无力承担民族责任的政权，竭力把自己的责任和一些外国所承担的责任融合在一起，好象它提到的统一行动只是作为放弃责任的借口。

如果这一政权坚持不让，而且使国家在已经开始的世界危机进一步加剧时仍然逃避责任，那么恐怕政权就会逐渐衰败，直至完全毁灭。如果灾难降临，政权就会垮台，要么在无为中消失，要么让位给侵略者的代理人，要么屈从于外国。但是，拯救祖国高于一切，应该让另一个在道义上能对法国的独立和利益负责的政权及时出现。这一点已经做到了！请全国放心，将来还会这样做。

然而，我们并不是注定要遭受这些不幸的。复兴完全可能。这意味着全国要作出巨大的努力。为使全国作出努力，领导人应为国家作出表率。面对日益增长的危险，我声明，我愿意再一次肩负执政的责任。我这样做是为拯救法国创造条件，如果需要的话，我将接受即将来临的考验。我将同所有愿意在这方面帮助我的人一起干，不管他们属于哪个团体、哪个派别、哪种思想体系，也不论他们是已经为救国的使命

联合起来了，还是现在才决定与我会合。普选应该尽快举行，而且不许弄虚作假。我相信，在普选中，人民的投票将大有助于加强这种联合和这种意志，否则恶果昭然。从今天起，责任已经讲明了。

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我们历尽坎坷，并不是为了明天在机器人的潮流面前懦弱地倒下去。象以往一样，前途是可以掌握的。一国人民只有用自己的努力才能换来自己的前途。站起来吧！

6. 蓬皮杜致戴高乐将军函

将军：

欣逢将军华诞，请允许我代表您办公室的全体工作人员向您表示热烈的祝愿。

将军，请不要将此举仅仅视为一种惯常的礼节。能够以这种方式表明我们与您之间的私人关系，真是莫大的荣幸。对此，我们感到自豪和光荣。

1950年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年头。这是您六十大寿的一年，是您在1940年拯救了我国荣誉的十周年，也是您已经预见到的危险增长的一年。

因此，我怀着更加诚挚、更加激动——如果您允许使用这个词——的心情对您说：为了您的亲人，为了法国，愿上帝保佑您。

将军，请接受我的敬意和始终不渝的忠实情谊。

乔治·蓬皮杜

1950年11月21日

7. 戴高乐将军谈话纪录

1950年12月4日于巴黎

问：你认为联合国应从它在朝鲜的挫折中得出什么结论？

答：民主国家面临侵略时会先在军事上遭受挫折。在朝鲜和印度支那就是如此。人们有健全的灵魂和躯体时，是能够经得住挫折的。但是，人们不会就此甘休，否则就会自暴自弃，一误再误。

相反，人们遭受挫折后，就应该立即拿出对策来。不过，应该考虑到目前地区性的冲突随时都可能发展为世界性的冲突。鉴于这种可能的发展，要么是动用自己所拥有的手段，要么是留到以后再使用，因为，最强大的手段，当然是要用于发生这种情况时成为一切目标中最主要的目标。

问：人们肯定地说，艾德礼先生已单身前往华盛顿阐明英法两国政府的观点。

如果是这样，你的想法如何？

答：我会说，在我国的法律中，在我国的历史上，从未允许任何人授权英国政府代表法国的利益。

再说，这还涉及国家的切身利益。对法国这个大陆国家来说，对位于亚、非两洲的法兰西联邦来说，不论英国与我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友谊，这些利益也不能与英国的利益混淆起来。

问：面对日益增长的威胁，你认为拯救法国的道路何在？

答：在于武装起来。为面临同样危险的欧洲各国人民（我说的是“各国”）的共同防务联合起来。同美国一起，尽快

地在欧洲防务和西方防务方面赋予北大西洋公约以强有力的具体内容。首先，要把本国人民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当之无愧的、能在十分严重的世界危机中领导本国人民的政权。这就是救国之路，可能也是恢复和平之路。

问：如果现在让你掌权，以便实现你刚才指出的目标，你会承担这个责任吗？

答：是的。

8. 苏斯戴尔致蓬皮杜函

我亲爱的乔治：

附上一信，请尽快转呈将军。你可一读。这次，我要求恢复我的自由。在本届议会闭会前的最后几周里，我经历了令人难以容忍的时刻。我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再忍受下去了。

祝好。

雅克·苏斯戴尔

1952年5月11日于里昂

9. 苏斯戴尔先生给戴高乐将军函的抄件

将军：

几天来的考虑促使我给您写信。正如我上星期对您说的，让我在议会复会时重新担任我们议会党团主席的这一主意，使我感到难堪。那些令人精疲力竭的讨论，那些互相回避的做法，那些背信弃义的行为，我已经受够了。我已经没有勇气再忍受这一切了。但愿这种牺牲还能有点作用！可是，很清楚，在当前这种形势下，我只能浪费时间，落入圈套，最后使我自己徒劳无益地落得个信誉扫地，这对任何人也没

有好处。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勉强自己担当一个从各方面来说都与我的性格相抵触的角色，从而使我不能有所作为，不能采取任何有益的行动呢？

如果事情象我所想的那样，最好让我只当一名议员，这样，言论和行动更为自由，而且不致于毫无意义地耗费精力。另一方面，我在议会之外，也许还能效劳，或者是更勤奋地为加强我们在里昂以及该地区的地位而工作（这是我以前无法做到的），或者是在全国各地召集一些会议，完成您认为适于委托给我的某些组织工作或视察工作。

因此，请将军让我辞去我去年7月根据您的意愿担任的议会党团主席这一职务。我比任何人更有理由对自己履行这一职务的方式感到不满意。我感到难过的是，正是在我的领导下，这个党团不仅没有能够靠自己团结一致为成功作出贡献，反而由于分裂使自己变得无能为力。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和感觉到这一点。因此，请您批准我在议会复会时就立即提出辞呈。

将军，请相信，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忠于您。

雅克·苏斯戴尔

1952年5月11日于里昂

10. 安德烈·弗朗索瓦-蓬塞在法兰西学院 讲话的摘要

……但是，从6月18日起，在拉芒什海峡^①彼岸响起了法兰西之声。它对停战的主张表示抗议；在以后的几天里，它又对没有正确的报道和阐明的停战条件表示抗议。它要说

① 即英吉利海峡。——译者

法国输掉了一场战役，但并没有输掉这场战争，因为这场战争是一场世界大战，明天将有巨大的力量投入进来，击败今天的胜利者。它断定，没有人能预见今天保持中立的各国人民明天是否仍然中立，德国的盟友是否始终会是它的盟友。法兰西之声向所有坚定的法国人发出响亮的召唤，号召他们继续斗争，让不应熄灭的抵抗斗争的火焰燃烧下去。

当时，戴高乐将军这一孤独的声音，很难被那些逃难的人听到。他宣布的脱离行动，被政府斥责为一种不守纪律的行为。然而，法国之所以能亲身参加扭转命运的行动，恢复自己在军事上的威望并以同等地位出席战胜国的各种会议，这就要归功于戴高乐将军有远见的号召，归功于他组织的运动和他发起的抵抗斗争。我们决不要忘记这一点。在莱茵河畔，我常常想到这一点，我理解那位想用盾牌保护法国的人的意图，但在我内心里却对那位举起了从我们手中掉下的剑的人表示敬意，正象我现在当着你们大家的面向他表示敬意一样。

.....

但是，由无数张陌生的面孔所组成的群众已经表态了。1944年4月在巴黎，5月在南锡、在里昂、在第戎，群众向贝当元帅欢呼；在他暗示有些羁绊在妨碍他时，群众报以掌声，借以表明他们没有误解他的意图和他的思想。三个月后，群众以狂热的喜悦和热情来欢迎无愧于解放者称号的戴高乐将军。难道要责备群众朝秦暮楚吗？我宁可认为这证明群众出自可能比理智更为可靠的民族本性深处的直觉，不愿意把他们两人对立起来，而是自觉与不自觉地把他们俩联系起来，他们以为盾牌曾经帮助他们等候到宝剑决定性的一击发出闪光的时刻。我觉得，群众这种自发的态度包含着我们应

当汲取的教益。

(载1953年1月24日《世界报》)

11. 戴高乐愿作法国的尼克劳斯·德·弗吕^①

两个月前，戴高乐将军举行了一次大型记者招待会。他刚动过手术，这使得他当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多数派中艰难起步时只能置身事外。当时，人们知道他将去黑非洲进行重要访问，在法兰西人民联盟为市政选举^②准备竞选人名单和联合竞选时，他将缺席。因此，他露面的时间极短。不过，他这次露面却引起了轰动。戴高乐在谈话中反对欧洲军队，表达了一个拥有武装的民族主义者的抗议。在他以前，还没有任何人如此强有力地、毫不妥协地维护过这种民族主义。然而，通过这次在讲坛上短暂的露面——在此之前他是隐居的，在此之后他又离开了——戴高乐还想说明另外一点：固然，他对他的那伙政客和政权之间的交易漠不关心的话，但他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自己作为法国人伟大顾问所起的作用。

上星期，他从非洲回来——据说还要到非洲去——就听到一个使很多戴派感到不安的传闻：有些人说戴高乐将军将放弃法兰西人民联盟的领导权。党的总书记立即辟谣。实际上，戴高乐不是放弃法兰西人民联盟，他早就同这个联盟疏远了，今后可能还要更疏远一些。现在既然戴高乐的议员们试图与政府进行合作——这是戴高乐批准的，但未得到戴高乐的赞同——戴高乐就不愿也不能每天再给他们下达前后

^① 将军亲笔加注：“此话不假。”

^② 4月16日的选举，使将军对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前途不再抱任何幻想。

矛盾的命令。再也不愿意玩弄策略，他又成为一个战略家了。

需要清静。——这种隐退的举动不足为奇。这不仅表明将军蔑视卑鄙的权术或他说过的“议会里的那些事”，而且表明一种毫不妥协的情绪，一种渴望强盛和绝对权力的情绪，可能还表明一种愤世嫉俗的情绪。从他走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天起，这些情绪就经常引导他隐居到他觉得应该隐居的地方，以图东山再起。经过反省和思考，他又回来了。他下达命令。然后，他仿佛在人群中逐渐产生了一种无法克制的厌恶情绪。于是，他又离去，独自一人思考，寻求对永恒的、理想的法兰西的看法。他在索尔费里诺街总部和科隆贝双教堂住所之间这样来来往往不知道有多少次了！

这种厌恶，这种对于离去的渴望，难道不正是他流亡伦敦的原因吗？或许，一开始就有可能组织并领导国内的抵抗运动。可是，戴高乐想到了这一点吗？他首先需要的是空气和空间。他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来对他本人的情况，对他拒绝参政，对他的伟大计划，对这个令他生厌的屈膝投降的国家进行思考。

战争停止了，德国人退走了。戴高乐重返法国接受由他首先宣布的解放的战果，接受被他吸引过去的人民的欢迎。他又置身于人群之中，但不再是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而是群众的领袖了。对他来说，一切都可能实现，他管理国家，但他却受到共产党人和他用军车带回来的那些阴谋家的折磨。他觉察到这一点。于是，他辞职了。

这是1946年1月。他对操劳政务和妥协感到憎恶。他觉得他的伟大形象逊色了，他的纯洁受到了玷污。他再次引退。他沉默不语，时间达五个月之久。

错过机会——但是，沉默并没有持续下去。戴高乐知道有一群拥护者追随他。他在担任政府首脑时失败了，但他可以在担任人民的领袖、国家的领袖时取得成功。6月16日，他在贝叶又讲话了。他批评了第三共和国的政体，并为一种赋予国家元首以重大权力的体制辩护。由于制宪会议向法国人建议实行一种新的议会制度，他于9月份在厄比纳尔又发表了一次讲话，敦促法国人拒绝接受人们向他们建议的宪法。但是，这部宪法被通过了。戴高乐自以为是法国的最高顾问，而法国并没有听取他的意见。最后，他于1947年4月在斯特拉斯堡讲话，宣布成立联盟，该联盟面向所有法国人，超越各个政党。几个月后，法兰西人民联盟在十月市政选举中取得了辉煌胜利：这是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

从此，较量开始了。法兰西人民联盟想把仰慕戴高乐将军的人组织起来，而不问他们属于哪个政党。但是，它未能成功。人民共和运动和社会党禁止他们的党员参加联盟。在对猛烈抨击各党各派的同时，法兰西人民联盟本身也有变成一个政党的趋势。它在同其他政党平等地参加1951年的选举时，完成了这一演变。戴高乐之所以同意在议会中有一个与其他党团同时存在的法兰西人民联盟党团，是因为他希望得到多数。可是他没有得到。不久，党员（他们是革命者，至少是反对派）和议员们（他们对始终同共产党人对立感到厌倦）之间发生了冲突。这指的是，1952年3月，三十多名议员造了反，他们不顾向他们下达的命令，投了比内先生的票。7月，这种造反行为发展成叛离：法兰西人民联盟党团的成员减少到八十人左右。最后，当发生最近那次危机时，戴高乐让他的党团参加多数派，与“魔鬼”合作。他吃尽了议会制的苦头。他又引退了，很多人离开了他。不几年功

夫，这个解放时受到热烈欢呼的人，使一大群仰慕者泄了气，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共产党人、温和派、抵抗战士和法奸。

因此，他现在又是孤家寡人了。人们不知道他同他自己创建的组织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或许他将把联盟的行政领导委托给别人——可能委托给他兄弟——而他自己则成为他的信徒的某种精神领袖。

梦想扮演伟大角色——有一种摆幅运动把戴高乐推向众人，然后又把他拉出来；一股涨潮把他推向行动，一股落潮又使他退出来。现在，戴高乐处于退潮时期。一直到什么时候？不清楚，他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在群众中的行动没使他获得成功。解放时他作为胜利者受到欢呼，但他没有象演说家那样善于利用人民的爱戴。对那些人来说，只有人民才算数。只要人民支持他们，他们走向人民，投靠人民。戴高乐性情孤僻，不是演说家。对他说来，人民历来不如法国重要，支撑他的是他对本身使命的想法。但是，这并不足以管理一个国家，他也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戴高乐想在20世纪的法国，做一个15世纪时瑞士的尼克劳斯·冯·德尔·弗吕。这是人们在国家处于生死关头时向之求救的一个隐士。他来到众人之中，使人们重新和好，给他们指出正确的道路。然后，他又隐居如初。但是，尼克劳斯并不看重权力，他选择了静思的道路。迄今为止，戴高乐将军的悲剧就在于不善于选择。

弗朗克·布里代尔

（载1953年4月23日《洛桑日报》）

12. 蓬高乐将军1953年5月6日的声明

国家由于缺乏领导而重新陷入昔日的分裂局面。分裂使

国家衰落了，使国家瘫痪了。除了与法国保持分离的共产党人以外，左派还有行动的愿望，但它只接受软弱而不可靠的国家；右派没有完全忘记传统，但它不相信人民。左派和右派都不能治国。他们装出共同治国的样子时，只是为了互相抵消力量。

1940年的灾难，就是这种政治上软弱无能的后果。在面对敌人和各政党自暴自弃的情况下，我从零开始，实现了团结并主持了工作。这样，法国才得到了胜利，避免了内战，恢复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这样，法兰西联邦才得以建立。这样，才得以在政治、社会和家庭等方面完成了改革，使人类的命运更加名副其实、更有保障。

可是，一旦危险过去，各个政党就重新露头了。一切又成了问题。为了使法国能对付可怕的未来，必须有一个公正而强大的国家。我曾经提出这个国家的体制。但是，当时占优势的左派本性难移。它转而反对我，促使我引退，恢复了以前的体制，以致使其弊病变本加厉。可惜，法国在自己混乱的国家事务中为这一政党的胜利付出了代价。至于左派，它成了自己重新造成的权限混乱状况的受害者，因而墨守成规。

然而，不可靠的国家阻碍了我们的复兴，因此出现了新的危险。国外和国内都有共产主义的威胁了。于是，我号召法国人民再次团结起来。开始时，确实有过一个团结的局面。右派，不论是传统派、世俗派还是经济派，首先在其中占了一大部分。后来，危险似乎减少了。由于成立了联盟，共产党人后退了。另一方面，美国人带来了马歇尔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造成了某种安全感。于是，右派感到放心后，也转而反对我了。他们反对我采取社会行动的决心，而且

受到把持金融界和新闻界的后台老板、不知悔改的维希分子和外国机构的影响。作为交换，政府把权力交给了右派。但是，由于本身的分裂和人民的不信任，右派在政府里一事无成，今后也将无所作为。

因此，我自战争时期起在坚定的法国人的支持下为我国实现团结、为我国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国家政权的努力，至今未获成果。我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一点。应该担心的是，这是对法国不利的。大家都了解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我国政治交易舞台上的可悲表演。法国人，包括那些出于习惯、激情或私利而反对我进行尝试，并以指责和辱骂来掩盖自己懊悔的人，对此都有感觉。事实也证实了这一点：预算上的悲剧、经济萧条、社会不公正、北非动乱、在印度支那的挫折、国家麻木不仁、当权者杂乱无章（当权者把自己无法负责的残存的主权出卖给外国）。各政党在市政选举中的胜利引起法国在各个领域里倒退，这已成为特征。

既然如此，联盟又能怎么办呢？固然它现在失去了各政党的帮助和全体支持者的选票，但事实上仍然是一个积极的、有坚定信念的工具。首先，它应脱离这个毫无政绩而且目前又不能加以改组的政权。在今后的一个阶段中，作为联盟，它在竞选方面没有什么需要采取的总体行动。总的说来，这种选举只能、也只有给联盟本身和国家带来失望。联盟的成员可以合法地参加这种或那种选举，但他们将以个人名义参加，而绝不代表联盟。在议会中，联盟也不再以一个整体的资格参加一系列的组合、进行政治交易、参加信任投票和授权等活动，这都是现行制度中赌博、逗乐等令人讨厌的事。当然，那些身为现任议员而不能逃避这些伎俩联盟成员，他们本人应该与运动保持联系，但在有新的命令下达

前，他们在政权范围内可以做他们必须做的事情，不过要由他们自己负责，而对联盟则没有约束力。

相反，联盟从选举和议会的死胡同中走出来以后，便组织起来并向全国扩展，以完成自己的使命，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引起公众的注意。联盟的使命，当然不是为了一些政党为挽救自己而组成的某种联盟打先锋，而是为了改变这种不好的政体，并在社会和全国实现人民的联合打先锋。这种联合的时机，将来在发生了深刻变化的条件和气氛下征求民意的时候就会到来。它也可能在舆论感到焦虑不安，从而猛然醒悟，促使法国人团结起来，促使政权进行改革的时候到来。但是，遗憾的是这种时机也可能会表现为严重的动荡，那时，拯救祖国和拯救国家政权，将再次成为至高无上的法律。

幻想快要破灭了。必须做好行动的准备。

附 件

第四共和国的历史背景

战争结束后，戴高乐将军的临时政府立即通过法令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煤矿、空运、雷诺工厂、电力与煤气生产、大型保险公司和几家储蓄银行实行国有化，恢复了工会的活动自由，在超过百人的企业中建立企业委员会，普遍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险，建立负责规划国家在经济现代化和领导经济方面行动的计划署。

1945年10月21日进行大选时，法国男女公民（女公民是第一次参加）在选举众议员的同时，必须回答两个问题：1. 议会将是制宪议会吗（赞成票占96%）？2. 是否赞同根据提出的章程草案来限制议会的权力（赞成票占62.8%）？就众议员席位而言，共产党获158席，成为法国的第一大党；人民共和运动获152席，工人国际法国支部^①获23.4%的选票，保持了原有的地位；激进派和各温和派都垮台了。戴高乐将军轻而易举地保持了政府首脑的职务，但在部长名额分配上，议会进行了激烈的交易，结果戴高乐将军对议会企图控制其行动感到厌烦和不满，遂于1946年1月20日辞职。

对于所有政党来说，现在应当证明法国可以不要戴高乐

^① 即法国社会党。——译者

将军了。国民议会要用社会党人费利克斯·古安来接替戴高乐。它在四月份通过了一项宪法草案，授与这个唯一的议会以全权，而共和国总统只是一个配角。戴高乐将军公开谴责的这一宪法草案提交公民投票时，在表明态度的选票中，53%表示了拒绝。议会不得不退却。6月2日，选举了另一个议会，其中人民共和运动的席位大大超过共产党的席位。政府的领导职务又回到了人民共和运动的首领乔治·皮杜尔手中。重新修改了宪法草案，规定设立第二个议会，即共和国参议院，按照复杂的两级选举制确定320名议员，任期六年。共和国总统任期七年，重新获得1875年授与总统的大部分特权，只是没有解散议会的权力。解散议会的权力属于内阁会议，但由于所规定的条件太多而基本上无法行使。

10月13日，宪法以53%的赞成票通过，弃权票达32.4%。政府的不稳定性几乎已载入宪法之中。从1946年12月至1958年5月，先后共有二十四届政府。内阁危机接踵而来，如同可笑的“皮影戏”（戴高乐语）。

在1946年11月选出的第一届国民议会中，共产党人数最多，其次就是人民共和运动。社会党介乎两者之间，处于仲裁人的地位。第四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樊尚·奥里奥尔和政府总理保尔·拉马迪埃都是从社会党挑选出来的。拉马迪埃组成了由人民共和运动、社会党和共产党三大党参加的政府。从1947年5月初起，共产党人就在关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辩论中反对政府，拉马迪埃便把他们逐出了政府。

共产党成为反对派之后，发动了一连串的罢工，使各公用事业部门相继处于瘫痪状态。属于社会党的工会会员反对为政治目的使用罢工权，便退出了法国总工会，另组法国工人力量总工会，与其分庭抗礼。

与此同时，戴高乐将军重新露面，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政治演说。1947年4月7日，为了进行国家改革，他在斯特拉斯堡宣布建立法兰西人民联盟。在（1947年10月的）市政选举中，法兰西人民联盟获得了40%的选票。

在反对派左右夹攻下，历届政府都试图依靠第三势力。它们想把人民共和运动、社会党和敌视戴高乐将军的保守派联合起来组成这种第三势力。1951年的国民议会选举，使法兰西人民联盟、人民共和运动、共产党、社会党、激进派、独立人士在议会中获得的席位大致相等。脆弱的联合政府导致中右或激进派的人士掌权，社会党人仍然是反对派。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议员终于也接受了一些部长职位；而戴高乐将军表示反对并宣布他将制止法兰西人民联盟的这种企图。与此同时，皮埃尔·布热德建立了一个组织，吸收了那些由于经济发展而受到威胁的小商贩和手工业者。

1956年1月2日，选举了第四共和国的最后一届国民议会。布热德的组织获得12.5%的选票，夺取了人民共和运动和社会共和派（其前身为法兰西人民联盟）的席位。社会党总书记居伊·摩勒负责组阁。他在任仅16个月，在他之后，局势右转，终于导致弗林姆兰上台。1958年5月，正是在他主持之下结束了第四共和国政府。

对欧政策 法国为复兴经济获得了马歇尔计划的贷款，因此必须追随美国人的反共政策。1949年4月，法国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与10个欧洲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共同组织防务。为了使欧洲不致沦为美国的不折不扣的保护国，“欧洲必须组织起来。1949年5月成立了欧洲委员会，后来又在斯特拉斯堡成立了毫无权力的影子议会。在让·莫内的启发下，

罗贝尔·舒曼创建了欧洲煤钢联营，并为法德和解做好了准备，这对于重建欧洲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英国拒绝加入这一联营。

陷入朝鲜战争泥潭的美国，试图重新武装德国。法国反对组成独立的德国军队的主张，建议成立欧洲防务集团。1952年5月27日，在巴黎就此问题签署了一项条约。由于共产党和戴派联合反对，国民议会未能批准这一条约。除了人民共和运动以外，其他党派内部意见分歧。1954年8月30日，经过程序性表决，欧洲防务集团被否决。

印度支那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印度支那曾被日本控制，抗法民族主义运动应运而生。戴高乐将军派勒克莱尔将军与主要民族主义运动——越盟——信仰共产主义的领袖胡志明进行谈判。胡志明来到法国，但未能获得他所期望的让步。

对海防市的狂轰滥炸和作为报复对河内市法国人进行的大屠杀，点燃了战火，战争已不可避免。苏联和共产党中国支持越盟。生活在法国本土的法国人，对这场遥远的战争很不理解，也不支持军事上的努力，因而这方面的努力很快就失败了。1954年5月7日，奠边府战役的惨败造成心理上的创伤：法国的一个重要阵地被越盟包围后丧失了。大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讨论亚洲问题。孟戴斯·弗朗斯出席了会议并签署了一项协议，使法国得以从印度支那彻底脱身，并把援助南越反抗共产主义的责任交给美国。

在这场战争中，法国损失了92,000人和30亿法郎。这场战争对内政的影响是，政府信誉扫地，党派分裂。

北非 整个法国舆论认为，阿尔及利亚应当象过去一样，仍然是法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1947年9月1日，根据一项组织条例成立了阿尔及利亚议会，由同等人数的法国人和穆斯林组成，议会拥有财政权力。在突尼斯和摩洛哥，保护国的地位本来可以使它们取得独立。但是，不继续控制这两个邻国，又怎能维护阿尔及利亚的安全呢？几经周折，摩洛哥和突尼斯直到1956年3月才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获得独立。与此同时，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力量进一步加强了。1954年11月1日，民族主义者在君士坦丁地区发动公开起义。历届法国政府都受到阿尔及利亚法侨和军队干部的双重压力。阿尔及利亚法侨要求得到保护，军队干部要求为在印度支那遭到的屈辱雪耻。居伊·摩勒同意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谈判的原则，但要先停火，后谈判。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则要求法国先承认其独立。较量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大事记

1946年

- 1 月20日 戴高乐将军辞职。
- 1 月26日 费利克斯·古安组阁。
- 2 月21日 恢复每周四十小时工作制。
- 3 月 6日 圣特尼先生和胡志明达成关于承认越南为自由国家的协议。
- 4 月 3日 人民共和运动宣布反对宪法。
- 4 月 8日 电力公司、煤气公司和信贷机构国有化。
- 4 月19日 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通过一项实行议会制的宪法草案。

- 4 月 25 日 保险公司国有化。
- 5 月 5 日 公民投票；法国人否决宪法。
- 6 月 2 日 议会选举。
- 6 月 14 日 樊尚·奥里奥尔任制宪议会主席。
- 6 月 16 日 戴高乐将军在贝叶发表演说。
- 6 月 24 日 乔治·皮杜尔政府组成。
- 7 月 4—22 日 在罗瓦雅尔宫召开工资和物价会议。
- 7 月 29 日 在巴黎举行国际会议。
- 8 月 27 日 戴高乐将军抨击宪法草案。
- 8 月 29 日 社会党代表大会；居伊·摩勒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
- 9 月 29 日 制宪议会通过宪法草案。
- 9 月 30 日 戴高乐将军在埃皮纳尔发表演说。
- 10 月 13 日 公民投票通过宪法。
- 11 月 10 日 议会选举。
- 11 月 23 日 轰炸海防市。
- 11 月 28 日 皮杜尔政府辞职。
- 12 月 3 日 樊尚·奥里奥尔任国民议会议长。
- 12 月 16 日 莱昂·勃鲁姆政府组成。
- 12 月 20 日 东京湾暴动。

1947 年

- 1 月 16 日 樊尚·奥里奥尔当选共和国总统。
- 1 月 17 日 拉马迪埃政府组成。
- 1 月 21 日 爱德华·赫里欧任国民议会议长。
- 3 月 18 日 莫内维尔任共和国参议院议长。
- 3 月 30 日 戴高乐将军在布律内瓦尔发表演说。
- 3 月 31 日 拉马迪埃和戴高乐会晤。

- 4 月 7日 法兰西人民联盟成立。
- 4 月25日 雷诺工厂举行罢工。
- 5 月 4日 罢免共产党人部长。
- 5 月10日 国际银行提供2.5亿美元贷款。
- 6 月23日 雪铁龙汽车制造厂和加莱海峡省矿区举行罢工。
- 6 月24日 法国国营铁路公司、法兰西电力公司和公用事业部门举行罢工。
- 7 月11日 内阁会议通过一项有关阿尔及利亚地位的方案。
- 7 月27日 戴高乐将军在雷恩发表演说。
- 9 月 外省举行罢工。
- 10月14日 巴黎运输部门举行罢工。
- 10月26日 戴派在市政选举中获胜。
- 10月30日 对拉马迪埃政府投信任票。
- 11月14日 马赛发生严重骚乱。码头工人罢工。
- 11月17日 马赛举行总罢工，北部矿区举行罢工。
- 11月18日 巴黎冶金业举行罢工。
- 11月19日 拉马迪埃政府辞职。
- 11月22日 授权罗贝尔·舒曼组阁。
- 11月23日 许多工业部门举行罢工。
- 11月28日 勒克莱尔将军猝然逝世。

1948年

- 1 月25日 法郎贬值。
- 4 月 3日 最后通过马歇尔计划。
- 4 月16日 法兰西人民联盟在马赛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

- 5 月 22 日 政府公报刊登“波安索—夏普伊法令”，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认为此法令损害了政教分离原则。
- 6 月 10 日 戴高乐将军就伦敦协定发表声明。
- 6 月 17 日 国民议会批准法英协定，但提出许多保留意见。
- 7 月 19 日 罗贝尔·舒曼辞职。
- 7 月 24 日 安德烈·马里政府组成。
- 8 月 27 日 安德烈·马里辞职。
- 8 月 31 日 罗贝尔·舒曼组阁。
- 9 月 3 日 罗贝尔·舒曼组阁失败。
- 9 月 8 日 授权亨利·克耶组阁。
- 9 月 18 日 戴高乐将军访问格勒诺布尔时发生事端。
- 10 月 4 日 矿区举行罢工。
- 10 月 5 日 公用事业部门工作人员举行罢工。
- 10 月 17 日 法郎贬值。

1949 年

- 2 月 3 日 加比唐在议会上就圣拉普和勃里斯事件以及安德烈·马里的职责提出质询。
- 2 月 13 日 掌玺大臣安德烈·马里辞职，由 R·勒古接替。
- 3 月 8 日 法越协定签字。
- 3 月 20 日 第一轮区级选举。
- 3 月 27 日 第二轮区级选举。
- 4 月 20 日 和平大会在巴黎开幕。
- 7 月 6 日 国民议会通过关于取消法院的法律草案。

- 7月16日 内阁会议同意参加北大西洋公约。
7月26日 批准北大西洋公约。
10月6日 亨利·克耶辞职。
10月27日 授权乔治·皮杜尔组阁。

1950年

- 2月19日 社会党人退出皮杜尔政府。
3月30日 莱翁·勃鲁姆逝世。
5月9日 舒曼提出有关煤钢联营计划的建议。
6月24日 乔治·皮杜尔辞职。
7月11日 授权勒内·普利文组阁。
10月24日 欧洲军队计划。
11月28日 樊尚·奥里奥尔拒绝普利文辞职。

1951年

- 2月28日 普利文政府辞职。
3月9日 授权亨利·克耶组阁。
3月19日 签署舒曼计划。
4月27日 选举法草案在国民议会表决，未超过半数票。
4月28日 提出新选举法草案。
5月7日 国民议会最后通过选举法草案。
6月17日 议会选举。
7月10日 克耶政府辞职。
7月23日 贝当元帅逝世。
8月8日 授权普利文组阁。
12月13日 国民议会批准舒曼计划。

1952年

- 1 月 7日 普利文辞职。
- 1 月18日 授权爱德加·富尔组阁。
- 2 月29日 爱德加·富尔政府倒台。
- 3 月 6日 由于法兰西人民联盟议会党团27名成员反对“最坏政策”，安托万·比内受权组阁。
- 4 月28日 指定李奇微将军接替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欧洲盟军司令职务。
- 5 月26日 比内政府开始发行公债。
- 5 月27日 建立欧洲防务集团的条约在巴黎签字。
- 7 月 5日 法兰西人民联盟议会党团分裂。
- 7 月 8日 戴派分裂分子组成共和与社会行动小组。
- 12月23日 比内政府辞职。

1953年

- 1 月 7日 授权勒内·梅耶组阁。
- 1 月12日 开始审理奥拉多尔絮格兰案件。
- 2 月19日 赦免阿尔萨斯罪犯。
- 5 月 6日 戴高乐将军让法兰西人民联盟国会议员自由行动。
- 5 月21日 勒内·梅耶政府倒台。
- 6 月26日 授权约瑟夫·拉尼埃组阁。
- 7 月 2日 皮阿斯特走私案调查委员会成立。

① 埃及、黎巴嫩、苏丹、叙利亚等国的货币单位。——译者

- 8 月 4日 总罢工。
- 8 月20日 废黜摩洛哥苏丹。
- 8 月26日 全面复工。
- 11月27日 国民议会就欧洲军队问题举行辩论。
- 12月 4日 西方三国百慕大会议。
- 12月17日 为选举共和国总统在凡尔赛召开大会。
- 12月23日 勒内·科蒂当选。

1954年

- 3 月31日 朱安元帅公开表示反对欧洲防务集团。
- 4 月29日 法国给予越南完全独立。
- 5 月 7日 奠边府失陷。
- 6 月12日 约瑟夫·拉尼埃辞职。
- 6 月18日 授权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组阁。
- 7 月21日 关于印度支那停战的日内瓦协议签字。
- 8 月30日 拒绝批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
- 10月12日 对伦敦协定投信任票。
- 11月 1日 标志阿尔及利亚叛乱开始的一系列谋杀案。

1955年

- 1 月 5日 政府宣布恢复市区投票制度。
- 1 月26日 雅克·苏斯戴尔出任阿尔及利亚总督。
- 2 月 5日 孟戴斯·弗朗斯下台。
- 2 月23日 授权爱德加·富尔组阁。
- 3 月27日 批准巴黎协定。
- 4 月 2日 就阿尔及利亚紧急状态举行投票。

- 4月23日—6月30日 发布一些经济和社会法令。
- 8月20日 韦德泽姆大屠杀。
- 10月6日 戴派部长辞职。
- 10月31日 有关改革选举法的辩论开始。
- 11月6日 关于摩洛哥独立的塞勒—圣—克鲁协定。
- 11月29日 爱德加·富尔下台。
- 12月2日 解散国民议会。
- 12月8日 共和阵线组成。

第三部分 1968年5月

我不知道生活是否会让我有时间和兴致来写我的回忆录。但是，有一些插曲是我认为需要加以说明的，哪怕仅仅是为了恢复事实真相，因为这些事实由于凭空想象和无稽之谈而受到了歪曲。

这里指的是1968年5月事件以及随后出现的情况，直至顾夫·德姆维尔政府的成立。我的叙述既不能说是恢复事实真相，也不能说是从中引出结论。我只限于把我所见所闻的主要事情说出来。

首先要承认，我未曾预料到要发生这些事情。法国总的形势本来是好的。由于1963年的稳定计划以及在我看来计划实施期延续过长，国内经济发展缓慢。在这之后，米歇尔·德勃雷在我同意之下采取的、起初也许使他自己有些担惊受怕的行动已见成效，经济复苏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的物价水准使得对外贸易困难重重，因为1958年贬值所给予我们的余地已基本消失。然而，戴高乐将军的威望、法国政权惊人的稳定以及我国明显的发展，使法郎成为一种无可争议的货币，我们的外汇储备量说明了这一点。社会气氛是安宁的。只剩下大学了。有一天，我在电视上发表了一次讲话，认为国民教育部取得了最大的成就。人们对我的讲话大加讽刺，对这一点我是理解的。说实话，当时我只想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主要的一个方面：几年之内，在中学和大学就读

的学生需要大量增加。在高等教育方面，我的政府把接收学生的能力翻了一番，也就是说，我们修建的高等学府比几个世纪以来留给我们的还要多。无论从绝对数值还是从相对数值来看，教育预算增加很多，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不过，这显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恰恰相反，尤其是在巴黎，大学的发展却产生了新的问题。因为十五万多年轻人集中到一起，食宿费用很低，学习无甚压力，为进行种种冒险活动提供了方便。加之，教育改革尚未进行。我是坚定拥护进行一场深刻革新的。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中学的人数增加了九倍。大学则高度僵化，不能满足经济的需要和青年的要求。广播和电视的影响、家规的松弛、平均年龄上升（如按业士学位获得者的年龄计算），都再也不能使我们停留在墨守成规的旧教学方法以及强制实行的严格纪律和糟糕的考试方法上。在这些方面，我有很多想法，有的在其他场合^①也曾经谈到过，但我既没有时间，又没有可能由我自己制定改革方案。克里斯蒂昂·富歇先生提出的方案，我同意了，但这仅仅是很局部的改革，然而，从某些方面来看，不但没有提出解决方案，而且还把习以为常的做法搅乱了。佩雷菲特先生准备的改革方案没有提出来。他想争取时间，等到假期再说，在一些问题上，他还遭到了戴高乐将军的反对。此时此刻，在这个方面，将军是严格的保守主义者。我充其量也只是力图起一点推动作用，不会有多大的成功，哪怕只是因为所有的教师组织都一致表示反对。这些组织潜伏在格勒纳尔大街的楼房里，它们控制着大、中、小学教师的工作。我意识到这一切，便不顾外交部的正当要求，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

^① 参阅在教师学衔获得者联合会上的讲话。见《有关文件汇编》1。

多芬娜广场的原址分配给国民教育部。我想，把教育部迁到新的、合适的地方，使教育部长得以把本部的工作重新抓起来，并且避免工会擅自占房。在埃德加·富尔先生后来采取的全部措施中，使我最感到遗憾的莫过于放弃这次搬迁，并用哗众取宠的言词（要大学，不要办公楼！）来掩盖他对工会的投降行为，也可能是为了掩盖他想在办公楼和宿舍之间保持一段距离的愿望。至少这是他告诉我的理由。最后，我没有估计到大学动乱可能产生的严重后果，但已预感到一些征兆。因此，我把我在1964年草拟的一份通知的手稿找了出来。我在通知中宣布禁止在农泰尔为解决当地学生住宿问题修建一个“宿舍区”。教育部长瞒着我，继续我行我素。众所周知，在农泰尔的那个宿舍区住着科恩一本迪和他的同伙，那里成了骚乱的主要策源地。

尽管如此，我并没有预见到后来发生的事件，更没有预见到这些事件的严重性。而且，我毫无顾虑地前往伊朗和阿富汗进行正式访问。我还要顺便提一下，很多记者和反对派把这次访问说得象散步一样的轻松愉快，实际上是令人疲惫不堪，而且毫无成效。不过，从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来说，这类访问还是必不可少的，而且我作为总理也不得不去访问，正如后来我作为国家元首也不得不外出访问一样。

现在，再回过头来谈一谈1968年5月事件。事件开始发生时，我正准备离开伊朗前往阿富汗。当时我犹豫了一阵。是否应当中断我的旅行呢？这样的决定是严重的，因为在有关国家看来，提出的理由总有点象是一种托词。毕竟戴高乐将军还在巴黎，如果他认为有必要的话，他是会召我回国的。因此，我便出发前往喀布尔。

从那以后，我们同巴黎只是断断续续地有些联系。但是，

我已开始惴惴不安，而且从我办公室来的电话也没有任何使我安心的消息。然而，就在我将要离开喀布尔去阿富汗北部的时候，我获悉佩雷菲特在议会宣布他将重新开放巴黎大学。我从中得出了结论：“事情应付过去了。”以后，我们再未得到任何消息。此外，由于气候的缘故，我们不能乘飞机返回喀布尔，只好取道沿兴都库什山的山路，并取消了我为阿富汗总理举行的晚宴。到达法国使馆时已经很晚了。人们告诉我，若贝尔让我马上给他去电话。

我记不清当时喀布尔确切是几点钟，但巴黎时间大概是下午六时。这一天是5月10日，星期五。若贝尔告诉我，巴黎大学没有重新开放（将军反对），他预计晚上会发生严重事件。他请我火速回国，因为他认为要分秒必争，而且认为可能、甚至很有可能出现最坏的情况。他还要我考虑我回国后要做的的事情。

我马上就明白了，在巴黎，人们举棋不定。可能将军并没有理解发生的事件。代总理若克斯、内政部长富歇和国民教育部长佩雷菲特在对立的决定之间踌躇不决。就我而言，我仿佛十分清晰地看到了必由之路。我让若贝尔了解，一俟返回国内，我将重新开放巴黎大学，并竭力安抚人心。我猜想，这正是他的意见。

星期六清早我就出发返回巴黎。人们缩短了欢送仪式的时间，并指示“快帆”式飞机尽可能争取时间。夜间在拉丁区发生事件的消息令人惊愕。除了发生暴力冲突之外，在通过无线电话同科恩一本迪的谈判中，政府和有关当局出了丑。星期一举行总罢工的命令已经下达了。我在飞机上起草了一篇讲话，准备一回国便在电视上发表。

在奥利机场迎接我的部长们个个愁眉苦脸。我立即让新

闻界知道，我有“我的主意”。我直接前往马提翁大厦，召见了若克斯、富歇和佩雷菲特。我征求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刚刚开始讲话，我就再也忍不住了。“请原谅我，”我对他们说，“但是，我的主意已经拿定了。”我对他们讲了我想在当天晚上宣布的事。

他们表示同意，与其说是赞同，不如说是由于不堪重负，其中也有克里斯蒂昂·富歇。当富歇发表他自己对事件的叙述时，我不得不提醒他注意我的主张。唯一有所保留的是佩雷菲特。在我看来，他所以如此，并非出于信念，而是不愿放弃己见。此外，大家都认为，将军将不会同意我的立场，而且告诉我，星期四将军拒绝接受佩雷菲特的意见，乃是灾祸的根源。

尽管如此，我仍然毫不拖延地前往爱丽舍宫。特里科^①见到我时告诉我，将军“变了”。事实上，我同将军的谈话很简短。总统立刻同意了我的安排。不久，我便在电视发表了众所周知的那次讲话^②。

在一段时间内，人们可以认为我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一些造反的学生领袖发表了令人宽慰的声明。各工会组织一方面说取消罢工和游行为时已晚，另一方面却也不那么激烈了。就在星期一那天，似乎只是一般地执行了罢工的命令。但由于下午从巴黎北站到当费尔—罗施罗广场的游行，一切又都乱了。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庞大队伍（资产阶级至少同工人阶级一样多），向巴黎挺进。当然，维持秩序的警察十分谨慎，尽管在当费尔广场发生了一起偶然事件，但他

① 即贝尔纳·特里科，1967年7月至1969年4月任国务秘书、总统府秘书长。

②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3。

们仍然使冲突得以避免。最后，游行队伍解散了，只有几百名年轻人还留在那里，他们把游行变成了露天赈济游艺会，一直扩展到战神广场。但是，事情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了：在示威者喊出的所有口号中，最为意味深长的是：“十年了，够了。”此后，斗争进入了政治领域。从那时起，人人都在准备进行一场艰苦的斗争。

有些人，如佩雷菲特先生^①或雷蒙·阿隆，认为我重新开放巴黎大学并释放被捕学生是软弱的表现，导致了骚乱再起。我简单地回答道：假使在5月13日，星期一，巴黎大学仍然在警察保护下处于关闭状态，那么谁又能想到这群涌向当费尔—罗施罗广场的人不会象河水泛滥一样一路扫荡过去，冲入巴黎大学呢？我宁愿把巴黎大学交给学生，而不愿看到他们用暴力去夺取。

再者，我是这样看待形势的：既有大学问题，也有政治问题。当然，学生的头目是比较严肃的革命派，他们想进行一次政治行动。但是，事实上学生的团结之所以起作用，还有别的原因，大学、国家和社会对此都有一份责任。因此，我认为处理青年问题需要高瞻远瞩，从个人的体会中，我觉得还要有谅解精神。这就是我5月14日在国民议会中发表的讲话的精神^②。我把政治问题搁在一边，认为这个问题应在表决已经宣布的不信任案时得到解决。我认为可以说我的讲话受到了热烈欢迎，甚至受到了反对派的欢迎。

接着是对不信任案进行表决。我记不起是在星期四还是在星期五交付表决的。尽管如此，气氛还是有利的，我关心

① 从5月13日起，佩雷菲特先生辞职了。5月30日，他向乔治·蓬皮杜表示了忠诚（参阅《有关文件汇编》4、11）。

②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5。

的是尽快进行辩论。我的错误则在于对杜阿梅尔先生的坚决要求作出了让步。他要求我把辩论推迟到下一个星期二，好让他争取他的党团小组^①投弃权票。他本来是真心诚意的。但是，到了那一天，“进步与现代民主”党团小组的成员几乎仍都投了不信任票，其中包括杜阿梅尔先生，甚至还有丰塔内先生，这也是实情。在通常持反对立场的反对派中，只有普利文先生一人在这一天表明他在国家和街头之间选择了国家。

在此期间，问题事实上早就转移了，而不信任案的失败则完成了这一转移。如同往常一样，在灾难的时刻，波旁宫^②只起到皮影戏剧院的作用，几个小角色在那里起劲地拼凑内阁，而且都是以搞垮我的政府为基点，行动则在外面进行。

学生的骚乱还在继续，但已开始使舆论感到厌烦。

还有总罢工，这可以说是强加给工会的，尤其是强加给法国总工会的。总罢工使全国处于瘫痪状态，但一无所获。

最后，确切地说，还有政治行动，即密特朗、孟戴斯·弗朗斯等一些领袖的阴谋诡计，他们力图利用形势，并取得外部的支持。

面对这三重危险，我的策略很简单。首先，我想争取时间。只有在舆论（主要是巴黎的舆论）突然大力煽动反戴高乐主义的情况下（过去，如1953—1954年期间，舆论曾多次企图反对戴高乐主义），危机才会变得如此严重。街道的混乱、巴黎大学或是奥德翁剧场上演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表演、经济的瘫痪，这种局面早晚总会走向反面。外省早已流露出

^① 雅克·杜阿梅尔当时担任“进步与现代民主”党团小组主席。

^② 法国国民议会所在地。——译者

厌倦和愤怒的情绪了。因此，要争取时间，要避免和学生发生悲剧事件（法国不会同意杀害年轻人，我本人对这种想法也不能忍受），这样，政治阴谋就都会遭到失败，令人耻笑。余下的还有一个有组织、有能力，试图夺权的重要对手：共产党。目前，它尚持谨慎态度。所以，我应当设法使它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我将在工会的阵地上和它相遇。

因此，我开始了会谈。会谈是5月25日在格勒纳尔大街劳动部举行的。

在此期间，我们在5月24日^①（星期五）经历了最后一个动乱之夜。大学生们，更确切地说是那些最狂热的分子，其中还有全体年轻的革命派、托洛茨基分子、毛派分子等，他们在里昂车站组织了一次示威游行。我命令堵住所有的桥，阻止他们向拉丁区进军。我希望他们向西分散，因为他们会在那里分成不起什么作用的小突击队采取行动后消散，同时还因为他们会使第十六区的资产者感到恐慌。起初，就是这样进展的，后来在交易所发生了一场小火灾。但是，博沃广场或警察当局显然害怕了：为爱丽舍宫担心，为富人担心。仿佛是出于偶然，桥梁都无军队把守，示威者涌向拉丁区，又一次筑起了街垒。我整夜守着电话，直接同警察局联系，以便采取审慎有力的措施。应当说，共和国治安部队和宪兵的表现是无可指摘的。尽管他们遭到了猛烈的进攻，但无一人死亡。到了清晨，所有的街垒都拆除了。当时的情景令人忧伤，但这显然是最后一击。大家都厌倦了。

星期六下午，我同专业组织和工会组织在一起开会。这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7。

些会议一直持续到星期一早晨8时，只是在星期六的深夜才停了很短一段时间。应该说，这些会议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严肃认真、令人鼓舞。除劳工民主联盟外，几乎没有什么哗众取宠的言辞。星期一凌晨，我觉得该是作出结论的时候了。只有劳工民主联盟还想再开一次会议，继续进行辩论。不过，这种态度显然是同下午要召开的夏莱蒂政治会议的消息有关。准备分享权力的密特朗先生和孟戴斯·弗朗斯先生将出席这次会议。总工会反对这种做法，但很不得力。我利用会议休息时间，先后同塞居伊先生^①，德尚先生^②和贝热龙先生^③进行单独会谈，以便同总工会达成协议。在消除歧视、将社会保险条例提交议会以及略微减少医药费自理部分等问题上，塞居伊先生表示了同意。在会上每个人都明白，牌已经打完了^④。塞居伊先生说，这是“一项成果丰硕的协议”。我也就可以在电视镜头面前向全国宣布这一协议。这几个星期，法国经常看到我，这回它应该感到松口气了吧！

我回到马提翁大厦后休息了两小时，因为我相信自己打赢了，并且是以最小的代价打赢的。

可是，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到了中午，当我回到办公室时，有人告诉我，总工会的领导人在雷诺汽车公司遭到失败，协议被基层组织拒绝了。事实上，总工会的领导人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权威，因而忽视了“在内部统一思想”。左翼分子和统一社会党早已动员了自己的队伍。我想，它们得到了劳工民主联盟的帮助，还可能得到了总工会一些地方组织负

① 法国总工会书记。——译者

② 法国劳工联盟总书记。——译者

③ 法国工人力量工会总书记。——译者

④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8。

责人的帮助（听说塞居伊和克拉舒茨基彼此不和）。

下午，夏莱蒂的示威游行开始了。对那些政治家，特别是对孟戴斯·弗朗斯来说，这次示威是失败的，但还是使局势复杂化了。共产党马上从中得出了结论。在它看来，问题在于夺回运动的领导权。因此，它把自己的队伍召集起来，在29日（星期三）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看来，在议会的走廊里，乱到了极点。在外省，到处都是骚乱。

星期二上午，我照常召集了治安负责人开会。为了防止共产党举行示威游行，我决定派萨托里的坦克一直逼近到伊西莱穆利诺市。下午，我若无其事地主持了同公职人员工会进行讨论的第一次会议。我觉得，同格勒内尔那次会议相比，这次讨论会的气氛显得稍为混乱一些，特别是从工人力量工会代表方面来说。我不得不生硬地要求他们规矩些。这一着还是很有效的。

当天晚饭后，我和戴高乐将军有个约会。我觉得他很疲乏。他问我：“你还睡觉吗？”我说：“睡，有时间就睡。”他说：“你真走运。”他要我讲讲下一步的打算。我对他大致是这样说的：“共产党即将举行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游行。问题在于它的意图。它是不是想搞一次真正的革命行动呢？这是可能的。集会在市政府后面举行，这大概意味着它想占领市政府，再搞一个巴黎公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同意，我就要调动坦克进行干预。坦克已经准备就绪。但是，经过全面考虑之后，我认为共产党是不会这样干的。在我看来，共产党的分析仍然是没有革命形势。因此，我认为，共产党只是想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提醒大家，它是唯一掌握着主力军的，要是国家崩溃了，只有它能够夺取政权。我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是说危机已经结束，我们必将取胜。

因为舆论已经感到厌烦了。”

由于这种考虑，我已在前一天，即星期一，对众议员克里格提议，对星期四在协和广场举行戴派大规模示威游行一事表示同意。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次谈话丝毫也不象有人所报道的那样。任何时候我都没有建议，也没有要求将军引退。

他回答我说：“你是乐观的。而且，从一开始，你就过份乐观了。”

“我错在哪里呢？”

“你对我说过，你将同总工会达成一项协议。”

“是有过这项协议的。只是总工会没有能够让这项协议得到通过，这就是共产党要努力夺回领导权的原因。这样，代价会大一些，但他们会成功的。”

我走的时候并不了解将军是何等疲乏，何等气馁。诚然，从一开始，他就没有“感觉”到危机。他不明白，在经济重新蓬勃发展、各方面的形势都得到好转的繁荣昌盛的法国，竟会产生这样一种失望情绪和突如其来的要求变革的愿望。他让我领导政府工作，让我独自对法国人讲话，让我进行谈判，在格勒纳尔会议之前也只不过对我说：“你要不惜一切代价达成协议。”我以令人满意的代价达成了协议。下一步可能代价要大一些。但是，任何时候我都不了解戴高乐将军气馁到了什么程度。听说，戴高乐夫人乘坐的汽车在巴黎市区行驶时，受到一些行人的攻击。这次事件，肯定使他的精神状态变得更坏了。总之，在我之后见过将军的克里斯蒂昂·富歇就有这样的感觉。这次会见，事先并未通知我，事后也没有向我汇报。

我去睡觉时，忧心忡忡，但决心已下。气氛是紧张的。

因为，那天晚上，我破例地留在马提翁大厦里。往日在夜里的这个时候，我一般都已经顺利地回到了凯贝蒂纳街。我说的当然不是星期六和星期日的那些不眠之夜。

我睡得很香。星期三，我一醒来就准备行动。当我正在研究内阁会议的文件时，让·多内迪厄·德瓦布雷斯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将军累了，已经动身前往科隆贝，内阁会议要推迟到星期四下午。

我立即感到极其忧虑。长期以来，我了解将军的心情变化，也了解他每过一段时间就想辞职不干。我知道科隆贝的气氛很容易促使他实现这一愿望，也知道将军夫人多年来就希望将军引退。她在我面前多次谈到将军的健康问题，说他实际上比看上去还要累。然而，在5月29日这天上午，辞职的假设在我看来就象一场灾难。这不仅因为将军的威望仍然是政权的主要因素，而且从法律上说，将军的引退将使我陷入一种错综复杂的境地。会不会由莫内维尔先生任代总统呢？当然，他不能改组政府。但是，我也不能解散议会。在议会内，气氛已经很糟糕，许多戴派分子，甚至一些部长都在谈论求助于孟戴斯·弗朗斯或埃德加·富尔的必要性。就是这件事导致了保卫第五共和国联合会发出的传单，要求大家团结在蓬皮杜政府的周围。我并不知道有这么一张传单，但我还要提到它，因为它后来被那些说我想搞掉将军的人利用了。因此，必须作出反应。我把特里科叫来，对他说我要求马上见到将军。然后，我召开了有关治安的会议，明确指示：如果共产党要占领某一座政府大楼的话，军队和坦克就准备进行干预。会议结束走出来的时候，我又打电话给特里科，坚持要见将军。这时，他一听我说完就告诉我，将军要接我的电话。对话是简短而奇特的。我只是强调我对他的出走表示担

心，并强调提出他第二天回来是绝对必要的。将军向我解释说，他此刻就要动身，无法接见我；说他绝对需要在乡间安安静静地停留一天以恢复体力。不过，他是用一种冷淡的口吻说话的，他向我保证星期四回来，还说把内阁会议推迟一天没有什么关系，科隆贝又距离不远，让我大可不必担心；就在他装出微笑、嘲笑我的不安情绪时，又突然改变了口气，对我说：“我老了，你还年轻，你代表未来。”他对我说：“再见，拥抱你。”说完，就把电话挂上了。

当然，我很激动，但也惴惴不安。午饭后，我见了沙邦—戴尔马。好象弗雷、吉夏尔和福卡尔也在场。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们无精打采地交谈着。突然——大概是二点或二点半——有人告诉我，特里科来了。我让人请他马上进来。他脸色苍白。“我们失去了将军的行踪。”他对我说，“他没有到科隆贝去。”

我叫了起来。“那他到外国去了！”人们可以容易地想象出我是多么心慌意乱。当时和我在一起的那些人，也都慌作一团。只有沙邦还有劲儿开开玩笑。我把特里科放走了，要他把今后获悉的一切消息都告诉我。我打电话给梅斯梅尔，命令他寻找将军及其家人乘坐的那架直升飞机的去向。然后，我设法思考一些问题。当时，重要的是使舆论感到没有出现任何不正常的情况，一切依然如故。因此，我让人宣布，在星期四的内阁会议以后，我要去议会发表一项声明。这只不过是為了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下星期四要开内阁会议，使之“可信”。我贸然地让人通知电视台，象最近几个星期所经常做的那样，我当天晚上可能发表讲话。于是，在我采取了防范措施以后，就只有等待了。过了一会儿，梅斯梅尔打电话告诉我，几架直升飞机朝巴登—巴登飞去了。

这时，我正同议会多数派（共和民主人士联盟和独立共和人士）的代表有约会。在这次会谈中，我竭力掩盖我在将军出走问题上的不安心情，并表示我在次日内阁会议后到议会去的坚定意愿。我还设法让他们了解我对形势的分析。由于我得知共产党的示威游行是为了显示它自己的力量和动员广大群众的能力，而没有发生事故，也没有对政府大楼有任何企图，这就使我对形势可以作出更乐观的分析了。我的对话者之一（博斯卡里·蒙塞樊）十分坦率地对我说，他确信我应该把位子让给能够联合某些左翼人士的人（他想到了埃德加·富尔），我也同样坦率地回答他，我要是认为我的引退对国家有利，我就会高高兴兴地马上引退，但在我看来，以为新内阁可以解决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这场危机无比严重，无比深刻。政府要么顶下来，要么被冲垮，决不可能通过政府改组而得救。问题不在于我，而在于戴高乐将军，在于第五共和国，在很大程度上完全在于共和国。

他们离开后，梅斯梅尔告诉我，将军的直升飞机刚离开巴登向麦茨飞去。过了一会儿，他又告诉我：“飞机经麦茨飞往科隆贝去了。”事实上，将军是从巴登直飞科隆贝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在快到六点半的时候从科隆贝打电话给我的。他的声音是坚定的。他还证实他已经回来了，并确认了内阁会议，仿佛对我说：“瞧，你没有理由担心吧。”他还说，要复查一下政府工作，戈尔斯在新闻部的工作没干好。

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大大舒了一口气，第二个感觉则是将军还没有完全体会到变革的必要性。不管怎样，要重整旗鼓，只撤换戈尔斯当然是不够的。必须进行更深刻的改组，必须进行选举。

我在顺利地思考。想着想着，一想到共和国总统对我的态度就感到生气。我不知道他去巴登—巴登的目的何在。但是，我觉得，当国家元首不只是旅行，而且是离开国土时，竟然不通知总理，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诚然，这次外出是成功的。在得知戴高乐将军失踪的消息后，法国全国都惶惶不安。这是一次真正的公民投票，它使将军所设想的、十分不合时宜的公民投票显得毫无用处了。共产党是在发动示威游行的时候获悉将军出走的，但没有骚动，这就表明它并不准备孤注一掷。此后，我们就稳操胜券了。不过，我以前也受到过这样的对待。当时，我觉得这样的对待是莫名其妙的不敬之举。晚上，我下定决心辞职。我起草了辞职书^①。30日（星期四）一早，我把特里科叫来，把我辞职的决定告诉了他，并且要求将军回来后立即就让我去见他。

事实上，我只是在内阁会议之前，即下午二时半才见到他的。我倏忽地重新发现了伟大的戴高乐。“你留下来。我要对全国发表讲话，这就是我要讲的内容。”于是，他便把他的讲话稿念给我听。

我感到无法坚持自己的辞职要求。但是，尽管这篇讲话稿^②写得很精采，但缺乏主要的东西，即解散议会。在这个问题上又争论了起来。我毫不费劲地说明多数派很脆弱，很动摇；举行大选肯定能取得胜利。而将军却固执己见，对我说：“不能举行大选。理由就是我还未能进行公民投票。”我回答说，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类问题；就地区化这样空泛的题目进行公民投票，会令人失望，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消除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10。

②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12。

全国的忧虑；如果通过罢工使公民投票基本上无法进行，舆论并不会感到愤慨，但舆论却不能同意阻挠大选，因为大选是深入人心的征求民众意见的一种古老的形式。最后，我知道无法说服他，就说：“我的将军，您要求我留下。我要求您解散议会。”

将军看了看我，然后拿起一张信纸，给参议院议长莫内维尔写了一封信。他这是按照宪法的规定，向国民议会议长和参议院议长“请教”。我明确地告诉他，不必征求沙邦一戴尔马先生的意见，因为沙邦一戴尔马先生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授权我转告。

我们参加了内阁会议。以后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

在讲述我亲身经历的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我没有提到密特朗先生的记者招待会。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向全法国宣布，他准备同孟戴斯—弗朗斯先生一起掌权。我并没有出席这次记者招待会，也没有观看电视转播。不过，我在竞选期间听到的一些反映，使我有理由认为，密特朗的记者招待会激怒了全国人民。这种情绪先是5月30日在巴黎表现出来，后来则波及其他一些城市，最后又见之于竞选运动。在政治上，务必不要弄错什么是人民的愿望。人民从此站在我们一边了。罢工的浪潮日趋平息。小学教师有时遭到了村民很激烈的反对，他们不再出头露面了。法国人民广泛响应戴高乐的号召，我领导的竞选运动终于取得了胜利。

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虽然我殚精竭虑地从事着我的政治行动，但内心里却隐藏着一种泄气情绪。因为，如果说5月30日及后来举行的一些游行示威，确有某些令人振奋之处，也毕竟是发生在一个破坏性时期之后。在这个时期里，

巴黎人、巴黎的资产阶级以及很多法国人，都成了某些革命者和许多肇事者的同谋，他们有时还是相当活跃的。这些人共同进行的活动，一下子就危及复兴国家的努力。虽然，我们的经济还是奇迹般地得到了恢复，可是我们的货币却遭到了沉重打击。我们的储备如同太阳底下的冰雪一样在消融着。法国不再有威信了。世界以一种嘲讽和满意的心情，看到一个不稳定的、自我摧残的国家的形象：它被内部纷争所困扰，正在从过去借伟人之力而登上顶峰，滑向自我陶醉的深渊。在历史上，我们遭受过许多灾难，也曾取得许多胜利。但是，我们的胜利常常不能持久，而我们的灾难却往往是无法弥补的。共产主义没有取胜，人们对此感到庆幸。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国已不能再展宏图，人们对此也同样感到欣慰。同美元的斗争结束了。我们不再能教训世界上的大国了。我们也失去了在西欧的领导地位。这就是在世界上引起的反应。我对这一切深感痛心，然而丝毫没有表露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我几乎下意识地立即感到我有了放弃总理职位的决心。如果观察家们更为敏感一些，他们本来是能够从我主动让顾夫·德姆维尔先生担任财政部长一事中看出问题来的。很久以来，我就知道，要是我离开马提翁大厦，将军是会选顾夫·德姆维尔接替我的。1967年大选前夕，比兰·德罗齐埃先生几乎是正式地把这一点告诉了我。如果通过那次大选出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多数派，如果顾夫·德姆维尔先生没有在巴黎第七区的选举中被击败，将军本来是会要求我辞职的。而今天则是我自己愿意辞职的。在国家经历了深刻的财政、经济危机之后，财政部长这一职务已变得十分重要。我把它交给可能继承我的人，就是为今后开拓道路。我在竞选运动中所起的作用迫使我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而

这将使相当一部分公众舆论对我的辞职极感意外。不管怎么样，我决心已下。

另外，5月29日那天的事情以及将军有事瞒着我的做法，使我感到不快。这就进一步促使我决心离开。说实话，在这个问题上，我搞错了。巴登—巴登之行并非是一个计谋。我大概是在5月31日（星期五）才从梅斯梅尔口中得知实情的。那天，我应他的要求会见了。他告诉我，马絮将军去见了，向他透露了戴高乐将军巴登—巴登之行的真相。梅斯梅尔认为有义务来向我通报这一情况，而且他这样做也是得到戴高乐将军的允许的。

我本来希望不说这些，而让它泯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是，许多人都已了解实情，所以没有必要不将此事公诸于众。不过，最好还是如实地介绍情况，一定要如实。事实上，将军曾因气馁而出现了精神危机。他确信自己输了，因而选择了退却。他一抵达巴登—巴登，就作出了长期在那里逗留的安排。菲利普·戴高乐一家也在那里。将军召见了法国驻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并指示他将此事通知德国政府。马絮将军胆略过人，并敢于直言不讳，他向戴高乐将军谈到了过去的历史并表示了军队的忠诚，终于动摇了戴高乐将军的决心，随着又使他完全改变了主意。法国应该深切感谢马絮将军这一天所采取的行动。后来，我会见了马絮将军，他向我证实了梅斯梅尔所说的话。我还要补充的是，戴高乐将军本人也向我证实了此事，第一次是在6月1日（星期六）那一天，第二次是在此后的某一天。当时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听到这位伟大人物对我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虚弱。我不为自己感到骄傲。”

后来，我又得知，直接到科隆贝去过的阿兰·德布瓦西

厄将军^①，掌握着一封将军写给我的信。信的具体措辞我不清楚，然而它却把“全部权力”都委托给我。如果我竭力从宪法价值的角度去体会的话，这就是信的实质内容。倘若事情真是如此安排，我会做些什么呢？我不知道。我想我也许会尽力去控制局势，即便要在一定程度上冲破执行临时职务的规定和冒犯莫内维尔的个性也在所不惜。然而，要是一个人并没有经受过实际的考验，那谁又能说他本来是会怎样行动的呢？马絮将军周围所有的人、鲁热蒙将军、马东将军，还有其他许多人都亲身经历了我所讲述的情况。在巴黎，也有许多人知道此事：有的是从戴高乐将军本人那里获悉的，有的则是猜到的。如克里斯蒂昂·富歇是马絮告诉他的。罗歇·弗雷是将军对他说的。而记者让·莫里亚克和图尔努等则是风闻此事的，并没有掌握证据。另一个例子是菲利普·亚历山大，他在一本将由法亚尔出版社出版的书中详细谈论了这件事。当我正在拉图尔—莫布尔大街“等候共和国的安排”的时候，皮埃尔·拉扎雷夫和夏尔·奥朗戈把有关这本书的情况告诉了我，并给我寄来了书的清样。我立即把此事通知了特里科和德勃雷，并亲自前去见他们二人，因为他们同菲利普·亚历山大有亲戚关系。他们劝说菲利普·亚历山大收回了那本书^②。从此，不再有人议论此事了，大家都保持着沉默。猜疑消释了，无人再相信传说了。所谓向马絮的军团发出呼吁的传说，却成了专栏编辑们笔下的“事实”。从各个方面来说，这种情况对1968—1969年的法国

① 德布瓦西厄将军在1968年7月23日写的一封信中提供了证明。参阅《有关文件汇编》18。

② 菲利普·亚历山大后来发表在《法兰西晚报》上的文章中，态度就不那么慎重了。

都是有好处的。

不管怎么说，将军作为国家元首的威望受到了损害。电台和电视台积极进行了活动。它们夸大了危机。如果不说他们煽动骚乱的话，那至少有时也促使骚乱进一步加剧。它们还突出了我的位置。我力图避免过分出头露面，因此，尽管沙邦—戴尔马和其他几个人一再劝说，我仍拒绝出席5月30日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举行的游行。但是，在那个5月份，我确实是经常参加讨论，向全国发表讲话，在议会讲话，向工会讲话，向政治家们讲话。在广大群众眼中，那时是我在支撑局面。将军“不管事了”。他的任何活动，乃至他对罗马尼亚进行的极为成功的访问都不能不加深人们的这种印象。人们意识到，一个新的阶段正在酝酿之中。

我现在接着讲下去。我认为没有必要谈6月份的事。那个月，人们整天忙于竞选的争斗。政府仅有的行动是通过建立外汇管制来弥补财政上的缺口。竞选结果终于揭晓了。

第一轮选举结果表明，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无论在第二轮选举中还会发生什么事，这一局面已是不可更改的了。我还记得，第一轮选举结束后的次日，我同将军进行了一次谈话。他对我说：“蓬皮杜，在取得这样的胜利之后，我们却都感到失望，这该如何解释呢？”我竭力向他说明我已在上面说过的使我感到气馁的原因，并暗示我想辞职。但他立刻打断了我的话，说：“我们以后再详细谈这些问题吧。”

第二轮选举开始了。我立即向将军表示我想辞职。和上次一样，他没有回答。星期二，他邀请我的妻子和我一起吃晚饭。当时没有别的客人。我知道，将军想同我谈实质问题。然而，奇怪的是，他却故意回避这些问题。他对我的妻子说：“夫人，我可以告诉您，您的丈夫挺住了。”也就在

这次晚餐之后，一个谣言流传开了。这个谣言极为荒唐，然而我却始终未能使记者们相信这并不是真的。除流言蜚语外，记者们什么也不信。谣言声称，将军曾快快地对我妻子说：“夫人，看来您的丈夫在选举中获得胜利了”，而我则回答说：“我没有希望了”。这种谣传纯系无稽之谈，而且根本不符合当时在场者的心理和口气。

尽管如此，我还是向特里科肯定地说，我辞职之心是真实的，不是装样子的。星期二，在部长会议之前，我同将军进行了一次谈话。将军突然对我说：“蓬皮杜，你是否已决定同我一起推行‘参加’的方针？”当我听到这句话时，立刻感到吃惊，并有些担心。这个问题提得使我感到意外。我是这样回答的：“将军，只有当我了解‘参加’的方针的确切含义时才能回答您。如果加比唐说得对的话，那么‘参加’就是苏维埃化，或者意味着在企业中建立代表大会制度。果真如此，我就不同意。”将军说：“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加比唐是个傻子。‘参加’的意思是让劳动者参加企业的活动，并向他们提供有关企业活动的情况。我们以后再谈这个问题吧。”

我们走进了会议室。但是，后来我们再也没有重提这个问题。

不管怎样，我当时的理解是，在是否让我离开的问题上，将军仍然犹豫不决。我感到焦虑，所以再一次向特里科申明，我已经厌倦了，我打算辞职。星期四白天（或许是星期五的早上），问题终于商妥了：我可以辞职。将军没有同我进行过任何“深入”的交谈，既没有象我所预想的那样，在星期二晚餐时进行这样的谈话，也没有象他星期三所说的那样，就“参加”一事交换意见。只是商定了以下原则：我

将给将军写信，表示我辞职的愿望，而他则将回我一封信。

我快要辞职的消息传开了。星期五那一天，我真是受了不少的罪。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地前来恳求我留任。他们中间大多数人都认为，我的辞职是“不可思议”的。在他们看来，这是叛逆之举，我将会在全国引起惊慌和愤懑。他们对我说，在大选中给我投“赞成票”的人会觉得自已上了当，云云，云云。

然而，我还是坚持住了。

黄昏时，顾夫·德姆维尔令人诧异地前来拜会我。他刚见过将军。首先，他表示对我的辞职感到遗憾。将军把我的决定告诉了他，但没有向他提出任何建议。顾夫·德姆维尔认为将军倾向于梅斯梅尔。他觉得情况不妙，因为舆论界把此事同将军的巴登—巴登之行联系在一起，并由此得出结论：军队答应为将军提供帮助，条件是他必须起用梅斯梅尔。

尽管有些人，如皮埃尔·拉扎雷夫，曾对我说过顾夫·德姆维尔野心勃勃，但我还是极其天真地轻信了他。我坚持认为他从未想促使我辞职。此外，我还以为他是可能接替我的最理想的人。因此，我给特里科打了一个电话，托他转告将军，我坚决支持顾夫·德姆维尔当新的总理。

那天晚上，我回到贝休恩大街家里用餐。全家人都到齐了，他们希望看到我稍微恢复一下对个人生活的兴趣。他们对我说，我不应该违背国家的利益行事。

那天夜里，我无法入睡。我反复思考着问题的各个方面：我感到疲劳和厌倦。在明天的政府中我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今后我是不能得到休息的……另外，在新政府组成后，那些没有被保留在内阁里的人和没有能够入阁的人会排

着长队，没完没了地来找你。除了这一切，我还得考虑大家的意见，包括我家里人的意见。

星期六早上，我又同特里科进行了谈话。我把人们的反应告诉给他，并对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最终只得同意继续干下去。但是，我要求保证给我十五天的时间彻底休息一下。最后，我还表示希望能同将军就“参加”问题进行一次谈话。“参加”的词义含糊不清，我觉得这很危险。上帝知道，我并不惧怕原则问题，然而我还是应该知道脚步究竟在往哪儿迈。

我知道，特里科感到很尴尬。事实上，那天中午时分，他打电话告诉我说：“将军大声嚷了起来：‘真糟糕！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我已经建议顾夫·德姆维尔担任总理了！’”我确实听说，星期五晚餐后，将军又再次接见了顾夫·德姆维尔。

我顿时有如大梦初醒。当然，我明白，将军对撤消他自己向顾夫·德姆维尔提出的建议感到很为难。再说，归根结蒂，将军也是因为我表示想辞职才向顾夫·德姆维尔提出建议的。不过，我后来又表示愿意继续留任了，而且我也只能在下星期三才提出辞职。这件事还是表明将军确有撤换总理的想法。我理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最近几周里，我有点太突出了。考虑到将军本人的禀性，同时也考虑到权力的良好平衡，哪怕仅仅是表面的平衡，确实，最好还是应该让那个已经变得过分碍手碍脚的总理辞职，而代之以一个使自己的职权符合宪法规定的新总理。我明白这一点，而且我对此也感到宽慰。然而，两个多星期以来，将军似乎为我的决定感到惋惜，似乎完全是出于好意才接受我的决定的，因为他也理解我。将军一向神秘莫测，他从来不把自己的真实想

法全部暴露出来，这我也是清楚的。可是问题是需要采取行动，而并不涉及我个人。在我同将军的关系中，我一向是十分坦诚、直率的。我曾以为将军对我也同样如此。突然间，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我内心感到震动。我们之间的关系原来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职务关系，而并非是一个伟大人物和一个完全忠实于他的、勤勤恳恳地以自己全部才干为他服务的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我开始回想起一些往事。1965年，将军在参加总统竞选之前曾对我说，他感到心灰意冷，想辞职不干了。1962年以来，他多次对我说，在他之后，我应该成为共和国总统。现在我意识到，他当时是在试探我，想看看我的反应。当然，我的态度始终是竭力劝他参加总统选举，而不必理会某些部长的意见，尽管这些部长十分聪明，而且是资格最老的戴高乐派。这一点在1965年夏天的一次晚餐上表现得尤为明显。那天，将军邀请了帕莱夫斯基、马尔罗、德勃雷和我一起吃饭，以便了解我们对他再一次参加总统竞选的意见。大家提出各种不同的论据，坚决劝他参加竞选。我从大家的反应中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将军会接受这个意见的。当时有一种谣传，说我直至11月4日还一直因将军没有明确表态而怀有希望。这纯属想象。1965年6月至11月之间，我对许多人说过，将军肯定是候选人。同样，在他不得不动手术时，我曾经十分审慎地问过他，为了防止意外，他是否有什么指示给我。“啊！您也这样！”他回答道。我对此的反应很强烈，说：“将军，我永远不会忘记，珀蒂·克拉马尔暗杀事件发生时我所经历过的五分钟，也就是从弗雷先生打电话告诉我，有人用机关枪扫射您乘坐的汽车，直到他通知我，您已安然无恙之间的五分钟。要是您不在了，就会给我带来巨大的责任。我不能不考虑到这点，不得不了解

您的想法。”

这一切使我感到失望。

我再回过头来说星期六发生的事。我确实向特里科表示过，事情既然已是如此，那就好吧。然而，由于是将军决定让我辞职的，因此我就不必象原先答应过的写那封信了。于是，我就要求多内迪厄·德瓦布雷先生给我拿来另一封信，我在上面签了名。这封信内容平淡，就象在1962年和1965年大选一结束所写的信一样。星期一，我又见到了将军，他再次向我提起信的事。我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我把那封按常规写的信发了出去。我得到什么样的答复，人们是清楚的^①。星期三，我最后一次出席部长会议。顾夫·德姆维尔组成了新内阁。

他在国民议会发表讲话的那天，我坐在议员席上。我高兴地受到多数派所有议员，即占总数五分之四的议员们的长时间鼓掌致意。无庸讳言，当时我表面上无动于衷，而实际上却十分激动。

总之，我感到宽慰。我的政界朋友们的这一表示对我是一种鼓励。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13。

有关文件汇编

1. 乔治·蓬皮杜在教师协会的讲话

(1968年1月15日)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同事们：

在我看来，这次聚会首先说明，法国人在彼此相遇的时候，喜欢交谈对军人生活或学生时代的回忆。今天，在这里的都是“中学同学”，大家都高兴地谈到，有个考试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千方百计地出题难倒我们的“恶毒行为”，同时也谈到老天保佑我们靠自己的成绩渡过了难关。

因此，使我们团聚在一起的，是同窗情谊，是我们在受教育的过程中结成的兄弟情谊，是拥有教师这个学衔曾经给我们带来的满意心情。我们的亲属和老师曾向我们介绍说，这一学衔是智能高人一等和学业取得成绩的标志。这一点使我们的聚会热情友好，但又有些令人惆怅，因为它只是对我们青年时代的回顾而已。

不过，今天还有别的因素。如果我听清楚了你们主席讲的话，从建立取得教师学衔的考试制度到创立教师协会，已过去了一百五十年。取得教师学衔的人在这一百五十年中间作了些什么事情呢？谁在权力机构面前保护他们呢？幸运的

是一一切都变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教师协会。它几乎把所有通过这一考试的人组织起来，并且认为已经解决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因为，在我们的大学里，提出取得教师学衔的考试制度和教师的地位问题，这还是第一次。对于这个问题，我曾多次有机会向你们的主席或执行局谈过一些意见，而且国民教育部长佩雷菲特先生的前任也公开谈论过这一问题。不过，这不能说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也不能说政府在这方面的想法已经最后确定下来。因此，我们继续交换看法和想法是不无裨益的。

为什么会发生取得教师学衔考试制度的地位和通过考试的教师的作用问题呢？一般都认为，原因在于中等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以及中学生人数的增加。有人对我们说，取得学衔的教师过去是中学的合格的教师。今后，参加取得学衔考试的名额大量增加，他们就再也不能胜任这种工作了。

然而，对于这些公认的情况，我还要提出两点看法。

第一点看法是，很久以来，至少在外省，取得学衔的教师就不再是中学的合格教师了。就我本人而言，我是在我们省里当时唯一的一所中学里就读的。我也只见到一名取得学衔的教师，他是一年级的文学教师。所以，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那么新鲜的事情。其中一个原因是，很久以来，中学有许多教师都没有取得教师学衔；另一个原因是，很久以来，很多取得学衔的教师都习惯于流向大学院系，流向巴黎的中学，或者在迫不得已时流向省里的著名中学；在外省不知名的中学里，都缺乏这样的特殊人物。

第二点看法是，我不赞成只是简单的增加参加取得学衔考试名额的制度。考试不仅是为了根据需要进行招募工作，

而且必须保持招募工作的水平。要想保持取得学衔教师的质量，就要使取得教师学衔的考试仍然是难得的。因此，对刚才居伊·巴耶先生的讲话，我是完全满意的。这就是说，目前被录取者与应试者的比例与战前的比例大致相同。我认为，继续保持这种比例毫无害处。

但是，取得教师学衔的考试，长期以来仍然是为中等教育设置的。而且在我看来，目前人们提出的问题，其根源仍然是高等教育有了发展。直到不久以前，也就是说，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中等教育为高等教育做了准备，而高等教育也为中等教育做了准备。上大学的人，其目标大都是取得学士学位，然后取得教师学衔，即从事教育工作。正是通过这些考试中获得的成功，他们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或者是在中学任教，或者是继续学习，并按照众所周知的办法搞一点研究，使自己进入高等学府。人们发现，二十年来，这种情况已经部分地发生了变化。人们一方面看到，私营部门大量需要专家并且意识到今后巴黎综合工科学学校和法国中央高等工艺制造学校等著名学府已不能满足招募工作的需要，因此便到师范学院去，在取得教师学衔的人和专科学校的学生中间寻找准备从事这些工作的人；另一方面也看到，所谓研究工作，也就是说科学极其迅速地发展，越来越需要大学生，而且在他们还很年轻的时候就让他们从事研究工作。过去，研究工作只是个人在授课以后进行的，而现在它本身已成为目的，在自然科学方面，尤其是在我青年时代所谓的实验科学方面更是如此。因此，那些从事文学的，还有哲学、社会学、历史和地理的，他们都认为，不应错过这趟看来运行良好的“研究”列车，而且我们已经看到，本来只在理论科学领域里产生的情况，已逐渐扩展到大多数学

科。这样就出现了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大学生涌入大学院系，向这些大学生提供的工作岗位大量增加，高等院校不得不很快招聘许多讲师、助教和辅助人员。由于实际情况如此，这样的招聘工作不是通过传统的考试途径，而是通过其它办法进行的。由此产生了目前的麻烦。

在这些方面，我们哪里找得到取得学衔的教师的位 置呢？我重复一遍，官方没有表示意见，问题正在讨论，教师协会在这一讨论中当然会有自己的地位。所以，我不希望别人从我的讲话中得出结论。不过，我对这个问题有些想法，想简单地表述一下。

首先，应当承认，中学教师大多不是，也不会是取得学衔的教师。我还觉得在取得学衔的考试等于选拔赛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同没有取得学衔的教师相比较，取得学衔的教师可以提供更多的保证。因此，具有这种能力和文化水平的教师在我们的中学里逐渐消失，这是令人遗憾的。一个人在学生时代只要遇到一位好老师，这位老师也是有重要作用的。我对自己的这种说法满怀信心，这尤其是因为我在一生中曾遇到过一位优秀的教师。他为人谦虚，但我还要指出他的姓名。这是一位取得学衔的教师，他也是今天的与会者之一，他是加德拉先生。我认为，在中学里，毕业班（我讲毕业班并非从法律意义上讲，我指的是中学教育的最后几年），要有取得学衔的教师，孩子们可以有取得学衔的教师，并让取得学衔的教师在教学中，在了解进行这一阶段学习的年轻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另一方面，取得学衔的考试就是自然而然地培养为报考高等学校的预备班的教师，我认为这是正常的。这种考试的特征之一，就是为了通过考试而付出大量的劳动。预备班的

学生们为准备自己的考试，也不得不付出大量劳动。勤奋的老师遇上勤奋的学生，勤奋的学生遇上勤奋的老师，这正是人们所希望的。

准备取得学衔的考试和准备所有的重要考试一样，也要做出一番努力。这样做起来虽然令人不快，但却使人专心致志，虽然单调无味，但却必须勉力为之。有一个年轻人二十岁起就有志从事研究工作，并投入这样的学习。他很努力，但他只凭兴趣学习，这一点是完全不同的。在取得学衔的考试中，要求应试者具备必要的常识；尽管各学科可能过分专门化，但我希望仍然继续这样要求他们。我是重视常识的。

因此，我看到在报考著名高等学校的预备班里有取得学衔的教师。最后，我还认为，他们在高等教育第一阶段的地位，应该是同样重要的。对那些将继续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来说，高等教育的第一阶段，仍然是我们强加给他们的一条没有多大好处的必经之路。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是进入教育界的正常途径。可是，我希望高等教育始终不要忘记其基本职责之一，就是培养教师。因此，我认为，在这方面也有取得学衔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目前存在着争议。看来，这些争议不是由于对概念的理解不同，而是由于形势问题产生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非常迅速，并且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利用自己的“资源”，教授们在自己的门生中培养教员，以扩大高等教育。因此，人们可能担心，求职的路将会长期被堵死，今后取得学衔的年轻教师想到高等学校任教时，已有人满之患。你们的主席也公开谈到了这一点。我不希望人们把这当成是一个原则问题。在我们大学的过渡阶段，采用过渡性的方法是正常的。

我希望在座的国民教育部长本人能朝此方向引导讨论，也就是说，我希望过渡性措施与过渡时期相适应。目前，必须招聘助教，但并不因此等于说，这些由他们的教授按助教衔迅速招聘的助教，即使不很称职也要在这个位子上呆它四十年。不过，也不是说他们不称职。因此，必须采取措施，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使将来取得学衔的教师们看到自己是有找到正常职业的前途的。

这就是取得学衔教师的地位。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人们重新考虑取得学衔考试的项目，设法使之适应形势的发展，尤其是适应科学的发展。不要固执己见，应当承认，譬如说学文学，甚至是学数学，都不一定能与学自然科学或实验科学相提并论，因此可以采用一些不完全相同的方法。

最后，我认为，教师学衔考试制度的真正作用，并不限于可能赋予取得学衔的教师的职务，因为凡是有能力担任这种职务的人，不管得到什么样的头衔，归根到底都会给各种事件留下自己的印记，并找到自己的地位。考试的成功虽不一定成为一种依靠，但也决不会使人为难。因此，问题不在于无论如何也要设法确定于取得学衔的教师的职务及其职业的前途，而是在于使我们的教育事业保持一定的水平。我们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从四面八方涌来，专业越分越细。大家都应以最快的速度前进，尤其是在科学领域。反过来说，哪怕只是为了民主的缘故，也必须使所有的人都有可能赶上来。因此，不仅存在着水平问题，更重要的是有可能丧失道德标准。人们不大清楚目前的情况如何，也不清楚学衔或考试有什么价值。教师学衔考试的全部价值正在于此。它应该能够保证一定的文化水平，保证能够忠于教育事业，即能够忠于培养青年人的事业。这就是教师学衔考试那类会考的特点，你们要安排一下吧；

教学实习可以放在考试之前或考试之后，这是国民教育部的事，他可以同你们讨论。重要的是，教师学衔考试应当仍然不是人人都可参加的考试，应当考虑总的文化水平，应当始终向教育青年和培养青年的事业开门。我认为，这一点过去是法国教育的特征，现在也仍然使法国教育在世界上显露其独特的风格。我不是说法国教育比其他国家的教育好。我只是想说，它更适合我们的性格，适合我们的习惯，适合我们的正义观。法国人相信考试。或许，考试之后迎来了生活，而生活千变万化，同样艰难。不过，我们也不要因此取消考试，因为考试在我国是实施社会培训计划的最有效的方法。

因此，尽管我知道应当适应事物必然的变化，也知道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处于一切都在变化，特别是在知识领域里一切都在变化的时代，我仍然首先祝愿教师学衔考试制度永存，也祝愿教师学会永存。我希望，对你们大家和对我来说，今天这个日子不仅是对昔日的回顾，而且是对未来的希望。

二

危 机

(1968年5月)

2. 总理的声明

(急件)

法新社巴黎5月11日19时50分电

今晚，19时15分，乔治·蓬皮杜先生乘坐政府航空通讯组的一架快帆式飞机从喀布尔返抵法国。他在抵达奥利机场时发表声明说：“我在出国访问后回到了巴黎。这可以说是一

次令人疲劳的访问，但它却使我能够看到法国在伊朗和阿富汗很受欢迎。”

总理在抵巴黎前还说道：“现在，我一定要关心法国的事情。至于采取何种方式，我目前不想详说。”

乔治·蓬皮杜先生由外交国务秘书安德烈·贝当古陪同。他在给他准备的一间休息室里，受到了路易·若克斯先生、罗歇·弗雷先生、皮埃尔·梅斯梅尔先生、奥利维埃·吉夏尔先生、伊冯·布尔热先生和伊夫·盖纳先生的欢迎。他在离开机场之前，同他们交谈了几分钟。

3. 乔治·蓬皮杜先生的电视讲话

1968年5月11日（星期六）23时15分

伊朗政府和阿富汗政府为我安排的正式访问，显示出今日法国在相距遥远的这两个国家里，在文化、政治、道义等方面享有巨大威望。访问期间，我一直十分忧郁地注视着大学里的骚乱及其所引起的示威游行的进展。这些示威游行经常造成混乱，从而迫使政府维持秩序，因为这是政府的职责。

因此，我刚回国三个小时，便立即召集了有关的部长开会，然后又同共和国总统商议。在他的同意下，我决定，自星期一起，巴黎大学将重新自由开放。应巴黎大学校长和各学院院长们的请求，学校将复课。

为了使参加考试的学生不因误课而受影响，将采取一些措施。

同样从星期一起，上诉法院可根据法律，对那些被定罪判刑的大学生提出的释放要求进行裁决。

作出这些决定是出于对大学生的深切同情以及对其理智

的信任。

我们在恢复巴黎大学职能的同时，也将恢复它的使命，即在自觉自愿遵守纪律的情况下进行学习。这是通过协商来革新我们的大学所必需的。

政府和我本人不断声明这场革新是必不可少的。我已经着手革新，而且将在全体师生及有关人员的合作下把革新进行下去。

我要求大家，特别是要要求能代表大学生的组织的负责人，拒绝少数几个职业煽动者的挑衅，为争取迅速、彻底平息骚乱而进行合作。从我这方面来说，我已做好准备，为平息骚乱尽力。

但愿每个人都能倾听我的呼吁。

4. 佩雷菲特部长致蓬皮杜总理函

总理先生：

我请求同您单独会见，首先是为了告诉您，我的部长职务当然完全由您支配。上星期六，就在您乘坐的飞机着陆时，我已将此事禀告将军。

因为，我十分清楚，我离开国民教育部将会使您比较容易地解决这场危机。

顺致诚挚的敬意。

国民教育部长

阿·佩雷菲特

1968年5月13日（星期一）

5. 乔治·蓬皮杜总理1968年5月14日在国民议会的声明

女士们、先生们：

巴黎刚刚经历了具有严重意义的几天。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以致共和国总统思忖良久，考虑是否履行诺言去罗马尼亚进行正式访问。经过考虑以后，他认为，对国家承担的义务和法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都要求进行这次访问。

从巴黎到布加勒斯特，乘飞机毕竟只要四小时，而且共和国总统在行前已授权我行使宪法规定在国家元首暂时不能行使或不在国内时委托给总理的权力。最后，戴高乐将军将于5月24日向全国发表讲话。

至于我本人，我当然认为今天就必须向国民议会发表声明。这一声明不能代替即将就国民教育问题举行的大辩论。我的声明是简短扼要的。我要谈的，首先是最近发生的事件，其次是一些重要的问题。

产生这些事件的直接原因，是几个月以来南特尔学院的一批学生所造成的局势。这些学生人数不多，但活动能力很强，他们把直接行动和暴力作为自己的主义。或许，他们自诩为革新者，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某些年轻人自称同社会格格不入，这并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但他们硬要在他们加以否定的社会里发号施令，那就是不能接受的了。可是，这正是南特尔发生的事情。请你们不要让我描述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和过火行为。大学当局终于失去了耐心，不过可能太晚了。于是，学院院长决定停课。

我讲到的那些人，把他们的谩骂、骚乱和暴力行为一下子带到了巴黎大学。在许多教授面前，校长被一些人围了起来。他们头戴盔型帽，手持短粗木棒，把巴黎大学院子里的铺路石撬了起来。受到指责的校长担心，同样极端、但又相互对立的学生之间发生暴力对抗，因此便向警察求助。他能够不这样做吗？无论如何，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处在他们的

地位上会采取别的办法。但是，在古老的巴黎大学里，这一决定也确实地立即在许多学生心目中产生了象征性的意义，而且从那时起，学生的行动开始异常迅速地升级，从而产生了偶发的动机所没有料想到的效果。

于是，几小时之内，几天之内，先是大学生和教员们（他们本来是运动发起者所首先指控的目标），接着是年轻的中学生，他们都大发雷霆了。

我不能不着重指出电台在这种难以避免但又十分有害的情况下所起的作用。它们即使没有直接挑动，也仍然借口报导而进行煽风点火。电台是发布消息还是同流合污，是关心、收集示威者的言论还是号召示威游行，这中间只有一步之差，而且有时就轻而易举地跨过了这一步。

尽管如此，当局还是面对着极端激烈的示威游行。参加者有数万青年，其中许多人只有十六岁，甚至不足十六岁。示威游行迫使政府去恢复秩序。这一点倒是做到了。有些人大谈特谈警察的暴力行为。在这样的对抗行动中，暴力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们的警察表现冷静沉着，我谨向他们致敬。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也不必为造成死亡而感到遗憾。可是，那些为了讨好于人而四处传播的谎言正好相反。由于这些谎言，法院已根据我们的倡议，开始进行调查。

不必为造成死亡而感到遗憾，这在事后看来是很自然的。但是，在这样严重对抗的时候，难道能够不担心吗？

我还要补充的是，这不仅仅是由于警察局长在遵照内政部长的指示指挥部下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坚毅精神和人道主义，以及他的部下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高度纪律性。能够代表大学生组织的领导人，他们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曾

设法阻止极端分子挑起事端。因此，也是多亏他们，我们才能在今天回顾这些骚乱之夜时说后果不太严重。然而，那里并非只有参加法国全国大学生联合会的学生。也还有我刚才谈到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他们声称的要加以摧毁的社会和国家设法采取的自卫措施，他们是不会感到惊讶的。

更为严重的是，还有一部分胆大妄为的人。他们拥有大量的钱财以及适于巷战的器材。显而易见，他们是属于某一个国际组织的。我认为，这个国际组织不仅企图在西方国家进行颠覆活动，而且企图在我们的首都成为实现远东和平而举行会晤的地点之时，在巴黎制造混乱。我的这种想法不无道理。我们必须密切注意这个组织，不要让它损害我们的民族和共和国。

5月11日上午的局势是严重的。那一天，我结束了一次正式访问，从远方返回国内。我荣幸地应邀访问了一些国家，他们通过我本人对法国表示了极其热烈的欢迎。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这次访问时间过长。要是大家都这样想，我将不胜荣幸。回国后，我认为，秩序已经恢复。政府的责任就是使事态平息。政府作出了决定，你们也知道是哪些决定，警察从巴黎大学和拉丁区撤了出来。我重新让大学当局对各学院内部的活动负起完全的责任。除了一群抢劫者外，我们释放了所有被捕的示威者。在激烈的游行队伍中，总会混进一些抢劫者，他们当然不是什么大学生。上诉法院征得政府部门同意后，释放了初审时被定罪判刑的示威者。因此，所有人都可以在正常条件下参加考试。最后，我们即将提出一项赦免法案，由下次内阁会议通过后，立即提交国民议会，一俟有关部门审议完毕，便列入议事日程，优先讨论。这一法案将完全符合国民议会的愿望。它不是为了某一

个政党的利益，而是为了表明在座的各位——多数派、反对派和政府官员争取最终平息事态的共同意愿。

这就是本月11日(星期六)我在电视上发表讲话之后的形势。

不过，在我讲话之前，几乎所有的工会组织都发出了在昨天举行总罢工的命令。

就罢工本身来说，参加者人数不多也不少，但比我们前几次见到的要少。当然，交通运输或电力供应方面的困难，害怕发生事端的情绪，以及家长历来担心把孩子徒劳无益地送到学校因而表现出来的犹豫态度，这些都不能冲淡这一印象。但是，数字是明摆着的，而且在巴黎、特别在外省，人人都会了解这一点。国家的生活远没有陷入瘫痪状态。

相反，在巴黎发生的示威游行，其规模还是很大的。游行队伍从共和国广场和东火车站向当费尔—罗施罗广场行进，历时数小时之久。这类示威游行当然是群情激昂的，这些人还试图再一次引起骚乱，但在这一天，除了在当费尔—罗施罗广场外，没有发生任何严重事件。即便是在这个广场，特别是由于在场的皮埃尔·科特先生的干预，悲剧终于得以避免。总的来说，示威者服从工会和学生领导人的命令，正常地解散了。在这场动乱中，数千名大学生是被那些出头闹事的人鼓动采取直接行动的。他们曾一度对是否同治安人员对抗产生犹豫。最后，他们放弃了这一打算。

在承认游行的组织者和大多数参加者态度冷静的同时，我还要在这里向治安部队和巴黎的警察们致意。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失去冷静，而且严格执行了部长和我本人的命令。

固然，在外省出了一些事，但没有一件真正是严重的。今天早晨，法国又恢复了平静，唯一引人注目的情况，就是

在巴黎大学某一些高等院校，仍然有一部分大学生决心对大学制度提出指控。

因为，不言而喻，除掉当时的背景外，这些事件还反映出一种弊病，我们应当追根究底的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当然就是大学的问题。

请允许我毫不夸张地回顾一下政府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面对求知的欲望和知识的发展，面对向普通民众的子女敞开高等院校大门的必要性，以及现代教育和研究的巨大需要，我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自1958年至1968年，高等院校的学生从17.5万人增加到53万人。教员（教授、讲师和助教）则由5,870人增加到25,700人。高等教育的预算（一切费用都包括在内），按法郎计算，已由63,500万增加到37.9亿，即在每个大学生身上支出70多万法郎。而且，我还讲过，六年来，我们已将一些大学校舍交付使用，其面积超过了1962年各高等院校面积的总和。

总之，除了由于学科之间在挑选学生的问题上突然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局部不相适应的情况外，各个方面的需要也都没有得到满足。

然而，只是作出这样的努力还很不够。教育事业还要适应我们社会的需要，使年轻人在结业后，撇开经济形势暂时动荡这一因素外，都能找到工作以及同他们所获知识相适应的地位。

由于技术和需求的发展异常迅速，问题很难解决。为了设法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米歇尔·德勃雷先生对医学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改革后，同知名的大学教师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对高等教育的文科和理科进行了改革。这一改革还不彻底，而且只能是一种根据经验、根据科学、技术或经济的变化逐

步进行的改革。我们通过设立高等技术学院，创造了一些新的教育形式。这些学院取得了辉煌的成绩，我们在这方面将加倍努力。

但是，这还是不够的。更确切地说，医学、药理学、自然科学、特别是实验科学，还有法律，这些学科正在为广泛而公开地提供一些明确的职位准备条件，在它们那里没有真正严重的麻烦，因为调整工作尽管有时十分艰巨；然而与此相反，利害关系最小、与传统文化观最接近，因而与各行各业的现实情况相距最远，而对采取各种极端形式进行机活动最为有利的学科——我指的是文学和人文科学——都陷于极端混乱的状况。这是因为这些专业的学生，除了那些打算将来从事教育的人之外，看来是找不到出路的。这还因为，象理科或医科的大学生，他们日益采用小组的形式，或同他们的导师很密切地一起工作，并且感到同导师的举动一致，而学习文学和人文科学的人却截然相反，至少在开始的两个学年里，他们从未超出威严的课堂的范围。他们当然可以准备自己的考试，但他们既感觉不出自己同一些明确的任务有什么关系，也感觉不出同导师亲密无间。在文学院和人文科学学院里，年轻人放任自己，学习期限往往延长到七、八年，而且还接受了一种教育，促使他们推翻已经接受的思想，因此他们必然会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一贯拒绝遵守大学制度和社会秩序。

只有通过师生之间经常密切接触和共同工作，才能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

只有通过加强学生的责任感，才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学生只有在广泛参与安排自己的工作 and 安排自己的未来的情况下，才能具有责任感。这种深刻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有关人

员本身。首先是教师，他们的权威已遭到少数狂热分子的直接破坏，只有改变方法，更主要是改变师生关系，才能彻底恢复他们的权威。其次是学生，要想使他们象我希望的那样充分分担责任，就要让代表他们的组织在思想上明确自己同教师的关系，如何参与大学生活，如何参与制定教学大纲以及如何安排实际生活等问题，这是必需的，刻不容缓的。

总之，教师在课堂上向他不认识或不大认识的学生照本宣科，而学生在考试前临时抱佛脚的状况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包括我们挑选学生的方法在内，一切都要重新予以考虑。请允许我讲一句，谁也没有解决这些完全是新问题的办法。有关这方面问题的各种资料是复杂的，又是新近收集的，而且还在不断变化。仓促采取的措施，只能暂时给人以假象。应当本着建设性的合作精神，有步骤地按逐次逼近法解决问题。如果师生对此都已做好准备，政府当然将感到高兴。

我也决定成立一个思考委员会，包括教师、学生、学生家长和各教会的代表人士。今后，我们请该委员会向我们提出建议，如果不能提出解决办法，至少也要提供经验。

很久以来，我就认为，最可靠的出路在于让各大学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让它们向外部生活开放，并适应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现在是放弃抵制这些明显现实的时候了。议会将及时了解这一切情况。

女士们、先生们，认为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事件只是昙花一现，那不过是一种幻想。认为在混乱和匆忙之中能产生一个有效和持久的解决办法，也同样是一种幻想。道路是漫长的，困难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要求大家通力合作是并不过分的。政府准备收集意见，研究建议并从中引出结论，以便作出决定。但是，政府请大家理解这项任务的艰巨性。

因为，这不仅是改革大学的问题。通过大学生反映出来的，是青年一代的问题，是青年的社会地位、青年的义务和权利以及青年在道义上保持平衡的问题。从传统上来说，青年是遵守纪律的，是发奋图强的。不管怎样，他们都是代表一种理想，代表一种道德观念的。

现在，纪律大多已经废弛了。电台和电视的介入，使年轻人从孩提时代就开始接触到外界的生活。习俗风尚的改变，使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以及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使人失去了上进心。人们需要有某种信仰，需要牢记某些基本原则；由于人类长期以来赖以支撑的一切经常被人否定这些需要受到妨碍：家庭往往解体或成员相互之间的关系疏远，祖国遭到非议，经常被人否定；在许多人眼里，上帝已经死去，教会也不知道该走什么路，并且打乱了自己的传统。这一切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对年轻的工人和农民还不怎么样，因为他们懂得面包的价格和奋发图强的极大必需性，但对自己职业的前途却比他人更为担心。可是，年轻的大学生则感到不知所措了。最优秀的学生经常自问、探索、苦恼、要求明确目标和承担责任。另一些人——并不总是最差的——则变成否定一切、排斥一切，而且想摧毁一切。

摧毁什么？首先是摧毁自己身边所有的一切，对于大学生来说，就是摧毁大学。其次就是摧毁社会，但不是象朱坎先生所认为的那样摧毁资本主义社会（请他去向华沙、布拉格甚至莫斯科的大学生们征求一下意见吧），而是摧毁社会本身，即追求物质享受的、没有灵魂的现代社会。

在十五世纪那个毫无希望的时代，中世纪的结构开始解

体，当时，巴黎大学的大学生也在造反。在我国历史上，我只知道这样一个先例。

请相信我，在现阶段，受到影响的，不再是政府，不再是国家机构，甚至不再是法国，而是我们的文明。所有的成年人，所有的负责人，所有自称领导的人——父母、教师、各行各业或工会的领导人、作家和记者、教士和俗人——都应考虑这一点。

这是关系到重新创立一个人人都可接受的生活环境的问题，关系到使秩序和自由，使批判精神和坚定信念，使都市文明和人的个性，使物质进步和努力奋斗，使自由竞争和公平合理，使个人主义和团结一致协调起来的问题。

女士们，先生们，我并不想回避一场政治辩论。我们不久就会有全面地谈到这一点。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属于哲学范畴，而不属于政治范畴，或者至少是属于最高尚意义上的政治范畴。然而，在我简单地提及这些问题的实质时，我并不认为离开了眼前的问题，即我们青年的问题。三天前，在度过了一个骚乱之夜后，我在戴高乐将军的同意下，有意选择了息事宁人的做法，而且作了必要的表示。今天，我呼吁大家进行合作，首先是呼吁大学生们进行合作，我自己也要作出必要的表示。我们的国家希望和平。我们的人民希望幸福。只有冷静镇定，和衷共济，才找得到通向和平与幸福的道路。但愿我的这次呼吁也能为大家接受。

6. 乔治·蓬皮杜总理发表的电视广播讲话

1968年5月16日（星期四）晚9时30分

法国男、女公民们：

我已经表现出了息事宁人的愿望。我已取得共和国总统的同意——他本人过几天要对你们讲话——把巴黎大学交还给它的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最广泛、最有建设性的磋商，我已向他们伸出了手。

我释放了被捕的示威者，宣布了赦免所有的人。但我的呼吁并没有被所有的人听取。一些狂热分子集团——我们已指出了其中的几个人的名字——企图造成全面的混乱，以达到其供认不讳的摧毁国家和我们自由社会的基础的目的。

法国男女公民们：

政府应该捍卫共和国。它一定会捍卫共和国。我是怀着平静而又沉重的心情对你们讲话的。学生们！不要跟随那些煽动者。他们声称，对你们当中四分之三的人都不感兴趣。你们要听从理智的声音。我们准备听取你们所有的正当要求。不要以过火的行动来破坏你们正当的要求。

法国男女公民们：

不管你们的政治倾向如何，也不管你们的社会要求如何，你们都应当冷静而坚定地表示拒绝无政府主义。政府将履行自己的职责。它要求你们给予帮助。

5月25日（星期六）

7. 蓬皮杜总理在马提翁大厦发表的声明

法新社巴黎5月25日讯(12时25分) (急件)

总理乔治·蓬皮杜先生在去爱丽舍宫与戴高乐将军会谈前，中午在马提翁大厦接见新闻界，介绍了形势。

他的声明如下：

“从昨天白天的示威游行和夜晚的骚乱中，我们可以得

出下列结论：

“首先，由总工会和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组织的示威队伍，在到达里昂火车站之前，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治安部门没有进行干预。

“集中在里昂火车站的相当一部分示威者拒绝疏散，而且成群结队地分散到巴黎市区，砸窗户、抢商店和破坏公共建筑。

“治安部门不得不在许多地方进行干预，驱散示威者，保护建筑物。有一部分建筑物暂时被占领，并且有人企图纵火。”

总理补充说：“在晚上将近11点的时候，继续占据街道的示威者——其中许多人不是学生——按照预谋的计划行动。他们成功地推进到了拉丁区。

“在该区的大街小巷迅速地筑起了许多街垒，在很短的时间内，该区成为筑有防御工事的阵地。应该指出的是，直到那时为止，并没有什么警察在拉丁区内驻扎或巡逻。”

蓬皮杜先生还说：“面对这种挑起内战的明显企图——里昂等一些大城市所发生的情况也表明了这一点——治安部队接到了拆除街垒，驱散示威者，占领被肇事者所控制的主要街道的命令。

“在真正的悲剧性的形势下，这一任务是迅速、沉着、出色地完成了。近凌晨3时，秩序实际上已得到了恢复。在拉斯帕伊街或登费尔·罗歇罗街，一些孤立的街垒在5时左右也被拆除了。

“今天早晨，拉丁区呈现出一片被毁坏的景象：树木被砍倒，玻璃被打碎，汽车被烧掉。

“虽然，人们埋怨在治安部门方面和示威者方面都有不少人受伤，但似乎没有一个人伤势严重。

“我要马上说明，在巴黎的一所医院里，有一位男青年因刀伤被送进医院后死去。他肯定被人刺了一刀。伤口的性质清楚地表明，他不是被治安部队伤害的。不知道这是内部火并呢，还是示威者之间的冲突，或者根本就与示威游行无关。

“在里昂，有一位警察分局长被杀害。另外一位分局长的情况令人十分不安。

“由于事态严重，再加上铤而走险者或顽固的、有组织的煽动者断然要实行暴力，政府要求人民极其谨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卷入可能在这里或那里出现的小组或示威队伍。

“绝大多数学生与这些闹事者无关。我强烈要求他们抵制一切挑衅，不要参与任何示威游行。

“因为，当局已经下达了要用最大的力量来驱散一切集会的指示，并已采取措施，使这些命令能够毫不手软、毫不拖延地得以执行。政府确信，人民知道我们的职责是保护他们的安全和财产，他们会懂得毫不迟延地结束颠覆性的骚乱是绝对必要的。

“在这些时刻，治安部门表现了异常的冷静。他们成功地完成了长期以来在巴黎未曾有过的困难使命，避免了任何严重的流血事件。

“这场骚乱是不幸的，尤其是因为它发生在即将由我主持的、在社会事务部召开的、邀请全体工会组织和雇主组织参加的全面谈判的前夕。在昨天正式拟定和发表的名单中，应该加上全国教育联合会。该组织鉴于国民教育问题在目前事态中的重要性，也要求参加，我接受了它的要求。

“农业方面的领导人也可能向这次会议派出一名观察员。

“不管怎样，会议的重点，会议的目标，是要正视社会上出现的问题以及与工人工会组织提出来的要求有关的问题。会议将讨论这一根本的问题，我希望它能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得到解决：我讲的工人问题，既涉及国营部门的劳动者，也涉及私营部门的劳动者。

“在这次会议以及随后可能召开的会议，将通过决议，最终能使法国恢复其经济活力，结束国家目前的瘫痪状态。我希望这些必要的、人民所期望的决议能在较短的或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作出。还有一些更为长期的问题，即重大改革的问题，也提出来了。正如共和国总统昨天所宣布的，这些重大改革将作为一项法案提交公民投票通过。

“现在，我的目标是解决当前的危机。共和国总统的目标已超越目前的危机，即筹划未来，使现在暴露出来的问题的根源能最终消失：这是公民投票的目的，也是要在星期一内阁会议上通过的法律草案的目的。你们将会看到，这一草案包括了一个月以来在法国出现的所有重大的实质性问题。

“因此，一方面，政府直接与工会负责人一起力求解决当前的危机，恢复秩序和活力；另一方面，在共和国总统的领导下，准备进行全民磋商。这种磋商能使全体公民合法地、自由地说出他们的希望，说出他们是否相信戴高乐将军能够在善意的人们——不管他们是谁——的帮助下搞好这些改革。”

（格勒内尔谈判结束后）

8. 蓬皮杜先生的声明

法新社巴黎5月27日讯（8时27分）

（急件）

工会、雇主和政府在社会事务部的会议室举行了历时近二十五小时的谈判。今晨7时30分，乔治·蓬皮杜先生从会议室出来时声明：“我们作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决定，可以说这些决定构成了一项协议。”

“我想对协议一词作点解释。自然，工会组织对某些观点是有保留的，并为他们未来的纲领提出了某些要求。同样，雇主组织指出，作出的决定将给已陷入国际竞争中的法国企业带来严重的问题。为此，它们要求制定一项总的经济政策，使法国能保持其竞争能力。”

“政府方面也强调指出，这些决定带来了财政和预算上的巨大牺牲，破例地一次就给予斗争中的劳动者这么大的社会利益。只是因为目前危机异常严重，才导致作出如此重大的决定。”

蓬皮杜先生接着对所取得的成果说明如下：

——各行业最低保证工资：从1968年1月起，由目前的每小时2.22法郎提高到每小时3法郎。

——工资：实际工资从1968年6月1日起增加7%。从10月1日起，这个百分比就提高到10%，已经商定从1968年1月1日起，工资增长部分全部计入这一总数。

——劳动时间：关于缩短劳动时间的法律文本已被接受。

——退休年龄：关于放宽退休年龄规定的问题已由好几家工会提出来了。法国全国雇主协会已同意研究此问题。

——家庭补贴：政府将研究对有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提供的补助进行调整草案，并对仅有一人领薪、母亲是家庭主妇的补助进行某些改革的方案，并在下次预算中将拟定有关文本。

——老年人：政府同意从10月1日起增加老年最低补助

金。

——工会权利：已经拟定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文件，这份文件规定雇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将要发生真正的变化，“暂且不说是革命”的变化。

——企业中的工会权利：政府声明，各工会组织之间将陆续进行的有关企业中工会权利的会谈，应该导致一项法律草案。对此，政府将负责采取有利于在企业中实施工会权利的立场。

——税制：总理补充说，关于税制的文件十分简短，但规定了将对所得税进行改革，改革的方案原则上将由政府在秋季提出，其中应包括减轻工资收入课税的条款。这一方案还将成为社会经济委员会第一阶段讨论的题目。

——就业：蓬皮杜说，法国全国雇主协会和各工会联合会决定在10月1日前开会，对有关就业的全部问题进行广泛的研究。政府保证参加第二阶段的会谈，增加对就业部门的贷款，优先考虑青年培训。

——集体协议：还有一个关于修改集体协议的很重要的文件。为此，雇主们保证立即召开对等委员会来研究某些工会提出的集体协议的一些问题。

——购买力：根据政府的倡议，将于1969年3月召开会议，以便从总的经济财政状况变化的角度来研究1968年雇佣劳动者购买力变化的问题。

——社会保险：蓬皮杜先生保证同意在本届议会会议上，就批准有关社会保险条例的问题进行辩论。出诊和门诊医药费的自理部分由30%减到25%。

——罢工日：大家同意停工的天数原则上应该补齐。对那些在工资方面遭受损失的工人，应预付50%的工资。

这部分预支款要从补齐的劳动时间中扣除一部分来偿还。如果在今年12月31日前实际上不可能补齐劳动时间的话，那么预支款或差额部分最后仍归领薪者所有。

蓬皮杜先生接着说道：“我还保证，有关各行业最低保证工资、有关报酬、有关工会权利、有关减少劳动时间以及有关对罢工日的补贴等条款，也能在国有化部门和国营部门产生反响。对此，我要说明，国营部门昨天开始了会谈。这些会谈今天下午还要在主管部门中继续进行。

“至于公职，原则上将在明天，即星期二，由我亲自在公职部主持讨论。”

蓬皮杜最后说：

“我是通过在座的各位记者向法国和法国公民讲话的。我想向他们指出，所采取的决定很重要，这次会议是格外严重的。不管这次危机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弊端和困难，不管我国企业和国家预算所作出的某些决定会带来什么样的弊端和困难，斗争中的劳动者将获得异乎寻常的物质利益。

“我认为我们已经取得了极其重要的成果，这样，在技术条件允许尽快进行的情况下，就应该尽快复工。我还认为，工会组织在向你们作出评价时，一定会象我讲过的那样，在保留某些要求的同时，指出这次谈判是富有成果的。

“但愿对劳动者来说是富有成果的。但愿对法国来说是富有成果的……”

9. 蓬皮杜先生的声明

法新社巴黎5月28日讯（13时55分）

（急件）

乔治·蓬皮杜先生中午在向新闻界代表介绍形势的时

候，谈到了当前的主要课题：大学和大学生问题、社会方面问题的谈判、未来的公民投票和恢复治安的必要性等。

蓬皮杜先生首先谈了大学和大学生的问题。

“星期五夜里发生严重事件后，我曾在这里讲过，政府不能容忍继续乱下去，政府愿意为保障公民安全而做它应该做的事。

“与此同时，我还要说，我们准备随时同那些表明自己有代表性并谴责暴力的人进行各种形式的接触。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政府昨天批准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代表大学师生的其他团体组织游行示威。我满意地看到这次示威游行是在极其良好的秩序中进行的。

“所以，我认为对大学生和大学来说，向新阶段过渡的时刻已经来到了。

“因此，我从阿富汗一回来，就接受了国民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先生向我提出的辞呈。接受辞职的决定是事先得到总统的同意的。

“这丝毫不是说，可以把佩雷菲特先生视为要对目前局面负责的人。

“佩雷菲特先生在担任其他各种职务时，曾是我的一位宝贵的、坦率的、主张改良的助手。但是，我认为，鉴于危机的严重性，接受他自己提出的辞职是正常的。他这样做正是为了便于息事宁人。

“我也决定暂时代理国民教育部长职务。

“我认为，从目前情况看来，这样做对各方面都较好。

“我丝毫也不想夸口说，我能在几小时或几天之内解决国民教育的问题。我只是想向众所公认的，包括各学科大学生公认有权威的、杰出的教育界人士请教，并请他们完成一项

调查任务。

“这项调查任务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是，看看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制止无政府主义；即使这种无政府主义是非暴力的，但只要事实上还在大学里存在，我们也要制止，以便为中学生和大学生恢复正常的秩序，使他们不致于最终成为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些运动和爆炸性行动的牺牲品。

“换句话说，看看如何能立即使大学这部机器重新运转起来，其中包括使考试，至少是使大部分考试能够正常进行。

“这项调查任务的第二个目标是，看看怎样才能建立一种研究制度，以便征求所有当事人的意见，从而能提出真正的改革计划，并由法国政府在适当的时候加以研究，以付诸实施。在建立这种制度时，应排除任何政治上的考虑，我还要加上一句，也不管将来是什么样的政府执政，以便同某个声明相呼应。

“我希望大家都能明白，当政府呼吁恢复秩序时，当秩序已经恢复时，它就会履行改革的诺言，并且和大家共同研究如何改革。”

关于社会事务的圆桌会议

蓬皮杜先生接着说：

“现在我想谈谈社会方面发生的事情。你们可以看到，由于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星期一上午在由我亲自主持的与各中央工会组织进行的谈判中找到了一项解决办法。

“这项协议的结果本来必然是复工。

“然而，并没有实现复工。

“过分地延长罢工，不仅对我国经济，而且对全体公民

的安宁和生活都是极为有害的，各工会都应毫无例外地估量出延长罢工的弊害。

“延长罢工将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我不相信在工会领导人中，会有人愿意给向往生活、向往安宁生活的全体法国人制造实际的、巨大的困难。

“因此，应该复工，我们也希望应该复工。

“目前，在各工业部门内部，在各大工厂里，正在讨论有关本部门和本企业内存在的特殊问题。这是正常的。我还要补充一句，在那些夜间进行的谈判中，包括我本人和所有工会领导人在内，我们都确认，总的协议并不要求放弃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和谈判。

“但是，我要重复一下，最最紧急的是，所有这一切赶快进行，以便使生活得以恢复正常。过一会儿，我还要主持有关公职方面的一次全体会议。我对提出的问题和要求还没有考虑成熟，所以现在还不能表态。”

社会措施在经济方面带来的影响

总理接着说：

“现在，我简单地谈一谈有关工资和其他方面的全部决定带来了什么影响。

“这些影响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与为满足工人要求而给予工人阶级的巨大好处成正比。

“难道我不应该特别说一下为使最低工资一次就增加三分之一而作出的努力吗？不应该提一下为增加基本工资和满足有关劳动时间等方面的要求而作出的努力吗？”

“这将给我们的经济，给我们的财政造成后果。这些后果，我们今天还无法估量。我们只有等到这一切都结束以后

才能切实地加以估量。

“但是，我并不希望人们暗示说，这些后果将以灾难性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所有的人——政府、企业主和劳动者——为提高生产率、扩大生产而作出更大的努力，使我们在国际竞争中能保持原有的地位。

“如若不然，我们的生活水平将会逐渐下降，这当然是与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不过，就目前而论，这肯定会对国际贸易和贸易平衡等产生不良影响。我们已经料想到了这一点。

“然而，幸好我们有大量的外汇储备。过去，大家都认为外汇储备没有用处，只好想方设法花掉，但采用什么办法，我也不清楚。在现阶段，这些储备肯定要为制止我国国际贸易的下降发挥作用。我们希望下降是暂时的，法国经济将会在新的起点上得到恢复和振兴，象以往一样生气勃勃，一样有竞争能力。

“我要讲的第二个想法，是关于人民在政治方面应作出的决定，或者是工人在复工方面应作出的决定。

“不言而喻，这些决定只有在没有任何外部压力的情况下秘密地作出，才能称之为民主、自由，才能称之为真正的决定。

“我曾有机会指出这一点，我说，我们不能在街头闹事的威胁下对大学进行改革。

“但是，我还要从总的方面重申这一点。因此，我深切地希望，工会的领导人，不管他们对目前政府的决定抱有何种态度，也不管他们对这方面或那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抱有何种态度，他们都应同意并且主动去要求工人阶级在每个企业中通过无记名自由投票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这是了解罢工工人真实思想的唯一方法。”

“我希望我的号召能被所有的人听取，希望在政治方面也是如此。”

“6月16日的公民投票，将使法国人有机会就改革的意愿、改革的方向、以及是否应在遵守共和国秩序的条件下完成这些改革等问题，正式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在此重复一遍，我不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而是站在民主和自由的立场上讲话的。”

“因此，这一次的公民投票应该象法国长期以来在共和国内进行的一切人民协商一样，在保证公民投票切实、自由的情况下自由进行。这就特别要求尽快地恢复国家的正常生活。因为，我们目前所遇到的瘫痪状况不仅对经济领域有害，也不仅仅对公民们，对忧心忡忡的家庭主妇们的日常生活有害……”

“如果公民投票不能在绝对正常的情况下进行，即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顺利地投去票、去完成其义务的话，那么，目前的瘫痪状态在政治上将显然是有害的。我尤其想到运输，运输的瘫痪可能使这类磋商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

“先生们，你们可以看到，我的立场是：秩序对大家的安宁和安全来说是必要的。我对这方面所取得的改进感到高兴。”

“总结起来，我的立场是：使每个人都能就所有的问题自由地发表意见，不但不应该受到任何压力，而且还应该享有国家正常生活以及各部门、特别是公用事业部门正常运转所提供的一切便利条件。”

“最后，我的立场是：使所有善良的人都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真正参加法国新社会的改造。从今以后，这种改

造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10. 蓬皮杜总理致戴高乐将军的辞呈

将军：

目前，只有依靠您的决定才能结束全国性的危机。在此时刻，由您掌握一切大权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我认为有责任向您提出辞呈，辞去我已荣幸担任了六年的职务。

将军，请接受我忠诚的敬意。

乔·蓬皮杜

1968年5月30日

11. 佩雷菲特致蓬皮杜总理函

总理先生：

第一次内阁会议在悲剧性的气氛中开始了。我不参加此次会议，不能为您分担责任，心里感到难过。但是，请允许我告诉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始终都不会忘记在您身边连续工作的那六年时间；我还要告诉您，当我听到一个曾是我们的同事和工作伙伴的人，在背后向您射出暗箭^①时，我是多么的愤慨！

总理先生，请相信我对您的忠诚。

阿兰·佩雷菲特

1968年5月30日下午3时于勒塔斯街9号

12. 戴高乐将军1968年5月30日的讲话

^① 5月30日上午11时，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声明：戴高乐将军将继续担任他的职务，政府应该解散，以便扩大多数派。

法国男、女公民们：

24小时以来，我作为国家和共和国合法权力的掌握者，考虑了能使我维护这一权力的一切可能性。我已经拿定了主意。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是不会引退的。人民委托于我的职权，我将行使到底。

我不会更换总理。总理的重要作用，他的稳健作风和出色才干深受人们推崇。他将就政府组成问题向我建议作出他认为有益的更动。

今天，我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我向全国人民建议举行公民投票。这将使公民们有机会确定是否应对我国的经济和大学进行一次深刻的改革，并通过唯一可接受的途径，即民主的途径，表示他们是否依然信任我。我注意到，在目前形势下，缺乏进行这一公民投票的具体条件。因此，我推迟了举行公民投票的日期。至于议会选举，它将按照宪法规定的时间进行，除非有些人企图堵住全法国人民的嘴，不让他们发表意见，同时还使用在阻止大学生学习、阻止教员教学、阻止劳动者劳动时使用过的那些手段来阻止他们生活下去。这些手段就是恫吓、毒化宣传和暴虐行动。一些蓄谋已久的集团和某个具有专制企图的党（尽管该党在这方面已有竞争对手）都采用了这样的手段。

如果这种暴力形势延续下去，那我就得依照宪法，放弃在全国立即举行公民投票的计划，并采取其他做法，以维护共和国。总之，应该立即在全国各地组织“公民行动”，其目的首先是帮助政府，其次是在地方帮助成为或再次成为共和国特派员的省长们执行他们的任务：尽可能保障人民的生活，随时随地制止破坏活动。

法国确实面临专制统治的威胁。人们试图迫使法国接受一个在全国普遍感到失望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政权。这样的一个政权显然基本上是胜利者的政权，即专制的共产主义政权。开始时，这个政权当然会利用那些被弃之一旁的政客们的野心和仇恨，为自己涂上一层骗人的保护色。而在此之后，这些本来就无足轻重的人物就会变得一钱不值。

是的，共和国决不屈服。我们的人民会重新振作起来。进步、独立与和平将与自由一起取得胜利。

共和国万岁！

法兰西万岁！

三

乔治·蓬皮杜的辞职

13. 戴高乐将军给蓬皮杜的信

亲爱的朋友：

考虑到您在六年零三个月的时间里领导政府进行了繁重的工作，我认为应该接受您提出的不再任命您为总理的请求。

对此，我深感遗憾，尤其是因为在您任职期间，政府在各方面都进行了很多工作，而且您的行动成效显著，始终完全符合我对您以及对您所领导的政府成员的期望。在今年5、6月间国家经历严重危机的时刻，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此外，这也是法国人民对您的评价，他们通过最近的一次选举表示了这种看法。

亲爱的朋友，请相信，不管您到哪里，我都愿意同您保持特别密切的关系。最后，我希望您作好执行任务的准备，以便有朝一日来承担国家委托于您的任何使命。

亲爱的总理，请接受我对您的诚挚、忠实的友情。

夏尔·戴高乐

1968年7月10日

14.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笔记

7月8日(星期一)……“5月危机不是政治性的，而是宗教性的。”终于有人说这个话了。那是加里布埃尔·马兹内夫在7月4日的《战斗报》上发表的一篇文句不连贯的文章中如此说的。他竭力反对克拉韦尔的文章，对此我并不介意。从今以后，我们要认真看待这个放肆的年轻人了！我们全都在仔细重读《情感教育》这本书，因为在1848年革命和我们的大学学生的1968年革命之间有着一些表面相似之处；而加里布埃尔·马兹内夫却重新阅读陀斯妥也夫斯基的《群魔》一书（我年轻时读到的最初译本的书名是《魔鬼附身的人》，这本书的袖珍本又采用了这个译名）。据我所知，只有他一人记得这一切，而这些都已在这本带有预言性的书中得到揭示和描述。而书中的预言，如同所有其它的预言一样，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都应验了。今天阅读（尤其是重读）这本书使人感到目眩神移：索瓦热奥、热斯马尔、科恩一本迪之流虽然很年轻，可是早在1872年就出现在这部小说里了。这本书的第一个译者E·M·德沃盖认为，这是一本“结构零乱、往往令人觉得可笑和充满隐晦费解的理论的书……”，而我们，假如我们懂得如何阅读这本书，就会从中发现，几乎早在一个世纪以前，不信上帝的人群就在扩大；

而且，通过这本小说的神妙作用，我们还能了解，这一人群的最狂暴的代理人是如何由于知识分子的因循守旧和卑鄙怯懦而变得更加嚣张的……。

7月12日(星期五)。我不了解事情的真相。让别人去说三道四吧，尽管他们对此也是一无所知；而且，他们所说的，只不过是显露出他们个人的野心受到威胁、得到满足或者是落空了。这一点我们是一清二楚的。因此，我想指出一个大家都看得见的问题：那个在5月危机期间几乎是在各条战线上孤军奋战的国务活动家，那个使某一政党在法国竞选中获得了最大胜利的组织者要引退了？……或被辞退了？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思考这个问题，并且按照自己的想法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在我看来，能摆脱职务，对蓬皮杜来说真是交了好运（从我们可以保留这笔财富——一位国务活动家来说——也是交了好运）。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在为法国呕心沥血的共和国总统与他那趾高气扬的总理之间达成协议是必然的。总理在即将开始的一场前途难卜的长期战斗之前，保持了自己的威信和威望，他对此倍觉欢欣。

是的，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战斗，其目的是为了修复被人愚蠢地破坏了的東西。这种愚蠢的破坏活动是一些人在别人操纵之下干的，而那些指挥这一活动的人却躲在幕后。战斗是长期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他们准备进行彻底的破坏。

我知道，在拉丁区发生战斗时，有的人采取了一种浪漫主义的推波助澜的态度，而我却没有这样做。今天，数十亿财富已化为乌有，我们的经济受到了损害，而损害经济的那些人将可能由于经济崩溃而成为失业者。最使我震惊的是，

有人竟然愚蠢到对此大加颂扬。不，我并不认为现在的法国右派是有史以来最愚蠢的右派，可是我们那些左派知识分子却似乎显得是有史以来一切左派中最愚蠢的左派。假如我们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况，那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事端是7月1日前，即在共同市场内发生争吵的前夕挑起的。事态的发展，充分证明共和国总统的对外政策是正确的，因此，我们当时还是很有可能不至于落到这种狼狈不堪的地步。对此，人们也许会反驳说，政治上的才能，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表现为预见性；如果反对政权的行动得到了成功，那只是因为吉斯卡尔·德斯坦和德勃雷的观点使政权内部分裂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戴高乐也许是这样想的：他又一次要应付灾难，而他要
将坏事变为好事，就象他一贯所做的那样。戴高乐主义？那是一个需要不断从最低处往上爬的斜坡。在这一点上，戴高乐心里是有数的。他的才能很少表现为预见性。不过，他不象那些曾经在台上或在野的左翼领导人通常做的那样，为了自欺欺人而粉饰现实。

象弗朗索瓦·密特朗这样的聪明人竟视而不见，居然相信并想让人相信，在居伊·摩勒的社会党人、德费尔的社会党人、比里耶尔的激进党人和瓦尔德克·罗歇的斯大林分子之间，只可能存在一种短暂的竞选联盟。再说，左翼各派之间的对立是由来已久的、根深蒂固的、无法消除的。如果过于轻信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盟，那是欠审慎的。左翼联盟即便在竞选中获胜，也会在兴高采烈了几周之后发生破裂。这是明显的，甚至连普通老百姓也看得清清楚楚。可是，左翼对此却视而不见，满以为只要先搞垮戴高乐，别的就都垂手可得了。

7月14日(星期日)。我从电视上看到，那些站在雨中神情冷漠的新内阁成员和不成功的国庆检阅仪式，心里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忧虑和苦涩。有人认为乔治·蓬皮杜也是这种心情。什么？我仍然坚持我在前天写下的那种看法。昨天夜里发生的灾难性事件，并不能使我改变看法：让乔治·蓬皮杜站在这一“肮脏的巷战”之外，这对他本人以及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幸运的事。现在，在世界各国首都，这种“巷战”的策略都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在“巷战”中，警察需要应付的对手是碰不得的，因为他们基本上全是年轻的大学生。

基本上……昨天夜里的事是大学生干的吗？记者们曾经把克里斯蒂昂·富歇指责大学生是“盗贼”一事说成是犯罪行为，现在他们也骂起法国的大学生来，把大学生称为“浮起的沉渣”，说他们昨天夜里撕毁国旗，企图纵火。但这些记者将来又会反过来继续称之为“学生运动”，仿佛学生们的行动并不是在公开地为某种颠覆阴谋服务。

昨天，乔治·蓬皮杜的一个朋友在我面前叹息道：“如果在最近几个月里仍然不提出总统继任的问题，那么乔治·蓬皮杜很快就会被人遗忘。”我根本不相信这一点。正当左翼愚蠢地疯狂反对所谓个人专权时，全国人民却因戴高乐而认识到：对于一个国家的人民来说，最难得和最必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真正的国务活动家。多少年来，左翼中没有出现一个这样的人物。面对派别纷争这种不景气的现象，戴高乐主义的生命力就充分显示了出来。然而，即便是在戴派方面，也还没有任何人有机会象乔治·蓬皮杜那样在5月危机期间显示出自己卓越的才干。

若要让人忘记他，那就得承认，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一切都那么井井有条，到处是一片美丽、富足和平

静的景象……可惜这不是事实！在春光明媚的5月里，许多人头脑里都产生了荒诞的想法。在那一个月的时间里，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经受了一场浩劫，而这场浩劫注入青年人心灵中的动乱的因子仍在发生旺盛的作用。如果新内阁能克服这一切，那么蓬皮杜的名字也许将同不幸连在一起，而别的人本来是能弥补这种不幸的……但即使是这样，我也可以保证，在数万法国人眼中，前总理依旧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他们通过电视，几乎亲眼看到这位国务活动家是如何开始上任，如何日趋成熟、老练的，而在国家政权经受最沉重的打击以至濒临崩溃时，又是如何力挽狂澜的。

不管怎么说，保卫新共和联盟的众议员们是永远不会忘记蓬皮杜的；首先由于戴高乐的努力，这是肯定的，但也由于乔治·蓬皮杜在实际活动中采取的策略，保卫新共和联盟今天仍是波旁宫^①最强大的多数派，这是任何一个政党都未曾做到过的。康塔尔的那位众议员在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之后，一直同他们站在一起，他们也将继续期待从这位众议员那里得到建议和启示。乔治·蓬皮杜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之后，就成了一个难以忘却的人。

15. 乔治·蓬皮杜致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信

亲爱的先生：

在读过您所写的上述笔记之后，我想给您写这封信。您在笔记中提到了《魔鬼附身的人》一书。的确，在我看来，这本书也许是浪漫派文学的传世之作。很久以来，我一直认为，这本书所描述的世界与我们在5月份所经历的事十分相

^① 法国国民议会所在地，用以指法国国民议会。——译者

似，这是最明显不过的。

正如您所说的，如对事情的根源进行深入研究的话，我们就会看到，根源在于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感到惶恐、失望。这就是说，解决问题并非易事，而且可能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人们提出了要求并举行了示威游行，表面看是荒唐的，但实际上却掩盖一场深刻的悲剧。我对此十分清楚，并且感觉到，那些声称要统治一个国家，而又不知自己究竟追求什么目标，也不能肯定这一目标是否符合人民愿望的人，他们担子有多么沉重。

这也就是说，如同你所猜测的那样，在克服了这场危机并取得了竞选胜利之后，我不但没有感到欢欣鼓舞，反而心绪不宁；在经受了风暴的考验之后，我亟需离开一下，以便思考一些问题。在第二轮选举前，我就主动向将军谈了我的想法，后来又向他说过一次。然而，还有一个事实：那些人，也就是我曾与之谈过我的厌倦心情的人，他们给我施加了压力，有人还指责我“背叛”了那些信任我的人，这就促使我最后托人告诉将军——那是在7月6日（星期六）——如果需要，我准备继续担任总理。

将军通过别人给我回话说：“太蠢了。”可是在前一天晚上，他已经要求顾夫·德姆维尔出任总理，而后者也接受了。7月5日，顾夫·德姆维尔对我说，我应该留任。7月9日，我对他说，我最终同意这一意见。他那时对我说：“在这种情况下，一切都得重新安排了。”我回答道：“已经晚了，全都定下来了。”他没有再多说。

如何下结论呢？这个人——顾夫·德姆维尔——并不卑劣，但他雄心勃勃。他乐意去碰碰运气。我为什么要责怪他呢？

至于将军，很明显，我辞职的想法和他想独掌政权直至他自己引退之日的愿望是吻合的。对此，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当然，我本来是希望他一开始就把话说清楚。然而，我对他是如此钦佩和了解，以至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承认，他从未向任何人真正吐露过心迹。

所以，您所写的是有道理的，事情也正是如此。将军将独自撰写他执政的最后几年的历史。顾夫·德姆维尔将是一个忠实、聪明、灵活和称职的执行者。至于我，我并非自夸，我所试图做的，并不是去理解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社会，而是思考各种可以满足这一代既有热望而又漠然的青年人的行动方式和目标，我认为我已本能地理解了。

恕我给您写这封信，并习惯把您当作我的知音。您写的关于我的那些话令我极为感动和荣幸。我要竭力使自己受之无愧。

乔治·蓬皮杜

1968年7月23日

16.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给蓬皮杜的信

亲爱的先生和朋友：

您的信充满了信任和友好的情谊，使我十分荣幸并深受感动。在反复阅读这封信时，我忽然想到，也许您对致函一个文人兼记者，即一种多嘴多舌、守不住秘密的人会感到不安。我想请您放心，不论是现在或将来，都不会有别人看到这封信的。我的妻子和我的一个儿子曾向我了解您对我的笔记的反应，我不得不对他们说，您确实给我写了信。但我没有向他们作任何说明。

亲爱的先生和朋友，很多人对您离职深表遗憾，我也是

其中之一。我们对新树要根据开花结果的情况来判断，但我对胡萝卜加大棒的制度是很不信任的。

我已八十二岁了。在这多雨的季节，能在自己的花园里休憩，我已心满意足矣。为了自娱起见，我最近又写了一本小说，书名暂定为：《一个昔日的少年》……

请向蓬皮杜夫人转达我的敬意。而您，在为我们大家做了那么多工作之后，应该好好地休息……

您的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1968年8月16日

四

17. 阿兰·德布瓦西厄致蓬皮杜总理函

总理先生：

伊丽莎白和我得到了您和蓬皮杜夫人通过我岳母转来的阿兰的结婚照片，感到十分高兴。我们真诚地感谢您想到了我们，并对阿兰的选择表示衷心的祝贺。

当我们想到这一仪式举行的日期^①和当时的气氛，都非常钦佩您在风暴中所显示的镇静与从容。再说，这也是所有法国人在这次严重危机期间所得到的总的印象。因此，我要同那些投您票的人一样向您表示信任。

我这样做，也是因为想到了我们有时不得不承担的某些责任。至于我本人，特别是回忆起那个尽人皆知的5月29日……我被召回巴黎的时候。

^① 指1968年5月30日，在爱丽舍田园大街的游行即将开始的时候。

我不能在信中告诉您岳父同我谈话的内容，但是可以这样说，这次会见中的有些话是悲剧性的。当时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心灰意冷、疲惫不堪的人。他一连几天都没有合眼了。他对我谈到了他的打算。我花了半个小时，竭力说服他放弃某些计划。而当他同我谈到要去阿尔萨斯或巴登会见马絮时，我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们分手时，将军说：“好吧，我去见马絮。如果他和你想法一样，如果军队象你所说的那样忠于共和国，那我们就可以冒决定性的考验之险……”

在返回米卢兹的途中，我奉将军之命前往科隆贝，以便给安全部门和拉布瓦斯里^①的工作人员下达指示，让他们不必为我岳父母推迟抵达时间而担忧。

另外，我在经过科隆贝时，给福卡尔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不必担心，并让他把将军晚到的消息通知您。至于将军究竟去何地，我不能透露，因为将军要在作第一次技术停留时，才决定是亲自去巴登还是把马絮将军召到达托或斯特奥迪尔。

由于当时天气很坏，而且又无法通过电话同马絮将军联系，将军最后决定去巴登，尽管这一决定在国际上会有不良影响。

后来的事，您都清楚了。我们和所有法国人一样，都是在听到电台的公告后才知道将军已经回到科隆贝的。获悉这一消息后，伊丽莎白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为了未来，应该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呢？结论不应由我来作。然而我可以谈谈我在两次巴黎之行中的所见所闻。

^① 戴高乐将军的住址。——译者

雅克·福卡尔，当时表现很突出：镇静自若、精力充沛、勇气非凡。而在圣—奥诺雷市郊的将军其他随从人员，尤其是军方人员，都相形见绌了。我发现我的岳父非常担心军队的态度。那时，人们清楚地知道，即使不能向主要由义务兵组成的部队随便发号施令，至少也可以要求他们替代某些一级和二级部队，这样，这些部队便能用来进行镇压。再者，若是需要，还可以让军官和士官组成执行某些任务的“突击队”。

军队的纪律十分严明，这肯定是从这次危机中得到的经验之一。

关于马絮将军在同戴高乐将军会谈时所采取的有益立场，我认为不必再向您赘述了。在此之前几天，我曾见到过马絮，我知道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友好和忠诚，而且手中牢牢掌握着军队。马絮与戴高乐将军的那次谈话显然是异常的，因为他谈了整整四十五分钟。而将军一直听着，随后站起来，拥抱了马絮将军，简单地对他说：“请您告诉我妻子，我们立刻回科隆贝，不去米卢兹了。”

谨请您和蓬皮杜夫人以及阿兰一家接受我们最崇高、最亲切的友好问候。

阿兰·德布瓦西厄

1968年7月23日于米卢兹

第四部分 就任总统以前

我想，那是在1968年9月末，有人在伊夫林的垃圾场发现一具被谋杀的男子的尸体。人们证实这个家伙名叫斯特凡·马尔科维奇，过去是演员阿兰·德隆的保镖和朋友。这件事立即引起轰动。阿兰·德隆是著名的演员和巴黎的红人。而且，死者有一封信，指名道姓指控阿兰·德隆本人和一个名叫马尔康多尼的家伙可能会暗杀他。这个马尔康多尼，用报刊上的话来说，是一个“退出商界的无赖”。此外，人们想起另外一个南斯拉夫人、阿兰·德隆从前的保镖，在此之前莫名其妙地在美国自杀。人们议论纷纷，报纸含沙射影地谈到了一场讹诈和一些特制的照片，并列举一些艺术家的名字，提到“前部长夫人”或“前内阁成员夫人”参与了这一事件。

我对这件事并不十分介意。我要操心的事多着呢。我住在拉图尔—莫布尔大街，这就给我带来了一些实际问题。我想的是议会复会，想到我处境的困难。假如我象过去那样，以保卫新共和联盟的议会党团的政治和精神领袖身份出现，这就会使政府陷入困境，而我也违反立法游戏的规定。如果我不以这种身份出现，那对给予我巨大信任的人们就是没有尽到责任，并且又会影响我的前程。在这两种态度之间，选择余地是不多的。最后，我想出了一个超脱之计。我早已着手写一本书，我打算在书里总结经验，特别是1968年5月的

经验，并尽力确定自己的政治主张。

我对这种社会新闻根本无动于衷，即使它是异乎寻常，甚至是黄色下流的社会新闻。我同德隆只有一面之交，但是，这还不致使我关心起他的遭遇来了，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我“匆匆浏览”那些报刊文章时，早已注意到影射一位前部长夫人的事。我甚至早就想过，要设法弄清楚指的是谁，也想到过一、二位前部长的名字。但是，我也弄不清楚究竟指的是谁，因为我毕竟已经不在政府任职。由于我对流言蜚语没有任何兴趣，我的原则是只管与我有关的事，我也很快地忘掉了这些事，况且，也没有人跟我谈起过，我也就忙我自己的事去了。

在这种气氛中，我到卡雅尔克与家人一起度过了诸圣瞻礼节的假期。我无忧无虑地度过了一个真正的假期，回来时心里感到很舒畅。

接着，我回到拉图尔—莫布尔大街，别人告诉我，我的内阁的一个同僚让—吕克·雅瓦尔先生顺道来访，向我问候并有话跟我说。让—吕克·雅瓦尔先生是巴黎的宴会上的常客，一个心直口快的人。我想打听这件事。他鼓起勇气对我说：

“您应该知道，有一件事谁也不敢告诉您。人们谈论的马尔科维奇事件的‘前部长夫人’，指的就是您的夫人，我可以告诉您，在巴黎的筵席上、在报刊编辑室里，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

“这真荒唐！我得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打电话给我的同事若贝尔和巴拉杜尔，他们也向我证实了这件事。凑巧，当天晚上我和我的前内阁成员、现任内政部长的办公室主任松韦尔有个约会。我想，他会把详情告诉我的。我要让这位来见我的人核实一下情况。

可是没有料到，松韦尔因为内政部长有事找他，约会推迟到第二天。我十分恼怒，给马塞兰打电话：“告诉松韦尔，我需要见他，约他明天来吧，可别晚了。”马塞兰有点烦躁不安，告诉我说松韦尔因为部长有事找他，但是下午一定来见我。我回答说：“好吧”，接着，干脆挂上了电话。

下午，松韦尔果然来到我的办公室，他神情紧张，我请他坐下，他大惊失色，讲了这么一段话：

他承担了一件很犯愁的差使，他也不知道这差使怎么会落到他头上。马尔科维奇案件又出现了新的情况。有一个关押在弗雷纳（或桑台监狱）的年轻的南斯拉夫人，由于他曾与德隆通信而被法官传讯（关于这一点，我应当指出，警方的说法不一，当时有三种不同的说法），这封信显然已被监狱当局截获。这个名叫雅可夫的南斯拉夫人可能讲了这么一件事：在1967年或1968年，他的朋友带他去参加在伊夫林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晚会，在那里，他发现了几个兴高采烈的人。在离开别墅时，他的朋友可能讲了这样的话：“你看见那个高个子金发女人了吗，小声一点！那是总理夫人。”

这些就是雅可夫对法官的陈述。在事先安排的与警方的谈话中，他交代了这件事，还添加了各种细节。在法官面前，他尽量回避确认透露了上述情况，他说他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种丑闻，只是他的“伙伴”跟他说起过我妻子的名字，他还强调说没有认出我的妻子。

当然，政府是消息灵通的，在经过磋商之后，他们认为，松韦尔作为我的老同事，由他把这件事通知我是最合适的人选了。这并不是这个倒霉鬼的意愿。

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我的反应。我怒不可遏。

当然，我丝毫也没有想过这样做会对我的政治生涯产生

什么影响。我想到的是我的妻子、她的厄运，我承认我担心会发生最坏的情况。我很少有这种几乎是绝望的心情。

甚至在这种绝望中，在我的部属中间：若贝尔、巴拉杜尔、加罗夫人、迪皮伊夫人、西蒙娜·塞尔韦、以及在我的秘书们和负责保卫安全的便衣警察中间，从他们那里获得行动的力量，这是一种极大的支持。我需要对付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首先是司法当局，加罗夫人的效率颇高，由于她的努力，经过调查后，真相终于大白了。然后是对付警察当局。我会见了马塞兰，我同他讲了我的看法，他向我发誓，他根本不相信这些无耻的捏造，并将大力相助。我相信他会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干这种事时有点笨拙，章法也有些乱。应该说他的机构对这件事作用不大。我对新闻报刊方面还是心中有数，我认为流言与谎话是无济于事的，我重视的是报刊上说些什么。在那几周内，我会见了几十位新闻记者。我跟他们谈话的方式，就象《新观察》杂志描写的那样：“我象一头受伤的老虎”，总的来说，我获得了效果。可以说，几乎对各方面的人士都充满信心。

令人遗憾的是，在巴黎的宴会上，人们谈论的还是这个题目！此外，有一位朋友认为，应该让我的妻子知晓此事才好，当然，他这么说也有道理。于是我们决定毫不退让。我们又开始出门访客。我们单刀直入，直接谈起这件事。这就可以允许我衡量一下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也可以区分究竟谁是真正的朋友，谁是势利之徒。我应该说，在真正熟悉我们的那些人中，虽然有一些背叛我们的人，但是，也不乏经得起患难考验的有胆有识之士。

政府还存在，戴高乐将军还在视事。在这里，我应当说，我了解到的情况使我惊愕不已，司法部长加比唐在得悉

雅可夫的证词后给马塞兰打电话，并告知此事，同时哈哈大笑。他觉得这是件怪事。我想，他也通知了顾夫·德姆维尔和特里科。特里科正在科隆贝上直升飞机。戴高乐将军在诸圣瞻礼节的次日返回巴黎，已经和顾夫、加比唐、马塞兰会合。有人早已决定丝毫也不应阻挠法院（？）的调查，而顾夫也应该把情况告诉我。最后，经过四十八小时的讨论，倒霉的松韦尔被指定主持这个委员会。

我愤怒已极。因而，顾夫甚至没有勇气通知我！因为这些人中，有的人很了解我的家庭，既然他们认为调查能够朝着这个方向进行，必然或多或少地相信事件的真实性！而戴高乐将军本人，他认识我的妻子已经很久了，可是也没有相助一臂之力！

我要求见将军，共同商定会面秘密进行。我穿过庭院进入将军的办公室，下面就是我对他讲的原话：

“我的将军，您知道我为什么要求见您，我有三件事要对您说：

我很了解我的妻子，当我知道她被卷入这个事件中去时，不管其程度如何，我是难以想象的。

有人可能也想把我牵连进去，但他们在别处抓不到我的把柄。我且不说您的那些部长究竟干了些什么了。”

无论旺多姆广场的加比唐先生、马提翁的德姆维尔先生，或者是爱丽舍宫那些体面人物，都毫无反应。

将军听我讲话，瞧着我，反应很冷淡：

“我嘛，我从来也没有相信过这种事。我已请求别人把这件事告诉您。”

“我的将军，我当然不会怀疑您的态度。”

谈话结束时，我要求不久以后再来看他，并将这件事的

原委告诉他，然后我告辞了。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将军在离开我时，他对自己的作法也是不满意的。

确实，在此期间，调查还在进行，而我也进行我的调查。

帕塔尔法官负责调查。对这个我所不认识的人，沙邦—戴尔马的评语可谓恰到好处：“这是一个坏蛋……！”显然，警察局的某些人是同谋，要不就是阴谋的制造者。负责调查的警察局长桑松先生，在发表雅可夫证词的三周前，就向《解放了的巴黎人报》记者宣布，有一个犯人将要透露重要情况。我亲眼看见过记者所发表的书面声明。桑松先生知道，雅可夫不仅是一个无赖，而且也是告密者，他又怎么会忘记这一点呢？此外，他在发表讲话的前几天，接受了他的律师和警察局的“幕后操纵者”的探望，其中还包括警察局的书记长奥贝尔，他成天在《费加罗报》的特派记者面前散播流言蜚语。此外，还应该指出，每当人们与德姆维尔谈到这个事件时，他总是带着神秘的神情说：“奥贝尔在这里头扮演了什么角色？”从这些人那里又能得到什么呢。

但是，这个法官，尽管他是如此地愚蠢，总应该有所察觉吧。雅可夫的证词，即使对一个瞎子来说也是会感到吃惊的，因为当事者挑起事端，起因于一个目不识丁的南斯拉夫小流氓以伏尔泰^①式的怀疑的语句写成的一封书信。这个家伙因犯罪坐牢，本来日子还比较安稳，为什么要参与到这种事件中，甘愿承担风险？而他的陈述又有多少真实性？人们也可以想象得到，一个浪荡女人参加这种狂欢宴会，在这种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作家、哲学家。——译者

场合，巴黎的知名食客、青楼女子、戏子、新闻记者满座，当然，告密者成群结伙，在这种情况下，消息不胫而走，警察局长、内政部长、擅长讹诈的报刊怎能不知晓此事？而且，在这个时候，她的丈夫是总理，在任达六年之久，难道一点消息也不会走漏，成千上百的知晓内情人士不会透露风声，警察局长或内政部长，他们就不会迫不及待地向国家元首提出警告，政府当局难道会不知道一场可怕的丑闻即将来临。

这显然是一件难以令人置信的事。况且，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雅可夫指出的、到著名的别墅去的那些“伙伴”也不是全都在场，至少其中有一个人当天已蹲了监狱。此外，在那一天，我和妻子正在布列塔尼密林深处度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报纸曾多次谈及此事。我还要补充一点，在寻找这所著名的别墅时，雅可夫带领警察到了一所无疑是属于大工业家的乡间住宅。在法官传讯时，这个工业家，他倒是直截了当地说了实话。帕特尔平时多嘴多舌，对这次听证却守口如瓶。然而，这种做法也不能防止走漏风声。他叫人在法国全境寻找人们所谈到的电影片和照片，当然，什么也没有找到。

（事后我也很吃惊，那些人为什么没有伪造出来呢？不久以后，在总统竞选运动中，我才知道他们曾设法传播一张照片，但是，这张照片是生硬拚凑出来的。他派警察到圣特罗佩，向当地主要的租赁房屋公司的女经理调查，我曾经象别人一样向她租一幢假期用的别墅，这种房子是供同性恋者使用的。这是她的一种业务，在租房时我也没有碰到困难。此外，我也象每一个在巴黎的人那样，碰到过一些同性恋者。人们有时是知道这种事的，但并不知道其详。无论如何，我想人性总是那样，人们不能强迫别人同意相互关系中的某种习

俗，即使朋友之间的习俗也是如此。我非常高兴和庆幸作普鲁斯特^①和纪德^②的朋友。这样也没有使我成为同性恋者。

我可以这样说，在那几个月里，警察局和法院的活动并不是追查罪犯，而是寻找那些可能牵连到我和我的妻子的资料和证据。这种调查，好象专门为了取悦于拉儒尼检察长（他也好象是受政治上的反对党所驱使）和帕塔尔法官，这位法官在丑闻事件中东窜西跳，很明显地是为奉承那些漂亮的电影女明星以供她们“编排节目”，然而，当我第二次秘密会见戴高乐将军以后——这一次礼仪和上次是一样的，这种调查变得更为审慎了，至少也不怎么露骨了。这一天，我要求特里科先生参加会见，为的是让他能记下我将透露的事实，同时能使我在与戴高乐将军会见时可以汲取一点力量，使我谈话时声调能谨慎一些。

在戴高乐将军面前，我揭穿警察局和法院全部活动的内幕。几个星期前，新闻界就获悉将讯问一名囚犯，并将揭发案情。在讯问的前几天，律师、警察、幕后操纵者都同囚犯有所接触。至于所说的接触时间和地点都不可信。审讯的指向也颇奇特，好象不是追查杀人犯而是寻找蓬皮杜放荡的证据，等等。以上的这些话，我有证有据地详细地作了阐述，将军听了以后，惊愕万分。他当着我的面要特里科把加比唐找来。我知道将军会见了加比唐，不管加比唐是甘心情愿还是出于迫不得已，他要求检察院负责调查杀人犯，这当然是他们的基本职责。在我和将军告辞时，他劝我鄙视那些无稽之谈，并说政治家受诬蔑是常事。我说如果事情只是针对

① 普鲁斯特（1871—1922），法国著名作家。——译者

② 纪德（1869—1951），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译者

我，我当然可以理解，但是针对我的妻子，我是决不能善罢甘休的。

我并不按1968年底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来叙述。我掌握了所有的资料，我本来是能够这样做的。但是，我在这里只谈基本的情况，也就是说谈了总的印象和我自己的反应。^①总之，人们可以说诬蔑的浪潮平息了，至少在巴黎是如此。新闻记者只好靠编造谎言过日子，而且只是对政治上利用此事感兴趣。相反，外省的消息还像过去那样姗姗来迟，我收集的反应几乎也是来自四面八方。但是，总的来说，只有那些读《一分钟》周刊感到惬意的人士倒是碰了钉子。

不管怎样，人们在政治上开始利用这件事了。它首先是在戴高乐派人士中间开始的。由于本·巴尔卡事件可悲的结局而出了名的勒马尔尚律师对此事很感兴趣。参加调查此事的一个警察天天向他提供情况。我曾向弗雷先生提供情况，他向我宣称，勒马尔尚先生要为我辩护。这是确有其事的，而我并没有要求他办理此事，他和我也没有任何接触。此外，我对勒马尔尚先生的热心感到很惊奇，因为在1967年议会选举中，由于他受本·巴尔卡事件牵连比较明显，我曾经不同意对他的提名。有一位大使，在离开马提翁时曾听到德姆维尔的一个外交顾问说，由于可怕的马尔科维奇案件，“蓬皮杜已经完蛋了”，格朗德瓦尔跑去找沙邦—戴尔马，请他准备继承戴高乐将军，因为“蓬皮杜，他完蛋了，马尔科维奇案件把他毁了。”我还可以列出一串名单，特别是指出当过我任内的部长和我的朋友中间，谁也没有勇气到戴高乐将军那里揭发攻击我和我的妻子的事件。其中有一位对我最忠诚、最热情、并且

^① 参看蓬皮杜和戴高乐将军来往信件，见《有关文件汇编》1、2。

是真正帮助我的朋友，那就是雅克·希拉克。还有三、四位朋友，在谈话中和宴席上为我辩护。但是，人数也只不过这么几个。

在反对派中间，也出现了几个令人讨厌的人物。头一个就是罗朗·迪马先生，他溜到贝尔格莱德去了，担任原告一方的马尔科维奇家属的律师。不久以后，此事被他们的领袖弗朗索瓦·密特朗所否认，密特朗本人也同样碰到过诬蔑和中伤，他公开脱离了反对我的阴谋活动。在极右翼方面，他们加紧活动。首先是在进行讹诈的新闻报刊方面，《一分钟》周刊行动起来。接着，这一派的律师，伊佐尔尼一伙和塞卡尔迪一伙轮番作战，采取的惯用手法是一边对这些诬蔑进行添油加醋地大加渲染，并说这是出自戴高乐派之口，另一方面又说我是卑鄙诬蔑的牺牲品。他们采取一箭双雕的手法，一方面给现政府抹黑，另一方面又经常把我的名字同丑闻连在一起，我还要补充一句，他们干这种勾当时，都是虚伪地把我当作无辜的牺牲品。

至于调查，就官方来说，已经转向凶杀案，这就导致对马尔康多尼的指控。但是与此同时，有人在暗中继续搜集材料和证据来陷害我和我的妻子，在这方面，我是有很多证据的。国外情报和反间谍局的工作人员零敲碎打作了一些工作，它所起的作用是不明显的。然而，总的来说，事情平息了。我准备到国外旅行。戴高乐将军赞成我这样做，在这一次，他正式地在爱丽舍宫接见我。我向他表示，我打算首先访问意大利和梵蒂冈，然后可能到英国去，在这以后我将要访问美国。我早就想到南斯拉夫去，想看看这个在捷克事件中没有妥协的东方集团的国家，但是，由于很容易理解的理由，我放弃了这个念头。将军完全同意我的计划，他说他对

加强与意大利的联系感兴趣，并劝我去看看范范尼这个“前程无量的人”，他还建议我也到西班牙去。我们分手时，他说了这样的话：“您会看到诬蔑经不住事实的检验。”

这一天，或者是过了几天，人们得悉这位马尔康多尼先生被捕了。

我和我的妻子动身前往罗马。我们非常高兴又见到这座令人赞叹的城市，又能和我们的朋友布鲁耶聚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日子好好休息一下。事实上，尽管萨拉盖特总统、鲁莫尔总理接见了我们，在大使馆的正式宴会上我和范范尼先生长时间交谈，而我们仍然还有时间去散步，我们完全隐姓埋名去参观教堂、安德里亚纳别墅、伊特鲁立亚人的博物馆，等等。星期五晚上，我在旅馆会见新闻记者。会见的规格不高，谈的问题无关紧要，谈话也枯燥无味，一直到有一个与会者问我，一旦戴高乐将军离职，那时我将干什么。我回答说，这个问题不是现在的问题，到那个时候如果有人问我，考虑到总的局势，我认为我有可能成为继任的人。谁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是显而易见的事。谈话继续进行。《战斗报》的记者问我作为“后备总统”的处境是否对我有压力。我回答说，我并不急于摆脱这种处境。大家喝了一杯酒就分手了。我任总理时的外交顾问、戈谢、使馆的新闻参赞都出席了招待会，他们认为一切都很有得体，只不过气氛平淡一些。卢森堡广播公司的夏皮特一直伴随我旅行，他象什么也不知晓的人那样平静地吃饭。我也要到梅西迪斯别墅参加巴尔瑟斯的宴会。在宴会上，大家谈的是艺术。比兰·德罗齐埃也参加宴会了，他告诉我，我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反映很好。

第二天，圣父要接见我和我的妻子。当电话铃响的时候，我正在紧挨着卧室的小客厅更衣（因为接见时必须穿礼

服)。我拿起电话：使我吃惊的是，这是《巴黎新闻》夏尔皮直接打来的电话，“喂，”我对他说：“您是在罗马嘛！”

“不，我在巴黎给您打电话，您的声明引起了轰动。”“什么声明？”“您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声明。”我对他说：“您别开玩笑，我没有发表什么声明。我说过多少遍，对您本人也说过，如果有一天戴高乐将军引退了，那就有可能我出来竞选。但是，这个问题眼下还谈不上。”“我告诉您，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我要告诉您，这是今日新闻。”“对这个问题，我希望您理智一点，我也确实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挂上了电话，因为时间很紧迫，我要准时赶到梵蒂冈。

圣父首先单独接见了我们，然后又接见我和我的妻子，接见时间很长，态度也很友善，这使我们很感动。教皇对我毫不掩饰，他认为有一天我将成为法国的第一号人物，这对我本人和我的行动都是比较有利的预见。在发生马尔科维奇案件的这种气氛中，意大利的为数颇多的热中于耸人听闻消息的报纸很重视此事，这样，教皇的接见就更显得珍贵了。

当我离开梵蒂冈时，一群记者包围了我，对那个议论纷纷的声明，他们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我不管后果如何，尽量设法澄清事实。

回到旅馆时，我得到巴黎的一些消息。我得悉法新社的芒让先生发了一条电传新闻，题目是《我是候选人》，《我并不焦急》，把两个毫无联系的回答摆在一起，并且割去了对第一个问题回答的“答案”，这样就称心如意地达到三重目的：搞出一条耸人听闻的电传新闻、使戴高乐将军不快、把我的态度说得俗不可耐。但是，我们要参加在教廷附近的使馆举行的、由布鲁耶先生设的午宴。在宴会上，在众多的红衣主教中，我又碰到了老朋友比兰·德罗齐埃先生，他对来自巴

黎的反响极为激动。我对他说，我竭力设法澄清事实，但是，只有等到达奥利机场时才能把事情弄得比较清楚。

我们乘飞机去巴黎。在奥利机场，有人就告诉我记者云集。卢森堡广播公司的记者是每场必到的。政府显然已对法新社和法国广播电视局下达了命令。这是政府干了傻事，因为我作的态度明确的更正，如果法新社和电视台不播放，影响就大大地减弱了。

在发生这件事的几天以后，我在里兹举行午宴时碰到了夏尔皮，我严厉地指责他的作法；他不仅搞了个《罗马声明》的标题，而且还利用了我们仓促的通话，把它当作专门的电话谈话并确认为声明。夏尔皮是我尊重的人，但是在特定情况下，职业性的癖好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了。

不管怎样，我的同事们向我证实这件事产生了很大影响。在马提翁，顾夫好象是怒不可遏，要求戴高乐将军明确表态反驳。事实上，在内阁开会时，戴高乐将军作了个干巴巴的声明，他宣称履行职责，直到任期届满。

我的反应如何呢？在当时来讲，让人家把我当作话柄，那怕只是三言两语，我也是很恼火的。我也觉得别人对我言过其实，把细枝末节当作重大的政治问题。我要提出责问，但是我不愿像哑巴似的不吭声。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我再想到这件事时，我自忖，不论是制造这个事件的人是否居心不善，也不论官方的反应是否走了极端，由于我的话而引起的传闻也决不是偶然的。事实上，在总统选举的第二轮投票中，戴高乐将军受到了损害。从1968年5月起，法国已下意识地感到已走上穷途末路，人们很自然地要想到下一步该怎么办。我的地位好象就是这种状况的结果，也是前途的预兆。

人们向我暗示，现在求见戴高乐将军和谈意大利之行是不合时宜的。对于这一点，我是容易猜到的。然而随着岁月流逝，我继续注视着马尔科维奇案情调查的发展情况，也没有发现什么真正的新东西。然而，我又重新被死者的兄弟，一个名叫亚历山大·马尔科维奇的家伙牵连进去了，他在法官面前断言，德隆一家、他们的兄弟、我们夫妇曾在德隆家的厨房（原文如此）便餐。这是天大的笑话。德隆否认此事，并正式声明，我们决不会、也从未在他家厨房或其它什么地方吃过午餐或晚餐，如果我们给过他这个荣幸的话，也不可能厨房里。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此事。他们的兴趣是在别的地方。公众的兴趣是在继任问题上，是在关于我当候选人的态度方面，以及关于公民投票的方案。在公民投票问题上，在我访问意大利前拜访戴高乐将军时说过，我对时机提出了保留意见的同时，曾建议尽快举行公民投票。我确信，如果戴高乐将军能迅速地压住对方，加快事情的进展，在2月份用三个星期来进行公民投票，他就可能获胜。但是政府犹豫不决，举棋不定，最后，将军在投票前两个月才宣布此事，这就给反对派以充分的时间，用来鼓舞士气和在地方干部中进行煽动。

当时，我正动身前往日内瓦，参加我早就答应法国侨民的集会。侨民对我的欢迎十分热烈。不管怎么说，我必须回答瑞士电视界的问题。有人向我提了一个问题：“您对您的政治前途怎么看？”这一次我是本能地、却是有意识地表示，如果继任的问题不是当务之急，我并不认为戴高乐将军的怒火已把我抛入深渊，我回答说：“你们所理解的政治前途，我是没有的。如果上帝保佑，我可能掌握国家的命运。”

在我回到巴黎后，若贝尔笑着对我说：“当您谈这样的事情时，能否告诉我们一声。”确实，在这一回，新闻界行动比较克制；继承的问题还谈不上，但是有一天，我可能是候选人，在此以前，我什么也不会承诺。这是符合我的思想状况的。

但是，马尔科维奇案件的调查又再次在报刊上出现。我在上面已经提到过，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右翼的操纵，其代表人物是马尔康多尼、伊佐尔尼、塞卡尔迪等律师。他们借用亚历山大·马尔科维奇关于在德隆家吃饭的说法，以为用这种虚假的证据，对被告的控告就能为死者和家属捞到救命稻草，他们公布了一个声明，要求法官传讯我和我的妻子。

我是这场诬蔑的受害者，他们用大喊大叫表示愤怒，其目的显然是要把我牵连进去。

对这个亚历山大·马尔科维奇，我在这里要附带说几句，使人们更好地了解警察局和司法机关对这个案件的想法。关于这个人，谁也没有打听到什么，人们把他说成是一个廉洁奉公的人，以前当过铁托元帅游艇的船长，有国际水平的实业家。但是我的同事不受迷惑，由于催促了内政部及召见并催促了南斯拉夫大使，人们获得了一些情报：这个马尔科维奇从未在南斯拉夫海军担任过指挥员，由于贪污舞弊，他被南斯拉夫海军撵走，还坐过二年牢。如果有人说他能够在南斯拉夫境外如此自由自在、干上了不怎么令人瞩目的进出口商，大家会想，无论如何我也是这么想的，那是因为他已受南斯拉夫秘密情报机构的支配，不再计较他过去干的坏事了。若贝尔则直截了当地说，由于南斯拉夫大使在这里头扮演了奇怪的角色，他认为亚历山大·马尔科维奇与使馆的情报机构有接触，还说过去只有南斯拉夫的情报机构参与此

事。他会想到美国人吗？会想到以色列人吗？在我看来，还不如说应该想到俄国人。但是，我拿不出什么证据。

无论如何，应该对伊佐尔尼和塞卡尔迪之流采取行动，特别是法国广播电视局首先发出、法新社深信不疑的电报，而法国国内广播电台却不厌其烦地用一种——希拉克听到过的、并称之为“兴高采烈的”声调讲话。此外，这种事对新闻部长勒特尔来说，可以因此博得一阵臭骂，我的朋友希拉克说，没有别的字眼比这更恰当的了。于是，我用我的秘书处名义，公布了一个简短和措词生硬的公报，公报中指出法国广播电视局起的作用，提醒有人攻击戴高乐将军的前总理，并且指出我们根本不了解马尔科维奇案件。

我的公报不讨人喜欢，但是产生了影响。此外，戴高乐将军也清醒过来了，觉得别人做得太过份，也明白了别人攻击我也是找他的岔子。加比唐，是的，就是这位加比唐公布一份使我满意的公报，爱丽舍宫宣布邀请蓬皮杜夫妇赴宴。

一切安排就绪以后，伊佐尔尼和塞尔卡迪的行动没有奏效，其结果是使法国确信，这不过是一个阴谋。

爱丽舍宫举行宴会的那一天，平素谨慎的戴高乐将军，在邀请客人的名单中已增加了德勃雷夫妇。这样一来，这个宴会就不仅是宴请蓬皮杜，而是宴请前总理了。宴会的气氛沉闷。德勃雷面带倦容。而我也不想吐露真情。我们明白这个宴会对外界的作用，但是感到已经太晚了，并且不大自然。我想，戴高乐夫人由于向来比较持重（因为，在我们看来，她总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对我的夫人更是如此），而我猜想戴高乐将军是由于局促不安，他们夫妇俩都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将军单独见了，要我谈谈罗马之行和日内瓦之行。我又说了一遍，关于罗马之行，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了，因为我已经被别人出卖了。“但是您又犯老毛病了！”

“我的将军，由于政府和您本人的立场，为了我的尊严，这就迫使我不能讲违心的话。但是谁都知道这并不是眼前的事。”大家互不相让，宴会很早就散了。感情的裂痕没有重新愈合。也没有获得什么社会效果。

从那时起，新闻已带有政治性了。那时已要公民投票了。这次投票在多数派中间引起强烈反响。除去少数议员以外，其它的议员都是持反对立场的，心情也是不安的，外省的悲观的消息已达到了顶点。我应该竭尽全力鼓舞士气。与其颂扬非中央集权的地区化或搞一个担负政治、经济、社会责任的参议院，我说不如强调需要团结和斗争。至于对我来说，我是竭尽全力进行斗争，这与报刊上的文章中所叙述的正好相反。如果我没有召开很多的大型集会，如果我不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发表演说，这是因为人们并没有要求我这样做，换句话说，德姆维尔是反对这样做的。这个人的思想也会自己暴露的。他还想当总理，当到1972年总统选举的法定日子，况且还应该赢得公民投票的胜利，而他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戴高乐将军缺少激情。他要这样做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马尔罗在体育馆有过这种经验，他想根据6月18日的计划实行地方化，但是他徒劳无功，等等。在竞选运动后期，我要在里昂举行重要集会。爱丽舍宫开始了解到：所有官方电台和电视台都大量播发我在里昂的演说。但是，这已经太晚了。在发表演说以前，在一群热情的、但也是信得过的群众面前，我和若克斯以及罗纳省当选的议员一起进餐，并且在电视上看见戴高乐将军最后一次在电视上向全国讲话。我当时还是相信，如果他早就以坚定和自信的语气讲话，并且要求全国人民重新给予信任，他打算留任一段时

间,但在他任期届满前组成继任班子,使政府不致受到打击,如果这样做的话,他还可能取胜。但是,他讲话时象一个看破红尘的老人,他说他的意愿是在爱丽舍宫留任三年半,而他的态度却与他的表示很不相称。离职的威胁已经激怒了他,并把他推到与对手真正决斗的场地,也使他的对手又找到那些陈旧的和可怕的口号:“十年,这已经够了!”

在听了戴高乐将军的演说后,若克斯本人对我说:“真糟糕透了,这下子全完了。”

然而,我不能相信这一点!如同我在1965年不能相信第二轮投票的结果一样,我觉得在最后一秒钟还可能有反应!一定会有反应。因为,如果人们早就相信的是那些多数派议员,选民投的赞成票还不会达到25%。但是,这个比例数字是不够的。

下面的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戴高乐将军,就象他在担任总统时庄严地宣布过的那样,辞去了他的职务。我应该毫不迟疑地作出决定。我等待着将军肯定引退的正式确认。我于是给他写了一封信,全文附在文件中^①,而将军也给了我一封复信^②。然后,在星期三早晨,我宣布当总统候选人!我来到保卫新共和联盟的议会集团,受到了热烈的和全体一致的欢迎。(瓦隆缺席,加比唐不再是议员了!)然后我在独立共和党议会集团讲话,也受到类似的欢迎,虽然吉斯卡尔·德斯坦板着脸孔,采取敌对态度。然后,我开始组织竞选运动。拉图尔—莫布尔一班人马给予许多友善的协助,组织张贴布告,在希拉克的严密监督下收集资金,把一切都管理起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3.

②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4.

来。我委派吉夏尔制定会议日程，吉夏尔在一段时间内曾是受到排斥。我在法国各地转了一圈，感到精疲力竭，为了给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录音和录相，我要克服日程表安排上的巨大困难，不时中断旅行。因此，由于我在巴黎逗留时间很短，我不得不在一天之内给两个电视台和一个广播电台录相、录音，以供往后几天播放。因此，我没有时间考虑如何回答对手在此期间提出的问题，我也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在我的发言中，我着重谈了我将要做些什么：在政治方面的连续性和开放政策，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和新想法（月薪制），今天，我满意地指出，这些措施和新措施已付诸实施。

我的成功已是毫无疑问的了。除了少数几个坏家伙还在暗中捣乱外，谁也不再提马尔科维奇案件了。对全国来讲，我已经是当然的继任人。在瓦隆省，有几个狂热分子在戴高乐派中间攻击我，这种情况在投票中也反映出来了。但是，这也无关大局，这是由于与吉斯卡尔·德斯坦的联合——虽然他并不是心甘情愿，后来又与雅克·杜阿梅尔联合，他也是犹豫再三的。我们在欧洲第一电台的麦克风前的讨论是有巨大效果的。

然而，又产生了一个新问题：代理总统问题。这个职务应该由参议院议长波埃先生担任，而这个名字没有人或几乎没有人知晓。

波埃先生作为总统候选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代表中间派。1965年，人们同拉卡尼埃先生打交道时已经有过这方面的经验。中间派候选人会导致第二轮投票，但是这种候选人也改变不了第二轮投票的结果。但是，这一次情况不同了：波埃先生是代理总统，他占据爱丽舍宫的职位，而不仅是一

一个无名的中间派。从那时起，对很多人来说，只要他稍微引起人们的好感，保守派总是坚持要爱丽舍宫现任主人继续干下去，很多人还会补充说：只要任命蓬皮杜为总理就行了。波埃先生和他的亲信的活动是非常巧妙的。直到他宣布作为候选时为止，他显得似乎是一个诚实和没有野心的人，他把每月领来的担任共和国总统的经费交给红十字会（可是不要忘记，他还保留参议院议长的收入和待遇），他可以名正言顺地成为爱丽舍宫的正式的主人。而其它的候选人，特别是我本人，却仿佛是越墙撬锁的僭越者。突然，波埃先生的股票在探测行情的交易所上涨了，而社会党在共产党和代总统之间选择候选人也无法实行了。有一段时间，很多观察家认为波埃先生会当选。而我从来也没有相信过，在一次招待记者的午餐会上，我在回答记者时曾说过，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记者坦率地对我说：“您将被击败。”我回答说：“我会当选的。”我坚信竞选运动估量着每个人的真正价值，即使代理总统的头衔提高了波埃先生的得票率，我认为，没有抛弃戴高乐将军的45%的选票基本上会转向我，这并不是出于报复的愿望，即使在法国东部和西部，那些本来是拥护戴高乐的人民共和党的选民不投我的票，情况也会这样。在奥弗涅省，我相信我的得票率会高于戴高乐将军，在法国南部也是如此。最后，我还坚信，人们对1968年5月我所起的作用记忆犹新，全国人民在当时就有公论。

有人说，选举运动和电视帮了我的忙。这是可能的。但是，有一点也不能抹煞，波埃先生也有自己的选举运动，也不是没有给他帮忙，至少在第一轮是如此。这种情况是与作为好好先生的代理总统身份相一致的。有人说共产党人对我的成功也帮了忙。这是确实无疑的。但是，我想如果共

产党人早就要求他们的选民(在我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投波埃先生的票,他们也根本不会跟他们走,此外,即使他们发出弃权的指示,那末相反,温和派、社会党人,他们在第二轮中是投波埃先生的票的,但是,当他们有共产党的候选人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这么干的。选择余地是很少的,我相信,这种选择余地对我是有利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无疑是由于我个人原因,但是,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法国的政治现实。

不管怎么样,我当选了总统并就任了。大家知道,戴高乐将军给我发了电报。我也给他复了一封信,全文附在后。^①这篇叙述不得不至此结束。有一天,另一篇叙述可能会开始。

① 参阅《有关文件汇编》7。

有关文件汇编

1. 蓬皮杜致戴高乐将军函

我的将军：

首先，请原谅我的这封信是用打字机打的。但是，在向您祝贺1969年新年时，我觉得对1968年应作回顾，并希望您不要为我的难以辨认的字迹而给您带来麻烦。

自从我为您、并通过您为法国服务以来，我从来也没有象1968年有那样多的感触。然而，我也同样感到，从来也没有象这一年受到更多的攻击、诬蔑和猜疑。

我得承认，那些攻击对我来说是无足轻重的。这倒是件好事，因为这些攻击反映了某些人搞了一些名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这也使我感到荣幸。这些攻击带来的诬蔑和猜疑也只是牵涉到我对您的态度，以及我的亲爱的人们。不幸的是，这些攻击在这两个方面都暴露无遗。

首先，我对5月29日的事情要说几句话。您比任何人都清楚，当我获悉您动身前去科隆贝时，我的心情是十分惶恐不安的，也是忧虑重重的，我想前去看望您，并希望您改变主意。我不用求助于感情，但是这是常识：我完全意识到，如果我独自一人处于很象革命初期的那种境况，那我就要冒多大的危险！确实，不管发生什么事，我已决心斗争到底。但是，有人认为我希望您引退，以便夺取权力，这既是荒谬

的，而且也是可耻的。然而，我也不相信《在爱丽舍宫》这种小册子，而这种想法也不会损害任何人。我不知道这种小册子是否存在，但它助长了这种猜疑。我曾读到过我“勒令”您离任之类的话，我曾为这种事访问过莫内维尔！我的将军，我利用这个机会告诉您，我对这种含沙射影的话感到鄙视，我曾经书面表示过对首先主张并散播这种言论的罗歇·斯泰福纳的鄙视，他自认为是您的发言人，我看他不配，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配！他以为不必迈出爱丽舍宫大门，就象是在那里友好地接待莫里斯·克拉韦尔时一样，就想使我一个人蒙受侮辱吗？

对于那种通过反对我的妻子来攻击我的活动，我能说些什么呢，事实上，我没有任何合法的手段，我要亲自进行详细的调查来了解阴谋的来龙去脉，而我除了唆使者外又能知道什么呢？我精神抖擞、干劲十足、无所畏惧地揭开事实真相，在您发出指示后，内政部长也做了一些工作，不管怎样，他也相信别有用心散播的荒诞无稽的指控。但是，那些在我身边工作多年的、也很了解我的家庭的部长们，在可耻的和虚假的、非常不公正的条件下，由基层的警察局密探揭发出来，而且显然是有人授意的诬蔑面前，他们的行动竟如此软弱？而且我敢说，这也是可耻的。

然而，我的将军，即使1968年给我留下的只是暗淡的回忆，也不要以为这一切只是为了我自己。请您相信这一点，我也同样估计到对您的影响，以及您内心的苦衷，在几天之内，法国和巴黎轻易地将您当权十年所取得的主要的成就毁坏了。确实，在我们的国家里，一切都要重振，但是不幸的是，我们国家的天才刚刚要求我们达到顶峰，而我们却渴望重新掉下来。您怎么不为此而感到灰心丧气。值此新年之

际，请相信我，我衷心地祝愿，并且向您保证，如果有朝一日，就象您要求我做的那样，命运也这样安排的话，我将竭尽全力继承您的事业，决不辜负您对我的教导。

我的将军，请接受我和我的夫人对您、您的夫人、您的全家的问候，并请接受尊敬和忠诚的情谊。

乔治·蓬皮杜

1969年1月3日于巴黎

2. 戴高乐致蓬皮杜函

亲爱的朋友：

祝您新年好！我的夫人也向您和蓬皮杜夫人祝贺新年。这是最尊重的和最友好的祝贺。

您谈到您的心境的信，使我十分感动。尽管那些关于您的流言蜚语是荒诞的和卑鄙的，我希望您不要为它感到难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什么事情总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说，人们到底做了什么和人们现在意识到什么是应该做的。

我已经请德·拉·谢瓦勒利先生告诉您，不久我要会见您。

亲爱的朋友，我们很快会见面的。请向蓬皮杜夫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问候。

夏尔·戴高乐

1969年1月5日

3. 蓬皮杜致戴高乐函

我的将军：

我担心您本人也没有估量到我的忧伤。尽管我确信有一天，事情的发展会使我成为共和国总统候选人，这是您在去

年7月确认的，但是，我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样快，而且我也没有想到是处于这样的形势之下。

我的将军，我能对您说些什么呢，您把一切都教给我了，您的形象越来越伟大，任何东西也不能损害，特别不是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所能损害的，而那个被注定正式继承您的人只能尽力工作，使得不要与继承人的名字太不相称。

对于公民投票，我已经做了我能够做的事，在我个人影响所及的地方都已奏效^①。现在，我已投入另一个战役，并且应该使它取得胜利。如果我获得胜利，我可以向您保证，您制定的大政方针的任何方面，特别是在对外政策和国防方面，我决不会抛弃。我希望，当重大决策制定后，您能够指引我们完成任务，对我来说，这个任务只能在您制定的路线上去完成。

我的将军，我从来也没有忘记，二十五年来，我作为您的合作者是我的骄傲。请相信我，我仍会这样做。

我的将军，请接受我友好和尊敬的情谊。

乔治·蓬皮杜

1969年4月28日于贝休恩大街

4. 戴高乐将军致蓬皮杜函

亲爱的朋友：

不久以前，我曾多次说过，我也曾经就您的问题公开宣布过，您有充分理由相信我同意您的候选人资格。确实，我同意您的候选人资格。

毫无疑问，您不在几个星期之前事先宣布作候选人的资

^① 在康塔勒省、甚至洛特省都投了赞成票。

格是比较妥善的，不这样做就会失去一些“赞成票”，将会使您失去属于您的“赞成票”，尤其是如果您当选的话，会使您的品德受损害。在目前的情况下，您宣布作候选人是很自然的和完全合适的。因而我热切地希望您获得成功。我想您是会获得成功的。

不言而喻，在“竞选运动”期间，在考虑到种种因素，我不能以任何方式来表示意见。尤其是您4月28日的来信和我今天的复信，将来也只能我们两人知道。

请向蓬皮杜夫人致意，我的夫人也衷心地向她问候。亲爱的朋友，谨向您致以诚挚和友好的情谊。

夏·戴高乐

1969年4月30日

5. 菲利普·戴高乐海军上校给蓬皮杜总理的信

总理先生：

我同高级军事研究中心的同事、然后又同国防部高级研究院的同事作了六个星期的马拉松旅行，昨天刚返回，我最关心的是向您保证，我全力支持您参加共和国总统的竞选，虽然我的力量是微薄的。

确实，我知道很多事情，以致我毫不怀疑，在所有的候选人中，只有您具有必要的品质和保证，在未来艰难的岁月中能承担国家利益的重任。

我要明确地表示，我本人及我周围那些在国外的很多法国人，他们告诉过我，他们担心法国会重新落到象他们所熟悉的“第四共和国”那样，这样法国的威信就会丧失殆尽。

总理先生，我的表示能使您愉快和有用，并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您忠诚的

菲利普·戴高乐

1969年5月26日于巴黎霞飞广场17号

高级军事研究中心

6. 格札维埃·德·拉·谢瓦勒利转交的戴高乐将军
致蓬皮杜总统函

总统先生：

我谨转交戴高乐将军要我转达的以下信件：

引文：

“为了国家和个人的理由，谨致友好的祝贺。”

引文完。

总统先生，请接受我最崇高的敬意。

戴高乐将军办公室主任

格拉维埃·德·拉·谢瓦利埃

1969年6月15日于巴黎

7. 蓬皮杜总统致戴高乐将军函

我的将军：

您的来信使我非常感动，您个人的保证和国家的保证，对我的选举和我本人比所有的一切更为珍贵。

如果选举的结果不发生意外，它给我带来的职责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我愿再次向您保证，就象我在竞选时保证过的那样，我决不开您所制订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针。

值此国庆庆典前夕，我的将军，而您却不能莅临庆典，请相信我深切的惦念，诚挚和尊敬的感情和忠诚。

乔治·蓬皮杜

1969年6月17日

8. 共和国总统给议会的信件

议长先生：

女士们，议员先生们：

参议员先生们：

在议会开会和我就任总统之际，我向诸位致意和表示我的信心。

大会一致同意向祖国的解放者戴高乐将军致敬，他在复兴和拯救共和国后，为国家建立了组织机构，而我们的人民也一致表示赞同。现在他自动退休了，我们的致敬电将送到他那里，这是全民族对这位现在和将来都是法国最伟大的人物表示感激的证明。

现在，我们要进行复兴事业，保证共和国组织机构顺利工作。在总理和政府的帮助下，我打算发展政府和参众议院的信任和友好关系。只有在议会充分行使立法权和国民议会行使对政府政策的监督权，只有在这种合作中，权力和必要的继承性才能维护。

在我们国家面临重重困难时，这种合作更有必要。

首先，我们要在尊重我们的盟国和各国人民、尤其是在欧洲人民的合作和接近的基础上保持独立，这样才能导致我们大陆的政治觉醒，大陆的这种政治觉醒才能显示法国的特点和使法国能在为和平服务的事业中起作用。

在这种为和平事业服务的活动中，为了使法国也能履行地理和历史地位所赋予的使命，法国应该是一个现代化的和有自信心的国家。我们的国际威望不仅要依靠我们的意志，而且要依靠我们的技术和经济的能力以及社会和政治方面的

稳定。这也就是说，必须同时保证行政当局很好使用权力，取得真正的经济实力，社会各阶级不仅要共同努力，而且要保证努力的成果。

我是第一个担任共和国最高职位的大学教师，对于大学所遇到的困难不能闭口不谈。大学需要革新，需要继续大力推行深刻的改革，这都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在促进尊重法律，尊重人的自由，尊重教师的权威方面就不怎么看的清楚了。在以下几个方面就更不明显了：大学应该为人类和国家服务，团体要承担培养中小學生以及大學生的繁重职责，这就给受教育的人一种职责，也就是劳动的职责，它要为将来在各个领域里为法国培养它所需要的干部。

我们再进一步来谈。我们的文明经受着精神危机。经济的变革、科学和技术的飞速发展、信仰的动摇、传统习惯的束缚、风尚的剧变，这一切都促使社会狂热地追求物质进步，而这种追求是无止境的，但是，好像这种物质进步愈发展就愈难满足社会，也难以满足那些盲目追求享受的人类的强烈要求。世界需要复兴，对承担这些责任的人来说，谁也没有权利考虑与此无关的事，然而谁也没有承担责任，无论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或智力的，确切地说是精神的责任。人们要重新使个人生活具有应该包含的自由和义务，人们也要使集体的生活具有公正和互相尊重，这也就构成了摆在国家面前的具有深远意义的一种行动，特别是在教育、新闻、文化和改变社会关系等领域内更是如此。

面对这种完全是否定的争执、面对事先就注定要失败的保守主义面前，人们只有通过行动和运动才能建设我们的未来，我们不仅要重建法兰西这座古老和闻名的大厦，而且要加以革新，并用新的启蒙思想加以革新。

这些眼前的和遥远的任务，是我们这几代和将来几代人的任务，国家的作用是必要的，但完全依靠它是不够的。保罗·瓦莱里^①曾经说过：“假如国家强大了，它就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假如国家弱小，那么我们就要死亡。”女士们，议员先生们（参议员先生们），你们和我们，就是要在压倒一切的力量和致人于死命的弱点中，使得我们法国行政当局在行使职能过程中达到这两种力量的平衡。我们是共和宪法的卫士和执行宪法的保证者，对我来说，我要十分小心谨慎行事。我们的政策方针的轮廓就是这样制订出来的，在这种方针指导下，法国就可能参与现代世界的进程，同时保存和重新创建我国和欧洲在几个世纪以来，比其它国家要作出更多贡献的道德准则。

9. 蓬皮杜致戴高乐将军亲笔函

我的将军：

在您的诞辰之际，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最热烈的祝贺，祝您身体健康。

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不得不告诉您，我比别的法国人更感到您的离职所带来的空白，重新建立平衡和沿着既定的道路前进又有多么困难？无论如何，在意识到这种继承的价值时，我将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我的将军，请转达我对戴高乐夫人的问候，她对我们孙子生日的祝贺使我们非常感动，并请您接受我最尊敬和忠诚的问候。

乔治·蓬皮杜

1969年11月21日

^① 保罗·瓦莱里（1871—1945），法国著名诗人。——译者

10. 艾蒂安·比兰·德罗齐埃致乔治·蓬皮杜函

亲爱的乔治：

告诉您，我能在马尔利见到您，我是和您一样感到高兴的，我非常感谢您邀请我参加多么富有诗意的狩猎，而且有这么好的伙伴！

勒内和我已完成了溯本求源的参拜活动。将军在门口等着我们。乍一看来，将军目光炯炯，精神焕发，神色自若，给我印象极为深刻。显然，将军精神状态很好，戴高乐夫人无忧无虑的愉快神色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谈到了他的回忆录，他的过去，但是没有谈现在。他没有说一句伤心话。在我看来，由于他决定离开政治舞台，为了避免陷于是非的漩涡，他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您和我都知道，他不动声色并非无动于衷。总之，给人的印象是泰然自若，是一个完成了使命的人的感情，他是平静的，他不愿与这个还要生存下去的世界争辩是非。

除了和您谈起这次访问，我没有对别人谈过此事。这个秘密保守得很好。

亲爱的乔治，请向克洛德问好，并请相信我的忠诚和友好的情谊。

艾蒂安（艾蒂安·比兰·德罗齐埃）

1969年11月26日于罗马法尔纳斯宫

11. 勒内·布鲁耶致蓬皮杜总统函

共和国总统先生，

我亲爱的乔治：

我和艾蒂安·比兰·德罗齐埃从科隆贝旅行回来时曾

短暂地在巴黎逗留，但是未能见到你。

我们受到的接待，对你来说是很熟悉的，你比谁都清楚，那是将军在最美好的日子的接待，将军笑容可掬，神态庄重，他对政事保持一定距离，他一直忙于写新的回忆录第一卷，在完成他的巨著时，他坚决不让任何琐事打扰。

在访问中，交谈中没有什么值得非议的话；气氛是你所熟悉的，是宁静和有节制的。

艾蒂安的印象也和我相同。

我很高兴在三周后能见到你，能够从容地同你叙谈。我把这封匆忙写成的信交给阿兰^①，要他带到贝休恩大街。

祝海牙之行一路顺风，工作顺利。

亲爱的乔治，请代向克洛德问好，并请接受友好的问候。

勒内

（法国驻罗马教廷大使）

1969年11月30日于罗马

12. 戴高乐将军致蓬皮杜函

亲爱的朋友：

感谢您的问候，我和我的夫人向您、蓬皮杜夫人和您的全家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我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做，因为在几百页书里要“抓住”很多的事情。

请向蓬皮杜夫人问候，亲爱的朋友，顺致友好的问候。

夏·戴高乐

1969年12月30日

^① 阿兰是勒内·布鲁耶的儿子。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